

目 錄

- 批判李景汉的社会調查…………… 統計系师生唐垠等集体写作… 1
- 李景汉北京郊区农村調查的对証与批判…………… 若吉坐… 31
- 对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
的批判…………… 定县中国人民大学下放干部調查組… 51
- 駁斥李景汉关于社会調查的实用主义方法… 哲学系教师刘炯忠… 111
- 駁斥李景汉关于“平民教育”的謬論…………… 哲学系教师刘炯忠… 135
- 駁斥李景汉关于社会学和社会的謬論…………… 哲学系教师刘炯忠… 153

批判李景汉的社会調查

統計系師生唐垠等集体寫作

一、李景汉如何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李景汉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在党整风期間，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口号下，企圖复辟資产階級社会学，用它来攻击馬列主义，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以达到其复辟資本主义制度的陰謀的目的，这一陰謀早已被我們徹底揭穿，徹底打垮了。

李景汉这样猖狂地向我們进攻，除了为其階級本能所驅使外，还因为他自認為在学术上有些本錢，想和我們来較量一下。

李景汉是学社会学的。罗隆基說，“关于社会学問題”去找李景汉。其实李景汉在这方面的本錢是少得可憐的。李景汉的著作大多数是調查报告及有关社会調查方面的文章。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学的理論和观点是极不成体系的，相互矛盾的，即使在同一篇文章中、同一段話中也是前后矛盾，牛头不对馬嘴的。資产階級社会学有不同的派別（本質上都是反动的，反科学的），但李景汉自己却說不上他是屬於那一派来。我們先不以真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只就資产階級的科学来看，他們的同行也是看不起他的。只是为了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目的才把他捧出来。李景汉的全部本錢就是搞了一些調查，写了几篇調查报告及文章。这样李景汉就以調查專家自居了，好像中国別無他人，要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就非得請这位“專家”出場不可了！

李景汉在社会学方面主要攻击我們三点：

1. 从理論上攻击我們“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原則，干巴巴的缺少根据丰富事例的活生生的說服力”，一下給換了出来，也就不好再鑽

进去了(“李景汉先生訪問記”,載“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还有与实际生活大有关系的重要問題沒有研究”,这是“空白”。

2. 攻击我們不重視社会調查,說我們的統計調查是“望远鏡式的”,只能“鳥瞰式”地看到全国社会現象的全貌,只能了解个“概括情况”,并且在“实施中”又往往“徒具形式”;是空洞的,“見林而不見木”的,也还有不少“空白”(1957年10月4日李景汉在“新建設”編輯部“关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座談会上的发言)。

3. 攻击我們在組織上“过去几年……沒有一个統計調查的正式組織”,沒有請李景汉之流“有經驗的專家”参加,沒有“充分吸收資本主义国家的統計技术与理論”(1957年5月27日李景汉在国家統計局天津部分經濟学、統計学教授座談会上的发言,載“統計工作”1957年第12期)。

李景汉一面攻击我們,一面宣揚他們的資產階級社会学是“显微鏡式的、X光式的”,是“細致而深入”的,“向来就是……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真实面貌”的。而“要解决我国多种多样的社会經濟問題”就非請他們来調查不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和内容丰富与充实起来”也非請他們不可,甚至我国“人民内部相互間种种矛盾問題”也需要由他們来研究解决了!

李景汉这种攻击是惡意的誣蔑,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1. 李景汉竟把事实的黑白顛倒到如此程度,好像如人民内部矛盾問題,不是我們毛主席、共产党人、馬列主义者提出来的,不是我們在研究与解决这些問題,而倒是資產階級社会学者們“本来就是研究这些問題”的!資產階級社会学是根本不提“矛盾”的,而今天也要来研究“矛盾”,这豈不可笑?

好像我們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資產階級社会学,倒要由他們来“补充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請問历史唯物主义又有什么空白需要由反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补充与丰富”呢?

李景汉之流所提出的家庭、妇女、婚姻、敬老等問題,也根本不是什么空白,不仅馬列主义經典作家在这些問題上有所論述,而且这些

問題在我国已經得到了解决。婚姻法的制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証明。事实上不是我們沒有研究解决这些問題，而是李景汉在企圖破坏这些問題的正确解决。李景汉在解放后攻击合作社的五保制度不正是很好的証明嗎？

2. 李景汉誣蔑我們不重視社会調查，如指的是資產階級社会調查，則我們不但不重視，而且是根本否定的。但我們絕不是不重視馬列主义的社会調查。

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觀是辯証唯物主义。它从来就与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我們在任何工作中都強調調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以免犯主观主义的錯誤。所以說从理論上来看馬克思主义者是一貫重視社会調查的。我們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經常以“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发言权”，“作几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使我們具有对中国問題的最基本知识”等指示来教导我們。从实际来看，我們也切实执行了这个指示。

中国資產階級学者虽然也做过一些片断的調查，但就其数量及質量上来看，都沒有給我們留下关于中国社会情况的起碼材料，这种情况毛澤东同志早就做了分析性的結論：“中国幼稚的資產階級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們預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較完备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样，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农村調查”的序言）毛主席就曾亲身作过不少的調查研究，而已发表的“兴国調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对推动我国的革命工作均起了重要作用。他运用馬列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調查研究，在理論上、方法上都給我們作出了典范。

中共中央在1942年又曾專門作过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决定中不仅規定各級党的机关建立調查研究機構，并且要动員全党、全軍、政府各机关及全体同志“都进行調查研究工作”。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老解放区我們作过無數的調查研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了更大的发展。

資產階級学者吹嘘他們作了多少多少調查，但这只不过是少数

專家們”作的有限数量而已。我們動員廣大群眾、廣大幹部來進行，把調查研究作為我們的一種工作方法，貫徹到日常工作中去，這就絕非他們少數人出幾本調查報告所能比擬的了。李景漢硬說我們“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者”不重視社會調查，這本身就是根本不懂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表現，也是閉眼不看事實的惡意誣蔑。

3. 說我們沒有正式的統計調查組織，這簡直是與美帝國主義硬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一樣，李景漢竟然把我們全國上萬人組織起來的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統計組織也一筆抹煞掉，說是根本不存在。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李景漢這種惡毒攻擊的目的在於妄圖：

- 一、在理論上以資產階級社會學代替歷史唯物主義；
- 二、在統計上以資產階級社會調查代替馬列主義的統計；
- 三、在組織上以資產階級的專家來全部代替馬列主義者及共產黨人。

這樣，關於國家的政策、措施、計劃等都得根據他們的意圖來辦事，從而就完全可以達到其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目的了！

可見這根本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

社會調查是一種工具，資產階級用來為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用來為無產階級服務。

進行社會調查必須有一定的立場、觀點、方法。根據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所進行的調查，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調查，才能够正確地反映客觀現實，才是科學的調查。

資產階級學者總是想把這個根本的立場、觀點問題掩蓋起來，而把社會調查說成是純客觀的、純方法的、純技術的東西，這無非是怕人揭穿其資產階級的本來面目而作的虛偽宣傳而已。

立場、觀點、方法是鑒別真偽科學的試劑，是鑒別鮮花與毒草的試劑。李景漢怕在人民面前暴露其丑惡面貌，於是就盡量化裝一番，把自己說成本來就是素朴的“唯物主義者”，現在更“已經成為真正的

唯物主义者”了；本来就是“最了解工农的，具有工农感情的”，现在又已经“端正了立场”了。但毒草是不会因它自封为鲜花就变成鲜花，假面具总是骗不了人的。

二、李景汉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调查

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他们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人们在观察一切事物时也总是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去看问题。

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就分为互相对立的阶级集团——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新生的阶级必然会推翻其统治阶级而居于统治地位。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将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将走向灭亡的道路。但垂死的、没落的阶级是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剥削阶级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总是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揭露事物的本质，总是要掩盖阶级矛盾的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科学，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

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李景汉与其他人一样，不敢把自己的阶级立场明显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总是想把自己的真正立场掩盖起来，总是向人表白和喧嚷其调查是纯“客观”的，超阶级的，“站在一切主义之外”的，是“完全反映客观现实”的。李景汉作贼心虚地说为了“避免主观的偏见”，要“多引用统计数字，少用叙述”，为此目的“虽失之枯燥，亦在所不计”。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李景汉“表白”也表白不清的，人们不只听其口头上的“表白”，还要看他的实质。李景汉的调查如果真正是“客观”的又有什么必要避免偏见呢？既无偏见又为什么不敢叙述呢？可见本来是歪曲事实的偏见，怕被人揭穿才先放出“客观”这一烟幕。谁都知道这种作法本身就正是其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表现。

事实証明，李景汉是站在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李景汉曾經写过“中国人的普通毛病”一文，該文发表于1926年“現代評論”上。在这篇文章中李景汉极尽誣蔑中国人民之能事，把中国人民描写成毫無数字观念、沒有科学头脑、馬馬虎虎、愚昧無知的蠢夫，并且把这种毛病归结为“差不多成了第二天性的习惯”，說“科学决不是‘大概齐’的人們所能发明和改进的，就是連管理汽車、火車与各种無情的机器，恐怕也不見得妥当”。

請看这种濫調与帝国主义的“种族論”有什么区别呢？中国这种“劣等民族”不就非請帝国主义来統治不可了嗎？

这篇文章很得到卖国求荣的反动統治者的嘉獎而被編入古今名文八百篇之內。

李景汉宣称这是从他了解中国社会“真相的”“实地社会調查”中得到的体会，从这体会中总结出来的“真相”。而我們却从李景汉为潘光旦所著的反动透頂的“人文生物学論叢”所写的序言中发现了李景汉的真相。

原来有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明恩溥曾在中国一連“服务”了五十四年，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早就写过一本污罵中国人民的“中国人的特性”一書。在書中他污蔑中国人有“無惻隱之心”、“言而無信”、“尔詐我虞”等十五条“特性”。明氏本人及这本书受到了美、德、日等帝国主义的重視，該書被称为“佳作”。

李景汉早在初中上学时就讀过其日譯本。我們只引李景汉在前叙的序言中一段話，就可見其如何反动了！他說：“我記得書中的許多頁的空白处，有不少鉛笔的批評，其中大部分是別的讀者在讀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的記得有‘胡說’和‘放他娘的屁’等类的話”。

李景汉当时讀了譯文，还多少有些中国人的血性，“大不以为然”，而发作几声“豈有此理”。但到后来有“不少机会得亲聆明氏的講演”，就把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变成了一个使人（李景汉）“敬而愛之的長者了”。于是李景汉就拜倒在这位“观察精密，独具只眼”的帝国主

义分子之膝下了！由此李景汉就“客观的”（甘当帝国主义走狗！）“冷靜的”（丧失了仅存在的一点中国人的血性！）把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說成是“同情人类”、“敬重中国”、“重事实”、“爱真理”的至聖天尊了。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中国人民的十五条特性中有一条就是“不求准确”，他把中国人描写为連講自己的身高时都不知道把脑袋包括在內的“蠢夫”，并为“我們的化学試驗担心”。李景汉用其“实地”調查反复地証明他的論点之正确，并发展了他的学說，說中国人民甚至連管理汽車、火車都恐怕“不妥当”了！

旧中国的貧穷愚昧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当我们斬断其侵略之魔爪，把他們赶出中国之后，中国人民不但能管理汽車、火車，而且能自己制造質量优良的汽車、火車、飞机，并且能掌握尖端科学原子能。現在不用他們为我们“担心”了，而是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他們自己的命运担心了！

原来所謂“客观”者，不过是帝国主义立場的代名詞，所謂实地調查了解的“真相”，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信口雌黃”，而用李景汉实地調查“体会”的幌子再版了一番而已！

事实也証明李景汉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把旧中国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用“調查”的材料歪曲为“耕者有其田”，并极力为地主剝削压迫农民进行辯护，以开脫其罪行。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說：“本地区地主与佃戶之間的关系很好，沒有地主無理压迫佃农的事情。这大半由于双方有同族或近鄰或同乡之誼，平日感情都很融洽，每遇婚丧等事皆互相往来庆吊。因此沒有听见有佃农抗租或霸种和地主欺詐或威吓的事情发生”。事实如何呢？只按該調查报告中所記，地主对农民的剝削就是很重的，“……錢租与粮租外，尚有农产分租法，就是佃农耕种地主之田地，待各种农产收获后，按比例兩方分配。有对分租法，有四六分租法”（地主分六成，佃农分四成）。“还有一种办法，即雇工佃种法。……庄稼收获后，若为細粮如麦子則地主分得十分之八，佃农得十分之二，若为平常粗粮如谷子則地主得十分之六，佃农得十分之四”。看吧，在这种剝削之下，佃戶与地主却相处得

关系頗好，沒有地主無理压迫佃农的事情！如果不是李景汉为地主阶级开脱罪行，有意抹煞事实，誰能相信这不是瞪着眼睛說瞎話而是实地調查呢？！

事实也証明李景汉是高利貸者的代言人。高利貸者对农民的借款索取高得使人無力偿还的利息，而且要有房、地产作为抵押。李景汉一方面說在負債人無力还債时要將其“不多”的“产业”加以“沒收”，却同时用同样极不高明的手法在同一段的文字中說：“債主对于負債人到期不能偿还时，其态度大半頗为和平”。李景汉反而把高利貸者的猙獰面貌描繪成“殷实的农人，商人或錢局”（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

事实还証明李景汉是资产阶级的辯護士。“数十年来北京生活程度的比較”是他于三十二年前发表在“現代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列出了表格，然后又用文字重复叙述了一遍，以显示他的統計專家的“本領”，用实际工資 = $\frac{\text{工資指数}}{\text{生活費指数}}$ 的公式来分析問題

（很可惜，这位不高明的專家把公式也給弄錯了。这里的实际工資应改为实际工資指数才对）。从分析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是：“从历年实际工資的变迁看来北京的工人们似乎有他們习以为常的生活程度。若物价、工資和兌換（应为兌換率）能維持他們的生活标准，他們就不打算增加工資，再者，雇主和工人同在一个行会，虽然有时物价的低落使实际工資提高，可是沒有一部分人可以出来將工資减低（着重点是我們加的，李景汉明显地在为雇主叫冤）。若物价的增高使实际工資降到工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标准之下，行会一定要召集會議，討論增高工資的。这是因为不但工人们要自动的維持他們的生活，雇主和工人们寻常彼此很熟悉，所以他們也和工人们表同情的。”

李景汉以最关心工人生活，最了解工人情况而自詡，这里却把工人“每月平均十元錢”（这十元錢是帶問号的），“不过能維持他們粗衣粗食的不冷(?)不餓(?)的生活”說成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平。根据这个結論，既然工人们“习以为常”，就沒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

善了，工人也就大可不必进行什么斗争了。何况在物价低落时，实际工资还有所“增高”，而在物价上涨时，又有“仁慈的”雇主主动地同情工人去“提高”工资呢？一片“和平”、“平等”、“友爱”社会的美景被李景汉以“实地调查”来的“真实”情况描绘出来了。不仅如此，李景汉还认为工人太不懂人情，工人占了雇主的便宜，而雇主是又大方又吃亏了！因为在物价低落时，没有人去降低工资。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的代言人吗？

真相大白，原来所谓站在工农立场上“具有工农感情”的李景汉不过是雇主的代言人。

每月平均十元钱=不冷不饿的最低生活水平=习以为常的生活，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资产阶级的“科学”。明明是雇主剥削工人，经李景汉一调查就变成了雇主宁愿吃着亏去照顾工人生活。本来是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情况，被李景汉一调查就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平了。难怪乎李景汉认为调查决定一切，一调查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李景汉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这种调查对中国人民会有什么用处呢？对科学会有什么价值呢？不难想像，为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服务的打着学者招牌的御用文人的社会调查是必然反人民、反革命的。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否认社会发展规律并从主观愿望出发，企图长期保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来阻挠中国革命。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之一就是豢养一批丧尽了民族天良的走狗，打着学者的招牌，以搞调查为名，来替帝国主义收集情报，为中国反动统治者服务。李景汉就是他们的御用文人之一。所以李景汉一再强调其社会调查之重要不是没有来由的。

李景汉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宣传其社会调查之重要性，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甚至像“旅行”杂志这样的刊物也不放过。

李景汉说：“若要真的找出一条救国的出路，真的要获得有相当

把握的建設國家之適當辦法或步驟，必先真的了解中國本身的內容，若要真的透徹的了解中國社會的真相，必先从調查研究事實入手”（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看吧，李景漢是個“愛國者”，要“救中國”，而其救法就是“調查”，真可謂之調查救國論者。於是李景漢等便“熱心推行社會調查運動”並被稱為這一運動中的一員“勇將”了（見陶孟和為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所寫的序）。

當時國內封建軍閥混戰，並勾結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把中國當成一塊肉，爭而割食。全國人民紛紛起來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中。在此民族危機之時，要救國本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好事。誰要救國就應該參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行列中去打先鋒。但調查救國論者却與眾不同。李景漢認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不過是一個“時髦的口號”，為了轉移鬥爭的目標，李景漢故意歪曲這個鬥爭並把它同派系鬥爭混淆起來說成為：“不順某人之眼或不合某派之心”的為私人利益的派系鬥爭；同時給真正愛國者加上了“禍國殃民”的罪名，並說：“如此亂打亂倒不大要緊，老百姓夾在打與倒的中間可就大受其罪了”（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李景漢認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是一種“破壞”行為。調查救國論者搬出了社會調查的法寶說：“社會調查的工作不是破壞而是建設，只要調查出來何者確應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的步驟如何，打倒以後拿甚么較好的來替代，否則先慢着打倒”（同上）。

當人民群眾已經動員起來，矛頭指向帝國主義，眼看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將被清掃出去了，這時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奴才們慌了手脚，大喊“且慢”，“且慢”，待我先來“調查”一下，是否需要“打倒”，並威脅說：“再要打倒就有亡國滅種之危險”（同上）。

李景漢既然是要去調查，那麼我們就來看一看李景漢調查了些什麼吧！

如前所述，李景漢的調查根本沒有接觸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李景漢調查的結果是地主、高利貸者對農民很好，資本家是工人的恩

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则一字不提。李景汉认为问题在于穷、愚、弱、私，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穷。那么穷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我们先看他“北京拉车夫的苦工”一文的解答。

在这篇文章中，李景汉除了将调查材料中关于人力车夫的穷苦生活情况重复的叙述了一番之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既没有找出造成穷苦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他的结论是：“从北京拉车的苦工这般情况看来，无怪今日中国的乞丐，丘八和土匪要盛行，这就是我国无产阶级的真相，我深盼谈什么主义讲什么政策的人们对于此种真相多少用心去调查，多去研究一番。须要根据事实，对症下药。不能见样学样，削足适履。大家先来量脚，好预备做舒服的鞋子，这是我所馨香禱祝的。”

李景汉在这里以无产阶级的“恩主”姿态出现，把“谈什么主义”的人们大骂了一阵之后，还是强调“调查”。

李景汉像是为了解救无产阶级的穷苦而去调查其实际情况，但调查的结果找出来所以穷苦的原因还是“穷苦”！不是吗？从人力车夫的生活看到中国之穷，因为穷，乞丐，丘八，土匪就多。那么他的逻辑就是再去调查乞丐、丘八，从那又得出结论还是穷。李景汉的办法是：穷——调查，调查——穷，那么就是穷，穷，穷；调查，调查，再调查。难道这样就可以救国了？！

李景汉的办法就是要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在封建主义束缚下忍受半死不活的生活。李景汉的调调是：“吃粗粮固然不好，犹胜于无粮饿死，破屋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屋冻死，好食物有，准备之后，再弃粗粮，好屋建筑之后再折破屋。否则非弄成鸡飞蛋打、国困民穷，甚至亡国灭种不可。”（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

以后李景汉也曾附和晏阳初的四大教育论点，赞成什么以生计教育来救穷，以文化教育来救愚，以卫生教育来救弱，以公民教育来救私；也曾提出什么节育、福民、增加生产等办法来救穷；又曾提出什么资产阶级的合作社来作为中国农村的出路。但在任何时候，李景汉的救国出路都是不要打倒封建势力，也不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都是力

求不从根本上解决問題的。充其量不过是作一些微小的改良，以緩和階級矛盾，麻痺無产階級的斗争意志而已。

由此可見，李景汉的調查是用来反对革命，反对馬列主义的。他們搞調查运动是为了抵制我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轉移人們的斗争目标，麻痺人們的斗争意志的。

李景汉的这一手法是与臭名远揚的胡适的反动观点一致的。胡适要少談些主义，李景汉就大罵“談什么主义的人”，就反对“打倒”。胡适要多談些問題，李景汉就去調查人力車夫之穷，調查农村之穷、愚、弱、私。胡适裝着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而抹煞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根本問題，裝着研究妇女纏足問題而不要触动封建主义的經濟制度。李景汉也一模一样地去調查人力車夫的穷，妇女的裹脚布有多長，婆媳关系，一个人一年洗几次澡等問題而抹煞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的压迫等根本問題。

李景汉是老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李景汉真正要救的不是中国而是帝国主义。李景汉的社会調查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这一点李景汉自己也不否認。他在“旅行”杂志上发表的“学术的旅行”一文中說“英国之所以有很多殖民地就是因为人們在旅行时发现之后报告国人而获得的”。李景汉就是本着这个宗旨来进行社会調查以为帝国主义效劳。

李景汉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專門充当帝国主义文化特务甘博的助手，并受他的雇佣来进行調查。以后他在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晏阳初举办的定县实验区进行調查，都是按照帝国主义的要求进行的。

資产階級社会学从其被搬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是用来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对馬列主义的。李景汉就是这样一員反革命的“勇將”。

这个老牌反革命的“勇將”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当然是不甘心的，总是希望有一天他的主子——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資产階級、封建地主还会卷土重来，总是念念不忘地想干他的老行当。因此人民給他悔罪的机会，他却不是真正低头認罪，而是假檢討企图蒙混过关，不是进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而是用“配眼鏡”的办法来学习馬列主义，

以便披上馬列主义外衣，販賣其資產階級的黻爛私貨。所以李景漢在解放后繼續利用其社會調查來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是根本不足為奇的。

解放后他所作的京郊掛甲屯調查充分證明了李景漢反動成性。他深知黨在农村的根本政策是實現農業合作化，要想使資本主義復辟并從根本上打垮社會主義就必須首先反對合作化，因此他就不遺余力地攻擊合作化政策，捏造事實，說合作化“不自由”，惡意誣蔑說：“昔日把人當牛馬是一定不對的，而今日却有時把人當拖拉機用一用”（李景漢：“北京郊區農民生活的過去和現在”）。在李景漢的筆下，解放后實現了高級合作化的農村是一幅多么悲慘的圖畫！但是誰不知道只有在解放后農民群眾才真正當家作主，成了社會和自然的主人，才永遠擺脫了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生活，并且才有可能并實際使用了拖拉機耕地。李景漢却故意顛倒黑白，說成是什麼“把人當拖拉機用”。為了達到他反社會主義的可耻目的，李景漢竟不擇手段到如此地步！

不僅如此，他還故意混淆是非，籠統地說：“有的社員要搞點兒家庭副業，說不定會招出批評、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或自發的帽子，被認為有礙于集體的發展”（同上）。我們說，在當時情況下，只要這種家庭副業宜于分散經營，并且不妨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發展，對國家和人民生計都有利，無論國家或合作社都是大力支持的。但是社員如想利用所謂的“家庭副業”來進行投機倒把，發展資本主義，則是不能允許的，應當而且必然會“招出批評、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或自發的帽子（這頂帽子是很合適的），被認為有礙于集體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如對通過所謂的“家庭副業”來發展資本主義的社員不進行公開的批評，不展開激烈的鬥爭，則必然會影響其他社員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妨礙合作社事業的存在、發展和鞏固，從而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巨大的危害。李景漢不分青紅皂白，混淆是非，然後據此要求“今后對於零星副業(?)不妨多鼓勵社員們在自己家內經營”（同上），就是要求不管是否妨礙集

体事业的发展，都听任社員們自由經營所謂的“家庭副业”，放任资本主义自由氾濫。李景汉利用他的顛倒黑白的調查，坚决引导农民抵抗社会主义而重新去走资本主义老路的阴谋不是暴露的很明显了吗？

李景汉深知土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資料，要实现农业合作化，就要变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所以他就在自留地問題上大做反革命文章。首先他惡意歪曲事实說，“农家的自留地是少到不到一分地，甚至連一点兒也沒有的”（同上），然后主張自留地可“酌量多給一点兒，这对于滿足社員的需要和情緒是不無小补的”（同上）。如果照李景汉的主張做去，社員的收入主要依靠自留地，那么合作社又怎么能够存在和巩固呢？挂甲屯的农民群众說得好：“我們入社主要靠土地，每人多留点自留地，那社不就垮了”？李景汉就是这样运用他歪曲事实的社会調查，企圖使合作社名存实亡，引誘人們繼續去走單干的资本主义的道路。

李景汉也清楚地知道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景汉，也就惡毒地攻击統購統銷政策。在李景汉的笔下，农村的情况是：“有几种日常用品的缺乏，使农妇們一提起来就皺眉头。例如不易随时能够买到捺底子所需要的麻，致使不少人家做不出家里人够用的鞋穿。”（同上）可是根据我們的調查，明明是农民的生活改善了，有錢买球鞋穿，而且球鞋比布鞋耐穿，适用，所以农民穿家里自制的布鞋就减少了。农民們也都反映合作社供应的麻够用了。李景汉故意把农民生活的改善顛倒为“做不出够用的鞋穿”，只能更充分地暴露出他的反革命本性。

李景汉深知工农联盟是无产階級專政的政治基础，所以他也不遺余力地挑撥工农关系，精心挑选了如下一些煽动性的詞句：“誰誰家的小伙子在工厂找到工作啦，回家的时候，衣裳穿的可漂亮啦。还有誰誰家的女孩子也进了工厂，头回看見穿花衣裳，現在連髮也燙

啦。一个工人少着每月也拿五六十的”。“现在连这兒的女孩子們都先在工人里去找对象了”。“不仅男子有了机会就往城里跑，连青年女子也往城里去找工作。一来收入多，二来也易于碰到符合目标的对象。这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结论是“农业没大起色，还是干工厂”（李景汉：“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现在”）。总之，李景汉所以这样精心挑选“事实材料”，就是要证明解放后工人农民的待遇是极端不平等的，农民甚至连找对象也成了问题，借以煽动农民闹事，从而分裂工农联盟。可是事实毕竟不是李景汉所歪曲得了的，周总理在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及谭震林同志在“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中都用具体的客观的数字材料，详细地论证了这个問題，证明工农生活虽有差别，但并不悬殊，而这种差别在一定的时期内还是必要的。北京郊区农民的情况和全国是一致的，并不特殊，只是较一般地区更富裕一些而已。大跃进以后的形势，更加生动地说明了党一贯关心农业的发展，一贯关心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以便逐步做到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高产卫星的不断出现，也雄辩地证明农业不是没有起色，而是高速度地往前发展。因此在事实面前李景汉不仅不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反而碰得头破血流，更露骨地暴露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貌。

综上所述，可见李景汉在解放后继续进行他的社会调查，就是在继续干他的反革命老行当：搜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以便利用所谓的“事实材料”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梦想这下子就可以天下大乱，他的主子——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可以卷土重来。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右派分子李景汉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终于原形毕露了。

三、李景汉社会调查的反动理论

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脱离不开社会学的理论观点的。

社会现象是十分复杂的，现象间有着内在联系，并按照一定的规律通过内在矛盾斗争而发展着的。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的工具，但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调查去认识客观世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对复杂的现象作深入分析，找出现象间的内在联系，而不至于被表面现象、外部联系所迷惑。企图不要任何理论为指导，采用有闻必录的办法，一經“调查”就可以认识社会的真相是不可能的。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研究社会问题应当在生产方式上面去寻找其本质根源。而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定体系，因此，这首先要看作是生产关系的一定体系。对一切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都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去研究。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产生与其相应的社会制度、政治观点和思想状况等。

离开社会发展规律，不运用阶级分析法是永远也不能认识社会的。

资产阶级社会学从来不研究也不敢揭露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来也不运用阶级分析法从生产关系上解释社会现象。而是从人口、地理等自然条件上去解释，从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去解释。资产阶级社会学派系虽多，归结起来，都是从其反动的阶级愿望出发，以现象解释现象。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还常常弄得前后矛盾、强词夺理，以至无法自圆其说。

资产阶级社会学把社会看作无数个人的机械总和。从这一观点出发，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就不是首先着眼在生产关系上，而是把人口、家庭等问题放到首要地位。于是像“……人口密度显然已达到饱和点，人口数目大约已经超过土地生产所能供给的限度，至少已觉人满之患”（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载“社会学界”第八卷），这种早已破了的马尔萨斯反动观点就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著作中出现。李景汉避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封建势力的束缚，却在那里对“穷、愚、弱、私”大肆调查，说什么农村文盲多是因为“穷”，农

村不講衛生、死亡率高也是因“窮”，而窮的原因是“人口繁密”；“人民之知識，健康”等方面也是人口的“繁密”程度所決定的。更妙的是李景漢把他污蔑中國人民的“馬馬虎虎、敷衍、麻木不仁、無情、怯弱、虛偽、多疑、講面子、萎靡不振、少生氣、缺乏創造力，不進取、缺乏公眾觀念、不清潔、不合作、缺乏組織能力等性情和習慣，……也說成是直接或間接與人口繁密有連帶的關係。”（同上）

李景漢在家庭問題上也大作文章，根據家庭人口的多少去探討什麼大、小家庭制度的好壞，並用家庭大小去解釋人們之間的關係、人們的思想等，說什麼“造成虛偽、依賴……青年婦女之痛苦等種種現象都是由人口眾多之大家庭所決定的”。

這種生物學派的社会學觀點，根本不看人的社会性，而把人當作自然生物，把人口作為決定性的社会因素。因為李景漢以現象代替本質，結果便弄得前後矛盾。他時而說“人口繁密超過了土地生產所能供應的能力”，時而說“人口愈多之家庭，地畝亦隨之而愈多”，時而又說“地畝增多之家庭，人口亦隨之增多”。而人口、土地、家庭等的關係到底是個什麼關係，不用說讀者莫名其妙，恐怕連這位稱為社会學家的作者自己也是莫名其糊塗的。

這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社会學者不承認社会发展規律，不承認社会現象間有着內在聯繫的緣故，因此他們只能孤立地研究社会現象，不找也不願找最本質的關係。結果是把一大堆現象堆積起來，講到什麼問題，什麼就成為決定因素。所以，李景漢就一會把人口作為決定因素，一會又把家庭作為決定因素，有時又把文化、教育作為決定因素了。由此可見，李景漢的“學術”不僅沒有科學性，就連資產階級的形式邏輯性也是很缺乏的。這種對社会問題無能為力的解釋和前後矛盾的現象是其偽科學的必然產物。因為他的反動階級利益与社会发展方向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而社会又不能按照他的願望來發展或停止不前，這是事實，是客觀存在着的。可是在客觀事實面前，這些主觀唯心論者却偏偏要按其主觀願望去解釋客觀存在，其結局只能是被碰得頭破血流。

馬克思对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早就下了断語，他指出，当無产階級的階級斗争一采用对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公开威胁的形态以后，“科学的資產階級的經济学之丧鐘，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問題的，已經不是这个理論还是那个理論合乎真理的問題，只是它于資本有利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違背警章还是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領津貼的論难攻击；无拘束的科学研究沒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辯护論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这段話对李景汉和他的同行是完全适用的。

李景汉的社会調查内容与胡适的实用主义观点一脉相通，他倆不仅在本質上一样，而在一些具体的事例上也很相似。胡适講少談主义多談問題，李景汉也是反对“談什么主义的人”，說这些人是“空談”要多去注意“社会問題”。他所看到的“社会問題”主要是穷、愚、弱、私四大病害，而胡适則認為是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貪污、扰乱）乱华。这是否事出偶然？不是的。我們不会只停留在現象上，以現象解釋現象，而是看到了他們的反动本質上共同性以后，才把这些現象联系起来的。

馬列主义者所以要認識社会，不是为了認識而認識，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才去認識社会。因此，我們通过現象抓住本質，引伸出必要的結論，以便去解決問題。中国过去是穷，我們認識到穷是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所造成，因此解决穷的問題，就必须推翻这一社会制度。而李景汉虽然承認中国穷，但却停留在穷上，得不出一点本質上的結論。

資產階級社会学及其社会調查的庸俗、煩瑣性在李景汉的著作中很突出地表現出来。这种以現象代替本質，扩大枝节問題掩盖根本問題的手法絲毫不弱于其前輩胡适。他除了調查四大病害以外，还有家庭大小，亲屬关系（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叔嫂关系等），巫婆，庙会以致兒童游戏方法，■面条的做法，甚至还有裹脚布的長度等，真可謂“显微鏡式”的“X光式”的調查了。这样，对于中国社会問題，他越“透

視”下去，就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無关了。

李景汉一再宣称他不是搞社会学理論的，对理論無兴趣；說他是只管調查不管理論的人；說他是重視实际的人，他像一張白紙似地去进行社会調查；他只管預备菜而不管炒菜，只管“开采矿石”，而随你去“煉出什么东西”来。这种論調是欺騙不了人的，尽管他的調查报告中只列数字和記錄，而很少有叙述和結論，仍然不能騙过人去。我們却很清楚，既是社会調查，就要提出調查什么內容，采用什么指标体系，如何整理分析材料等問題。只要一碰到这些問題就必然暴露了他的面貌，显示出他的立場观点来，从上面的叙述內容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調查的內容与調查目的是联系着的，什么目的就决定什么內容。为帝国主义、地主、資本家服务的目的，只能調查对他們有用的內容。而这些內容却不可能反映客观世界最本質的真实情况。解放后李景汉在北京郊区專門找地主、富农及落后分子去搜集一些反对合作化、反对統購統銷政策的材料，用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一事也是很好的例証。所以李景汉之反对理論，不是反对其社会学理論，而是反对馬列主义理論，因为以馬列主义理論为指导的社会調查必然揭穿社会本質，使他無法达到掩盖本質的反动目的。

四、李景汉的社会調查方法

揭开李景汉的階級立場及其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除了他抱着资产階級的幽灵之外，就再也沒有什么东西了。本来资产階級社会学就談不到什么科学。李景汉也知道这个貨色是見不得天日的，于是就抱着社会調查，把它說成純方法、純技术的東西，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应用的宝貨。那么我們就再来揭示一下李景汉的調查技术吧！

馬列主义者認為方法是不能与立場、观点分开的，社会調查的方法必然决定于其調查的目的和对社会的看法。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去看待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就会采用不同的看法。

李景汉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为統治階級服务的社会調查是对人民沒有任何利益的，是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的。李景汉对这一点

是直言不諱的，“你所決定調查的某區、某村、某街或某家，往往多半不歡迎你，也許根本不讓你調查，也許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叫你調查，但不跟你說實話”（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序言）。

要向勞動人民作調查，就必須解決這樣兩個問題：

1. 如何能使人們不拒絕調查；
2. 如何使人們在調查時說實話。

李景漢是非常重視這兩個問題的，他認為這是調查“成功與失敗的決着點，是須具有全副精神來解決的中心問題”（同上）。在多年的調查活動中，李景漢確是積累了一些“經驗”和“方法”，並且把它們當作寶貝似的寫在書中，發表在雜誌上，甚至在大學當作一門課程進行講授。解放後他還以此自豪，認為他這一套東西在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是的，在新中國及過去的解放區很少有人會的。因為這一套方法是與他的反動立場觀點緊密聯繫着的。只能供給資產階級學者們作為經驗，而絲毫不能成為我們馬列主義者作調查時的經驗和方法。

我們的社會調查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毛主席的社會調查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作，也一定作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

一貫站在與勞動人民對立的反動立場上的李景漢，對勞動人民只有嫌惡心情和不信任，那裏還能提到依靠群眾，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呢？他在“深入民間”以後曾說：“起初你願意和他打成一片，他却躲避，不願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後來他願意和你打成一片時，你又受不了，不願和他們打成一片了。……因為他本人的氣味使你不舒服，家內炕上不清淨使你坐不着；食品的粗劣使你難下咽，……就是能夠居然作下去，也免不了是很勉強的，痛苦的。”（李景漢：“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和感想”，載“獨立評論”，1935年12月）

反動統治階級的人物所信賴的就是本階級的人物，李景漢也不

例外，他非常明確地指出在進行調查時要依靠統治“當局”。請“縣長、公安局長及所指定的人員共同組織調查戶口委員會”，命令“在調查之前各家長等必須在家守候”，“村民如有隱匿戶口者，一經查覺或被告發處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的罰金”（李景漢：“從定縣人口總調查所發現之人口調查技術問題”，載“社會科學”，1937年4月）。

“召集地方各機關負責人員，紳士、村長佐及一些有關係的人物”，“向彼等領教，請他們幫忙”，“調查時最好有村長佐閭鄰長及其他辦事人同往，因為有了他們擔保無事，許多困難就迎刃而解”（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按照這條路綫去調查，解放後李景漢就有意地多方設法避開黨組織，以便於找地主、富農分子，因為他維護的是地主富農的利益，只有他們才能供給李景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因此，李景漢對於有個富農告訴他“布票不夠用”“不讓留自留地”等惡意中傷社會主義的詞句，就如獲至寶，不再查清事實，而用紅藍鉛筆划上杠、加上勾，旁注“要g”，頭里標着“特”字還有大圓圈，末後還記上“對這次訪問我很高興，這辦法很好”，這些惡意中傷的詞句也就成了李景漢反黨的“事實根據”了。而另外有不少農民告訴他“布票夠用了”，“談到合作化很高興”等，因為不合李景漢的見不得人的心意，都被他棄之不用了。

硬壓的辦法並不能使人民在這些調查老爺們的面前作完全的“順民”。因為這官府的牌子太臭了，於是李景漢也借用“社會服務團”、“平民學校”等名義去調查，這些團體多少給群眾一點“好處”，有着一副容易騙人的假面具。

給小孩几塊糖、帶去一些烟茶、請人吃飯等辦法，也被應用在調查方面，用這一些方法來對付“窮”“私”，而使“講面子”的人們總會少遭一些白眼。

假裝同情，引導人們去回答他所需要得到的答案是他常常採用的手法。遇有婆媳吵架時，見婆婆同情婆婆，見媳婦又同情一下媳婦，這樣就可以騙出几句話來，至於由此而造成挑撥家庭不和的後果，對他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在解放后，农民說不出李景汉如意的答案来，他就事先在报纸上找一些什么“暖水瓶爱爆炸，手电筒質量不高”的材料，然后再去向农民提問，結果就可以把农民对工业品質量不高的意見，变成其挑撥工农关系的“事实”根据了。

李景汉取得調查資料的方法是很多的。把老太太講的故事，群众傳說的桃色新聞和鬼神故事，歌謠，村言俚語等都記錄下来，道听途說，不分真偽，也不管它是什么年月的事情，只要合用，就可以作为实地調查的材料加以应用。这样是更便于捏造事实了。

偷听及与人談話时把鉛笔放在褲袋里作記錄都是李景汉的宝贵經驗。

在調查表上写上一副为民謀福利的对联：“若要知道用甚么好方法为农民謀幸福，必須清清楚楚的明白他們家庭的狀況”等等，把調查人改为拜訪者，把被調查人写为賜教者，这些騙术也作为經驗写到其“实地調查方法”中去了。

我們把他这一套方法归結起来，就是：(1)与官方勾結，进行欺压敲詐；(2)与当地土豪劣紳村長佐勾結，請他們作开路先锋；(3)进行欺騙性的虛伪宣傳，挂羊头卖狗肉；(4)施以小恩小惠、引人上勾，騙取材料；(5)道听途說，有聞必录。

李景汉的这一套經驗方法是他的亲身“实践”所得，但只能供給资产階級学者們作社会調查时来用，而对我們沒有絲毫用处。因为其中有着階級根源。站在反动統治階級立場上，永远解决不了他們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間的不調和的敌对矛盾和人民對他們的不信任，因此，他就只能在形式上施展欺騙伎倆。除此之外，別無他路。

对調查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分析，这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的过程。这就更不是簡單的技术問題了。我們所要求的是正确的認識社会現象和过程。必須依靠馬列主义为指导来整理、分析調查材料。李景汉所要求的是如何来掩盖真理，抹煞事实，他只要求这一方面的技术，因此就不需要什么科学理論的指导。

李景汉的整理、分析材料的“技术”与其调查的“技术”是一脉相通的，他的手法很多。

尽量堆积与说明事实本质毫无关系的材料，多多益善，以转移视线，混淆是非。而尽力避免触及问题本质的重要问题的材料，即便提出来也要把它变成合乎其本阶级利益的。如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包括了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和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与习惯，信仰，赋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兵灾等十七章，堆积了八百多页的篇幅，而不说明任何本质问题。以县长的年龄分配表与任职时间表及一些团体名称、组织机构的叙述充作政治调查的全部内容，使人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一触及本质问题，李景汉就用一些含混不清的如农人、田场、自耕农、自耕农兼租出等概念把真正的阶级关系抹煞了。

早就被列宁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学者惯用的笼统平均数及非本质标识的分组法，在李景汉的著作中则到处可见。例如在研究土地占有情况、生活水平情况、教育程度等等现象时，李景汉不分阶级差别的计算平均指标，以掩盖阶级矛盾。这里我们只具体地看一下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关于1930年71村土地占有情况的整理表就可以了。（见该书第650页）

第 277 表 中一区 71 村每村平均每家自有田地亩数

民国十九年

村 号 数 (以村内家数 多寡为序)	平 均 每 家 亩 数	
	有 地 之 家 庭	一 切 家 庭
1.		
2.		
3.		
⋮		
71.		

在表中71村有地家庭每家亩数总平均为26.5亩，占有最多的为

37.5亩,最少者为12亩,二者相差25.5亩。若以总平均数26.5为組中值,組距为10亩(即21.5—31.5)时,包括了48村,占71村的68%;若把組距扩大为20亩时,就包括了66村,占71村的93%。

李景汉对这个大表沒有給以任何分析結論。这也許是他只管买菜不管“炒菜”,只管“采矿石”不管煉矿的緣故。可是使用他預备好的材料是很难作根本改变的,給你魚你就做不出肉来。根据这个材料来認識旧中国的农村就会得出一个經濟地位非常平等的景象。大部分家庭占有土地数量相差不出10亩。如果考虑到李景汉所下的結論:“地亩愈少的家庭,人口亦随之而愈少;地亩增多的家庭,人口亦随之而增多。”(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136頁)則分攤到每一人口上的土地更是非常近似了。李景汉常常願意把中国情况同美国比較,用他的这份材料进行比較的結果,中国人在經濟地位上的差別不过是“大貧小貧”之差。“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維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它們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消費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然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李景汉:“定县土地調查”,載“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二期,1931年)既然如此,也就不需要階級斗爭了,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

事实絕非如此,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并不是像李景汉所說的那样“平均”,而是少数封建的地主占有絕大多数的土地,而絕大多数的农民只占有少量土地。根据李景汉在同一本書中的材料就可以知道有的家庭占有不到10亩地,而有的大地主却占有1,150亩土地。土地占有数量的差別是非常悬殊的。可是李景汉却不願把这种情况系統的全面的介紹出来,却千方百計地在抹煞階級差別的地方大作文章。这就不难看出,李景汉的整理“技巧”是有服务目的的,是在为封建土地占有制进行詭辯。

又如,在他的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有一張研究親屬关系的表(見下頁)。表中排列親屬关系在四十項以上,他不仅要統計总数,还要按土地的多少加以分組。他不仅計算人口絕對数,还要計算許多百分

比。結果整理出來一張占一頁半篇幅的龐然大表。到底用它來說明什麼問題呢？真是天曉得。在統計表中用分組法是可以的，分組法是進行分析時的重要統計方法之一。但是所選的分組標識一定要同所研究的事物有必然的聯繫。然而誰也沒有聽說過土地多少與親屬多少有着必然聯繫。如果二者有聯繫，你就會跟着李景漢而得出結論認為：男家主在家庭人口中所占比重是隨土地增多而減少的；土地為50—99畝的家庭是沒有祖母的；只有在土地為50畝以下的家庭中才能有祖父等等。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只有那種庸俗成性的人才會欣賞它的。

第39表 515家庭之親屬關係

親屬關係	人 數				人 數 百 分 比			
	0—50 畝之家 庭 內	50—99 畝之家 庭 內	100畝及 以上之 家庭內	共 計	0—50 畝之家 庭 內	50—99 畝之家 庭 內	100畝及 以上之 家庭內	共 計
男家主 …… (略) ……	411	80	18	509	16.63	9.40	7.72	14.25
…… 祖母 ……	3	—	2	5	.12	—	.68	.14
…… 祖父 ……	2	—	—	2	.08	—	—	.06

比這更庸俗的東西還有不少。在他經過整理而未發表的作品中有一份是研究夫妻關係的，他把夫妻關係分為十五組：少年夫妻，青年夫妻，中年夫妻，壯年夫妻，老年夫妻，夫與繼妻，夫與姘妻，老夫少妻，少夫老妻，活人妻與後夫，活人妻與前夫，夫與妾，未婚夫妻，夫與童養媳，殘疾夫妻。這種調查研究那里有一點學術味道，叫人看了也許認為李景漢在瞎胡鬧呢？實際上這正是擴大枝節的表面現象以掩蓋社會問題本質的研究方法。

篡改事實、顛倒黑白也是李景漢整理材料的伎倆。我們且找一個他手下調查員的原調查稿與李景漢所發表的著作對照的例子來看吧！

調查員的原稿：

“乡村农民值此破产，經濟崩潰的时期，各农家十之八九都是負有債，而不能归償。在此不能归償的情况下，放債主起初的态度是立逼苛要，县府起訟，以致欠債主被押……放債主积极無办法，就改为消极的討要，因感觉欠債主根本無錢，立逼是無济于事，所以后来放債主的强迫态度都轉为軟化，而从事緩和的办法，并情願舍去利息只要求归本……至于县城各銀号錢局，現在每日只派人到乡下去收款……并高唱宁舍利息而願意把本一时討回”。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736頁)：

“債主对于負債人到期不能偿还时，其态度大半頗为和平，因为債主是本地殷实的农人，商人或錢局，負債人均系鄰里乡亲，且多顧惜信用，尊重名誉，所以为欠債而起糾紛者甚少。……其因討債而成訟者亦有之，此种情形，多由于負債人家境貧苦，产业不多，为維持暫時生活起見，遂不讓前債主知道，又將該不动产轉押与其他債主，至債主討債时，双方均要沒收，于是訟事糾紛即起。結果只有將該产业完全变卖，按十分之几分償各債主。”

像这样無耻捏造、顛倒黑白的例子是不不少的。解放后挂甲屯的調查，他应用同一手法，用所謂“事实”材料来攻击党的政策。例如他說：“在現有的大家庭中，有的壯年成員看劳动力弱或完全丧失的老年人是一种負擔，想把他們分出去才好，且有的認為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強調农业社有公積金，还有五保、反正国家有救济老年的办法。在这种情形正在发展着的狀況下，当然有很多老年人不免感觉到生活的淒涼，甚至其中有想不开的，在被挤出家門的当兒，起了輕生之念，而把自己提前結束了。”(李景汉：“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現在”)在李景汉的笔下，农业社保护鰥寡孤独的五保制度倒成了置老年人于死地的制度了！但是我們詢問了建国社当地的派出所、村長、社干部和許多老年人，他們都一致說这里根本沒有发生过兒女赶父母的事，更沒有老年人因此而自杀的；許多老年人都反映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日子比以前好多了。事后，我們又查問了李景汉，

他推托說是听他的一个老同学講的，是河北省某个灾区的事。究竟是那个同学講的，是那个灾区的事，他却講不出来。可見純屬捏造。

从李景汉調查的原始記錄中还发现：有一农民告訴他布票都用了。他就根据此加以引伸，猜測：“他用去了所有的布票。是否由于布票的限制，反倒使他把布票的布都买了。”而这一假造的情况却成了他攻击統購統銷的“事实根据”，他在調查报告中写道：“还有一种值得回味的情形是：去年有的人家虽然不一定需要購入所分配給他們的所有布票尺数，但由于种种的用物限制，反倒刺激了他們尽量把所有的布票用尽了。”（同上）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竟不擇手段，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强加到农民群众身上。这就是李景汉所吹嘘的“显微鏡式的，X光透視式的”“科学的”調查方法！

如此伎倆捏造出来的調查报告，李景汉却要把他打扮成一副有“事实”、有数字的“科学”面孔，借以欺騙人民。例如李景汉說今日的家庭关系“显然和美的家庭約占十分之四，堪称和美的家庭約占十分之四，偏于不大和諧的家庭約占十分之二。”（同上）其他如夫妻之間，婆媳之間，父女之間等等的关系如何，均有比例数字說明。但是根据我們了解，他在“訪問农家項目的提要”中，並沒有这方面的內容。在被訪問的农家原始記錄里，也沒有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記載。那么这些数字是怎样得来的呢？原来是李景汉閉門杜撰出来的。請看他的底稿。他把家庭成員之間的比例关系分成三类（上：即感情好的；中：即感情平常；下：感情坏的）。比例分配情况是經過李景汉“科学推算”出来的。

	昔 日				今 日			
	1	2	3	最后决定 (小册子上)	1	2	3	最后决定 (小册子上)
夫妻关系								
每項改变程序								
上	2-3	3	2+	3	5	4	3+	4
中	5-6	5	5	5	4	4	4	4
下	2-3	2	2+	2	5	2	2+	2
父子关系								
上	4	4	4	4	7	6	5+	6

中	4	4	5	4	2	3	4-	3
下	2	2	1	2	1	1+	2-	1
婆媳关系								
上	1	2-	1	2	2	3	4	3
中	4	4	4	4	4	4	4	4
下	5+	5+	5	5+	4	3	2	3(左右)

可見李景汉的所謂“社会調查”，实际上是根據他自己的主觀意圖設想一个什么“問題”，拿下去總可以找到一些“可心的材料”，找不到合适的也可以把他們改變得合乎自己的心意，或者干脆進行捏造，根本沒有絲毫的科學價值可言。

“小偷多”是因為“吸白面的多”的原因；家庭成員都參加勞動就成了“旅館式”的家庭了；地主對“佃戶好”是因為有“同鄉同族之誼”等等，這就是李景汉典型的因果分析法。

綜上所述，李景汉奉為至寶的多年心血積累起來的調查方法與技術是什麼貨色不就一目了然了嗎？這與科學有什麼關係呢？

五 結 論

李景汉自稱能站在工、農立場上“具有工農感情”，實際上他是工人階級與農民的敵人。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調查工、農情況並不等於就是站在工、農的立場上了。

資產階級為了剝削、壓迫之目的，也去調查工、農的生活。但他們研究工、農生活之目的是為了如何加重對於工、農的剝削。當實際上已經使工、農生活降低到最低水平之下，使其剝削對象將要凍餓而死時，他們也會出來“同情”一下，用其剝削勞動人民之血來搞一下資產階級的“慈善”事業。有時就連這一點也沒有，而聽其死亡。而這種“同情”本身也是貓哭老鼠式的。一方面是為了防止與緩和一下階級反抗，一方面是為了保存其剝削對象，以便保持其剝削之來源。

帝國主義為了侵略之目的，也去調查殖民地、附屬國之情況，他

們的調查是為了加強其統治與掠奪財富。他們也研究人民之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但這是為了找尋其侵略之根據與借口，以證明其侵略之“正義”性。他們把殖民地、附屬國稱為“劣等民族”，而“劣等”民族生活水平之低下是由其“愚昧”與“麻木不仁”等天性所造成的。

無產階級、馬列主義者也調查工、農的生活，我們的目的是要找出其窮苦的真正原因，以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階級敵人，指出一條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並領導人民為其解放事業而鬥爭。我們的調查並不是孤立地針對一般的“窮”來進行研究，不是簡單地同情“窮”，更不是籠統地去同情任何人的“窮”。馬列主義者不僅僅看到無產階級的“窮”，而且看到他們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他們能夠解放全人類。

所以問題不在於調查和調查什麼，而在於站在什麼立場上，為了什麼目的去調查。

以唯心主義的觀點去調查，是事先假設了一定的結論，而去收集一些合乎其假設觀點的事例，以證明其論點之“正確性”。這樣他們的調查總不去認真地考慮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問題。他們也選點，但不是典型。他們也總不去考慮是否能反映客觀的真實情況，他們雖調查，但可以不是事實。他們也要講事實，但最多也不過是大家都看見的、聽到的而已。

以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對待調查，是以馬列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去收集事實的材料，它要從大量的現象中找出最本質的典型的事實，從大量材料的科學分類、綜合分析中得出結論，他的事實是本質的，是客觀存在的。

所以問題不在於是去調查，而在於用什麼觀點去進行調查。

資產階級的調查，對人民是有害的，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與抵制，而對資產階級本身進行調查，又有“商業秘密”等所不可侵犯的堡壘。所以他們的調查就必然採取威脅、利誘、欺騙等手法。

無產階級的調查與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這是為自己的利

益而工作。調查人与被調查者不是敌对的，人民群众会自动地自願地講出真实情况。所需要的是調查者“眼睛向下”的态度与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

所以方法本身也不首先是技术問題，而首先是政治問題。

用立場、观点、方法来鑒別一下李景汉的社会調查，它过去就本来不是鮮花，现在就更是毒草了！是毒草就要鋤掉，而且應該連根拔掉。

李景汉过去效忠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的統治階級，解放后仍然沒有改变。过去以反对“空談主义”的口号来反对馬列主义，今天則以什么“干巴巴的”“缺少說服力”来反对馬列主义。过去以其社会問題来与馬列主义对抗，今天仍然是以他杜撰的妇女、兒童等問題来企圖代替馬列主义。李景汉过去是以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口号来反对革命，今天則是以反对合作化、統購統銷等来反对革命。

可見李景汉等右派分子叫囂要复辟資产階級社会学及其社会調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学术問題，而是一个政治問題。

資产階級社会学及其社会調查是与馬列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們是从根本上否定的。它在新中国是沒有一点地位的，讓这些右派先生們抱着这个幽灵去“馨香禱祝”吧！

李景汉北京郊区农村調查 的对証与批判

若 吉 塵

右派分子李景汉从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断續地在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乡和东北旺乡作了一次社会調查,訪問了建国、东方和西北旺三个农业社以及其中挂甲屯、馬連窪等村的若干农戶。他最初在1957年2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一文,繼而在3、4月間又把它加以补充和修改成小册子“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現在”准备出版(因其真面目被揭露之后,未能出版),最后还在4月10日“新建設”編輯部座談会上介紹了他的这个調查。这个調查是章罗联盟反动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之一,他阴谋复辟资产阶級社会学。为了揭穿这个調查的反动本質和它的虛伪性質,在1957年10月間,学校派我們3人訪問了肖家河乡建国农业社及其所屬的挂甲屯等村的农戶(另外两个社,一个李景汉沒有調查的农戶,另一个社已于1957年春天划归北京农业大学改为国营农場),得到許多乡、社干部及社員的协助,使这一工作順利完成。

茲就李景汉調查中若干重要事实和主要观点对証与批判如下:

一、否定我們农业的前途,挑撥工农关系, 煽动农民脫离农业生产

首先,李景汉專門挑选了“农业沒大起色,还是干工厂”这样一个結論,根本上否定了我們农村发展的偉大前途,从而煽动农民脫离农业生产。“看人家工人多好,月月拿到錢,也知道准拿多少,随来随

花”，“誰誰家的小伙子在工厂找到工作啦，回家的时候，衣裳穿的可漂亮啦。还有誰誰家的女孩子也进了工厂，头回看見穿花衣裳，現在連髮也燙啦。一个工人少着每月也拿五六十的。”“不仅男子有了机会就往城里跑，連青年女子也往城里去找工作，一来收入多，二来也易于碰到符合目标的对象”，“女孩子們是特別首先注意軍官，所佩帶的肩章上的条兒和花兒越多越好……其次是把注意力轉到工人身上”，“当然这就很不利于乡間的男子找他的对象……因此，有些不安于現狀的青年，就往城內去找出路，他們幻想着只要成为工人就有可能在城內找到对象，否則亦有‘衣錦还乡’之一日，不愁家乡女子不另眼看待了。”更重要的是李景汉把这一切都称之为“这是近人情的”，“也难怪他們，軍官和工人的收入有多少啊！多神气啊！人是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甚至为“一般农村青年总想往城里跑”制造辯护理由：認為“这种現象是有利于工业化”的。

农业沒大起色嗎？我們首先用历史事实来駁斥这种謔言！北京郊区是1948年底解放的，从那时算起截至李景汉調查的1956年1957年，只不过是八年左右的时间，在这短短时间之內却经历了历史上最偉大的根本变革：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杜絕了資本主义道路，迅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也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生活。

拿建国社來說，它包括了挂甲屯、一亩园、福祿門、圓明园东片、中片和西片共六个自然村。其中大部分土地是在圓明园里面，并且都是近几十年內圓明园焚毀以后才逐漸由外县移民开垦出来的。解放前，农民虽然亲手开垦了土地但是也得一个租佃耕种权，每年仍旧得向頤和园交納地租，奉养軍閥官僚。所以这里的中农也完全是佃中农，在151戶中农中多少有一点私有土地的只有16戶，貧农的土地更少。另一特点是雇农的比重特別大，竟达到总戶数的20%左右，他們完全沒有土地。大部分土地都为地主、富农、資本家所占据，按人口他們只17戶，但占有土地达1,264.39亩，1950年的土地改革根本剷除了这种封建地主、官僚占有的土地制度，全部土地的所有权都归人

民国家所有，农民获得了無代价的使用权，251戶雇农、貧农和中农共分得土地2,756.3亩。

土改以后，农民虽然已經有了土地和一部分住房，但是由于这里以水稻为主生产垫本大，而家底又极其薄弱，以致雇农、貧农和大多数中农仍然不得不經受資本主义的剝削。其主要形式是高利貸卖青，秋收一石大米价值30—32元，但在春夏之間卖青只能卖15—17元，不到半年受剝削一半以上。据1952年材料估計，这几个村共卖青約800石，仅此一項，剝削即达13,600元。不少农民种稻子，一年到头不仅吃不上大米，甚至连稻草都沒有剩下。这就是自发資本主义道路所造成的必然厄运。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使农民获得了最終的解放。这个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始进行的：第一，从1952年开始組織了信用合作社，在国家銀行的帮助下广泛地开展了信用合作，并且把貸款利率由一分五厘降低到七厘二，严重地打击了高利貸。第二，从1953年秋季起国家施行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統購統銷政策，取締了自由市場，从而也就廢除和禁止了稻米卖青。第三，在土改的基础上立即发展互助合作，1954年即建立了两个初級社——光华社和建国社，共30戶，31个劳动力和176亩土地，第二年发展到152戶，191个劳动力和1,303亩土地，至1955年冬就实现了全面高級合作化，从此便基本上完成了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堵塞了資本主义道路。

經濟制度方面的根本变革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开辟了無限广闊的疆域，还在1955年初級社阶段生产就有了如下的增長：

光华社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积产量比較

	稻子	棉花	白薯	玉米	谷子	小麦
本社产量1955年 比1954年增長	7.8%	72%	11.5%	53%	21%	42%
本社产量比同年 互助組增長	7.8%	53%	19%	37.5%	7%	43%
本社产量比同年 最好單戶增長	12.2%	72%	11.5%	53%	13.7%	53%

建国社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积产量比較

	稻子	棉花	白薯	玉米	谷子	小麦
本社产量1955年 比1954年增長	20%	25%	26%	26%	35%	19%
本社产量比同年 互助組增長	4%	10%	10%	26%	35%	19%
本社产量比同年 最好單干戶增長	7%	20%	33%	30%	39%	24%

全面高級合作化以后，在头兩年內連續获得增产。稻子的亩产量1955年537斤，1956年增至540斤，1957年又增至656斤；玉米1955年273斤，1956年增至318斤，1957年又增至514斤；在副业方面，高級合作社的优越性更加显著：

	副业总产值	占农副业总收入	劳动力总数	平均每劳动力 副业产值
1955年初級社	20,931元	15.99%	191人	109.58元
1956年高級社	81,472元	25.54%	503人	162.17元

兩年來，建国社的公共财产积累已有相当的基础，举几項主要的：公积金41,674元、公益金7,371元、膠輪車14輛、大車10輛、碾米机3台、打稻机70台、水車5台、磚井4眼、自流井21眼、双铧犁与7吋步犁14架、牛馬驢騾40头，此外尚有魚場一处，猪百余头及种籽数万斤。这就为进一步发展生产与巩固合作社打下了物質基础。这是小农經濟沒有力量办到的。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公有制也保证了劳动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从平均收入的绝对值来看是这样：

	平均每戶收入	平均每人收入	平均每劳动力收入
1955年初級社	503元	124元	434元
1956年高級社	544元	115元	442元
1957年高級社	643元	137元	477元

如佃中农句振鐸，他的收入增長情况是：1955年476元，1956年522元，1957年638元。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活生生的具体数字說明什么呢？它說明社会主义农业是唯一最有起色的农业，它說明广大劳动农民的生活的前

景是無限美好的。李景漢所謂“農業沒起色”等謠言只是反映了一切不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剝削階級分子的垂死叫囂和他們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狂妄要求。

關於工農業發展的相互關係，李景漢所謂工業有前途農業沒前途，農民流入城市是有利於工業化，這完全是反映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观点。因為在那裡，資本主義積累的重要方面之一正是通過對於農村的掠奪和破產來進行的，大批農民流入城市成為失業的後備軍，資產階級正是這樣既掠奪了農民又最大限度地剝削了工人。但是在我們這裡，社會主義工業化則完全循着另外一條道路來進行的，在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明確地提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下，同時相適應地發展農業和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正是在這一正確方針的指導下我們大力地發展了農業，才為工業建設計劃的勝利完成提供了可靠的保證。農業的豐、歉直接影響工業，如1952年和1955年的農業豐收就促進了1953年和1956年工業建設的躍進，1954年和1956年的嚴重災害造成的農業歉收也就在一定意義上影響了第二年工業建設的進度。正是根據這些經驗教訓，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就明確提出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在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把工農業同時並舉規定為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重要內容之一。為了提高建設的速度必須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劉少奇同志在報告中指出：“大力發展農業，必將加速國家的工業化，加速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大大有利於改善全國人民的生活和鞏固工農聯盟。而如果没有農業的迅速發展，就不能有輕工業的迅速發展，也就不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為了實行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我們一貫地嚴格控制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因為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不僅造成城市的臃腫負擔，耗費國家建設的資金，同時也嚴重地影響農業的發展和農業社的鞏固。1956年底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更發布了“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實行幹部下放農村，軍官、職工家屬返鄉生產，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等措施，這一

切都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就是为了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我們是用兩条腿走路。而李景汉所指的道路則是使我們国民經济癱瘓，社会主义工业化破产，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的道路。

城乡生活的差别，乃是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城乡对立的历史后果。解放后的八年来，經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不仅消灭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剝削，而且也相当地促进了城乡生活水平的接近。根据建国社的統計，从每个劳动力来看，每个劳动日的报酬1956年是2.2元，一个壯劳力一月全勤可得66元；全体劳动力平均計算全年每人442元，平均每月36.83元；1957年更提高到477元，平均每月38.08元。再从每戶的收入来看，1956年平均收入544元，平均每月45.33元；1957年平均收入643元，平均每月53.58元，若是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月1956年是9.58元，1957年是11.41元。这里还只是計算了社內收入，此外还有社員家庭副业收入和因城乡生活費开支差别而得到的节约，据有的农民估算，他們花在住房、交通、粮食、蔬菜、水电、柴火等項的开支就比城市工人节约三成。由此可見，这里的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当于城市的一般非技术工人而略次于技术工人，所以这种差别也并不是很悬殊的。更重要的問題还在于如何对待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我們和李景汉是持着两种根本相反的立場和态度的。我們的目標是要最終消灭工农之間、城乡之間、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本質差别。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提出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以及实行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实行干部下乡上山等等都是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的。而李景汉别有用心地煽动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既拋棄了农业又損害了工业，这完全是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和资产阶级的观点。

关于青年农民不安心于农业生产和婚姻問題上的不良风气，在建国社來說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严重的，而是个别的和一时的，它是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輕視农业劳动的資本主义思想残余。据建国社統計，自高級合作化以后脫离农业社而轉入城市其他工作的只有10人，其中有4人是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有6人是剛毕业的中小學生。据了解，最不願意在家务农的首先是地主、富农子弟，挂甲屯10戶地主、富农，其中就有7戶9个子弟在外工作，另外3戶是因为沒有兒子或兒子还小；其次是家庭富裕的中农子弟，他們多上了几年学以后往往不願再干农业；絕大多数貧、雇、中农的子弟都是安心农业生产的。还应看到近兩年来，特别是1957年干部下放、学生大量参加义务劳动以后，农村的风气更有显著的改变。建国社在1955年就有1名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1956年又有1名小学生，1957年便有1名中学生和兩名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至1957年底尚未入社的數名中小学毕业生，在农村大躍进中，基本上都入社了。婚姻問題上也是如此，从解放以来，建国社6个自然村农业戶的閨女嫁給解放军的只3人，嫁給工人的有8人，嫁給交通警察的1人，在这12人中只有9人原来是从事农业劳动的，有3人原先是学生和工人。不仅是有农民妇女嫁出去的，同样还有女工嫁給农民的，青年男女农民結婚更是占絕大多数。李景汉所謂“比較好的都‘高就’了”，留下的是些“丑妇”，“这很不利于乡間男子找他的对象”，这些都是捏造和誣蔑。这里的青年农民只要自己劳动好、身体好和年齡合适的找对象都容易。仅据1955年至1957年9月的統計，这个社就有33个男青年結了婚，他們的对象有些在各个方面都是很好的。我們并不否認在我們某些农村中是存在有这种不好的风气和傾向，但这絕不是高級合作化以后才出現的，它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尽管它不是社会主义农民的本質方面，我們仍然以极其認真的态度对青年們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特别是实行了工农业并举的方針，农村的生产与文化建設各方面都在大躍进，同时干部下放农村和乡社干部坚持参加生产，这都使輕視农业劳动的残余思想习惯得到根本的改变，树立人人愛农村，到处支援农村的共产主义风气。但是李景汉却把个别缺点加以夸大并說是“近人情的”，“人往高处走”，这种观点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利益相違背的。

工农联盟从来就是我们革命和国家的政治基础。不论是在辯論会上或者是个别訪問交談之中，这里的农民都能普遍地懂得这个道理，他們用自己的亲身經历来駁斥地主富农的挑撥离間，有一个农民感动地說：共产党和工人老大哥不仅領導我們农民翻了身，分了地，走上合作化，并且还以工业生产来支援我們农民。給我們送来了双輪双铧犁和7吋步犁，帮助我們新打了3眼自流井，能灌溉水稻500多亩，过去这里虫灾鬧得很厉害，使用了工人們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农藥以后，这几年就沒鬧过大的灾害。农民对于輕工业品最重要的評价是：品种多、質量好、价錢便宜。过去使不起的东西，現在差不多家家都有了，像膠鞋、暖水瓶和手电筒等等。1950年100斤皮棉还只能換22丈布，1955年就能換27丈多了。这是群众自己反映的工农联盟的本質的东西。但是李景汉却把根本的方面抛开而專門挑选那些片面的現象，然后搜集起来并用“对于希望的东西而失望”的标题加以渲染，来煽动农民的不滿情緒，这除了別有用心的資产階級右派立場以外，难道还能用别的来解釋嗎？

二、攻击合作社制度，要求四大“自由”， 为資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李景汉在“感觉‘不自由’”的大字标题之下系統地攻击了合作社制度的各个基本方面。他說：高級合作化以来，“这个‘不自由’的含义是可以亲身体会而难以言傳的。但能从一些具体事实的表現上，大致看出来。”他認為在合作制度下是：1、自留地不自由：“农家很喜欢在給他留下的这一小片田地上，随心所欲地种些东西，吃到新鮮的青菜，吸自己栽出来的土烟，給家畜生产些飼料，也附帶着部分的解决了缺零錢花的問題。……但有些农家的自留地是少到不到一分地，甚至連一点兒也沒有。”2、投資和借錢不自由：“有点兒富余錢的社員，往往被動員‘自覺自願’的投了資，可是有的在背地里嘟囔着。”“缺零錢花也使一些人家覺着別扭，流露着：‘要用錢时，錢不在手頭……就說是跟社里借吧，手續条件什么的不簡單。去年还容易借，今年想借

点兒零錢用不行了’。”3、劳动不自由：“在过去，一般农民除了比較忙的大秋、麦秋时期外，一向是习惯于从容劳动着。还有的感觉自入社以来，一年到头得不到能够完全由自个兒支配的一段日期，有时需要办点兒家里的私事，可是找不出時間来处理。往往長时期的緊張劳动和不时号召的突击任务‘真够噲’等等。当时使我发生一种可能有毛病的感想：人們都知道昔日把人当牛馬是不对的，而今日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一用。”4、副业不自由：“例如有的社員要搞点兒家庭副业，說不定招出批評、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或自发的帽子，被認為有碍于集体的发展”。“去年，干部們多特別注意到社的集体副业……。但对于社員自己經營的副业，沒有得到应有的关心。以现实情况来看，今后对于零尾的副业不妨鼓励社員們在自己家內經營。如果过于強調集中統一而專搞社內集体副业而忽視了社員願意自搞的副业，尤其是有的人家在入社以前曾搞过某种副业或手艺，而在入社以后受到了限制的話，就难免发生了不快的情緒”。

是不是真的如李景汉所說的社員的正当自由遭到了抑制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我們首先来对証事实：

(1)关于自留地：建国社1956年共有耕地2,869亩,361戶,人口1,715人,平均每人仅只1.67亩,可見这里的土地相当緊張。即使是如此,全社也有234戶社員共留有自留地70.338亩,平均每戶0.3亩,其中大多数是0.1至0.4亩,少数的是0.6至0.7亩,个别的达到1亩。据几戶典型調查:魏廷方,5口人,养猪1头,鷄5只,荷蘭鼠10只,自留地0.2亩,自己說够了。張啓,7口人,本人抽烟,自留地0.3亩,自己說連吃菜抽烟都够了。一般說来,5口之家,只要有0.2亩自留地,吃菜是完全够了。有的戶4口人也留了0.4亩地,种的菜自己吃不了,这就留多了。少部分戶沒有自留地也完全是出于自願,他們或者是單身汉,或者是人手少,怕麻煩,不如从社里分菜吃省事。建国社在这次整风运动的鳴放过程中,并沒有人提出关于自留地方面的意見。

还必須着重指出,自留地在今后更高級的合作社里,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們觉悟的提高將無存在的必要,自然轉为公

有。在此以前，自留地是為了照顧社員吃菜而允許留下的，實際上一部分社員早已不留了，已經留的也都够用。但是李景漢卻抓住這不成問題的“問題”為一小撮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地主、富農嘶喊，可見他是別有用心的。

(2) 關於投資和借錢：社員和社幹部們通常所說的投資指的是農業社向社員征集資金，按照“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說來它是包括了交納股份基金和投資兩個項目。這樣的征集資金，建國社自全面高級合作化以來，一共只有過兩次：第一次是1955年冬，正是實現全面高級合作化高潮的時候，動員所有社員將主要的生產資料——主要是大車、牲口、農具、種籽和肥料——折價入社，首先是交納入社的股份基金——社員按勞動力的四個等級分別規定為70元到150元，如有不足者可用現金來補交，如有超過者則作為投資借社使用。貧、雇、中農的投資按照國家銀行的利率標準在三年內還本付息。地主、富農的生產資料作價扣除股份基金後的餘額則作為補交的公積金和多交的股份基金。這次征集的結果，只有兩戶富裕中農有大車、牲口入社，他們在扣除應交股份基金後尚有1,300多元投資在社，其餘社員都還未交足應交的股份基金，幾個地主、富農也沒有交足股份基金，而且差額甚大。這就直接地影響了合作化後第一年的春耕生產，但是在社員手中卻仍然還保留有一部分原來就為該年生產所準備的一般生產資料——主要是肥料和稻草——和現金。所以在1956年春天第二次發動社員投資，並且反復說明這次投資除照例付息外本金在本年內即全部歸還，有急用者還可以優先歸還，地主、富農的投資也同樣還本付息。總計兩次動員征集，扣除股份基金以外，共投資11,727元，1956年即已歸還5,593元，尚欠6,134元，分別在1957和1958年內還清。在這兩次征集和動員中應該說明的有以下三點：1、它所動員和征集的首先是股份基金，在股份基金尚未交足的情況下才動員了一部份投資，而且投資數還大大的小於股份基金尚欠的差額，這不僅是農業社為了進行生產所必需的，同時也是完全符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所規定的精神。2、社員所交納的主

要是生产資料,現金的数目甚少,仅只千元左右,而且这二者都是社員原来准备用于1956年生产的,因此在入社以后,随同土地、劳动力一起交社使用也是完全合理的,况且投資还有一定的利息。3、在这兩次动员征集中,除了在第一次中对于地主、富农的主要生产資料是依法点交入社以外,其它的都是动员后由社員自己送交入社,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强迫命令攤派現象。不願投資者也听其自便,概不勉强。所以,在这次大鳴大放当中,也没有人提出关于交納股份基金和投資方面的意見。

关于借錢問題。农民的生活往往是有青黃不接的困难的,郊区农民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前几年。而且保証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于發揮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自高級合作化以来我們是特別注意了這個問題。就农业社本身,在秋收和決算以前就采用了借支和預分的办法。建国社在1956年共預分了4次,1957年又預分了5次。此外还有零星借支,每次3元5元不等,社員看病吃藥都由农业社与診所、藥房訂立合同,免付現金,記帳償还。总計1956年預分現金94,837元,預分实物折价66,624元,零星借支15,218元,共176,729元,占总結算应付社員全部报酬196,467元的89%。这样的比例,在农业社來說已經是尽了最大的可能。因为預分、借支与年終結算不同,过高比例的預分和借支不仅妨碍农业社生产資金的周轉,同时也会在年終結算时造成許多超支戶或者再也分不到錢的戶,这样就会影响社員第二年的生活,大大地損害其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农业社的預分和借支不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它只能是解决社員一些日常生活和季节性的必要开支。至于保証社員在秋收以前的生活开支,主要是由信用合作社来解决。信用社是群众性的組織,它的周轉資金也是不多的,它在国家銀行帮助下主要是解决农民青黃不接时期的生活必要开支問題和特殊困难問題。关于其他的零花錢和巨額开支不得不进行严格的控制。借錢手續并不怎么麻煩,它在各村都有理事,每10至20戶就是一个信用貸款小組,社員只要經過組長介紹和本村理事的审查就可以到信用社領到貸款。在这次鳴放当中,除了地主、富

农的惡意攻击外，也有个别雇农說信用社借錢如“三堂会审”。其实，他本人是一个懶汉，口袋里只要还有几毛錢，就不安心生产而出去胡花，因此他們的信用小組和理事不得不对他审查得更加严格一些，既要保証其生活，又要督促其生产。

(3)关于劳动：农民們組織起来以后，特别是实行全面高級合作化以后，一方面在农业上进行兴修水利、精耕細作，在副业上开展多种經營，劳动的門路大大地增加了，另一方面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了完全的按劳分配，这就大大地刺激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建国社1955年初級社时每个男劳动力的全年平均劳动日是172天，1956年成立高級社以后就提高到205天，1957年再提高到251天；女劳动力增加得还要快一些，这不仅是在参加劳动的人数上，同时也在劳动日上，1955年平均每人全年劳动日60天，1956年就提高到115天，1957年再提高到約130天，兩年来增加了一倍左右。农民在單干的时候，由于各方面的限制，許多劳动力和劳动日都浪費掉了，組織起来以后，充分地发挥了劳动的潜力，創造了許多財富。这本来是最好的事情。但是李景汉却对它进行种种歪曲和誹謗，說什么“一年到头得不到完全由自个兒支配的一段日期”。“長时期的緊張劳动和不时号召的突击任务‘真够呛’”。最惡毒地是把合作社对社員的关系喻之为使用拖拉机，并且把它与旧社会地主把农民当牛馬使喚相比拟。首先，必須划清界綫，旧社会的农民是供人驅使受人剝削，而今天的社員却是自己当家作主为自己劳动，这在本質上是完全对立的東西，而李景汉却把它故意加以混淆、类比，并且暗示今不如昔。其次，就按李景汉所說的，把它跟旧社会当牛当馬的雇农長工来比一比吧！据建国社农民自己回忆对比：干長工，一年到头除了三大节以外都沒有歇工日，干完地里活还有地富家里活，刮风下雨也有活，那时請假办点私事真是难！就每天的劳动時間來說，那是兩头赶黑，連飯都在地里紧赶着吃，在这次大辯論中，一个雇农回忆当年給富农陈春发干活时的情形：当时雇工有兩句話“要吃陈家飯，得拿命来換”，“兒子不認識亲爸爸”（兩头赶黑）。即使这么拚命干，还要受飢受寒，与今天的生活怎能相

比,当然,如果以去冬今春农村的大跃进情况来看,那种大规模的兴修水利与积肥运动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农民群众的这种冲天干劲,是来自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人,对人民群众的这种伟大的革命气魄当然是不可能理解的。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如何看待“紧张”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指出“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于紧张’,宁可慢一点好。但是,难道慢一点就不紧张么?要知道,六亿多人长期处在贫穷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那才是一种可怕的紧张局面。为了摆脱那种局面,几万万人民鼓起干劲,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这是我们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的常规。这种‘紧张’完全没有什么可怕。”接着刘少奇同志也指出,毫无疑问,领导者应注意领导工农提高改进技术,来实现生产的跃进,并注意高潮中有必要的休整。我们热烈欢迎这种紧张,紧张才能使更快地富强、独立和自由,李景汉却说它“真够呛”“不自由”,他与我們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这不很明显吗?

(4)关于副业:建国社这几个村的农民副业,在入社以前曾有过的主要是:砸砂子、挑花、编席和饲养猪鸡鸭等家畜家禽。现在我们也来逐一考察其变化和是否受到农业社的限制。

砸砂子:解放前这里有十来家,现在只有二家。主要原因是砸砂经常需要主要劳动力参加,过去贫雇农多,没有土地,除了给人扛活以外就砸点砂子,它不用花什么本钱。土改后分到了地,主要劳动力下地去了。合作化以后社里的活茬多而且劳动报酬高,所以砸砂的人比过去少了。这里并没有组织过这个行业的合作社或小组,农业社更没有给以任何干涉,他们还是和过去一样单干。相反的,有的社员倒向社建议利用冬闲组织一部分劳动力来砸砂,既可以供给国家建设需要,又可以增加社员收入。

挑花:这是家庭妇女的副业。1952年有30多户,现在平时还有十

四、五戶，冬天有20來戶。減少的原因也並不是農業社的限制，而是在高級合作化以後，身體好、家務有人照顧的婦女都願意參加社里農業勞動，因為到社里勞動報酬高，一天能掙1元5到2元，而在家挑花只能得7、8角到1元左右。挑花業有合作社和小組的組織，但是它並不限制非社員挑花，相反地倒希望她們也能多做點，還有小組長幫助她們往海澱去領活和送活。

編席：過去有幾家或者主要勞動或者附帶勞動編席。合作化以後，分別成立了編席社和農業社，主要勞動力自願選擇參加一個。編席統歸編席社經營，農業社沒有組織家庭婦女編席。因為編席的葦子自1953年起即由國家計劃供應，本社生產的一點葦子只夠菜園用，編席社的葦子由國家從包頭運來供應。因此，除了少數家庭仍為編席社做些零碎加工以外，農業社既不組織也不限制。相反的，農業社卻為她們开辟了另一副業門路，就是利用本社出產的稻草打草帘子，1956年就有120—130名婦女打了一個多月草帘子，共打5萬多塊，一個婦女一天能打15—20塊，每天可得1元到1元5。

飼養家畜家禽是這裡農民普遍性的家庭副業。建國社據不完全統計：豬，1955年是297頭，1957年342頭，這是統計月份的數，全年累計則要比這個數字大得多；雞，1956年是2,919只，1957年是3,520只；鴨，1956年是52只，1957年即達954只。此外，這兩年來還發展了養兔和養荷蘭鼠，在1955年以前這些東西還沒有什麼人餵養，1957年就飼養到六、七百只。這些家畜和家禽，除了鴨以外，其他的絕大多數都是由社員家庭餵養。它們之所以有如此的發展正是由於國家和合作社的幫助。在國家方面：提高收購生豬價格（提高13—15%，按質論價），預付定購金（每只豬10元），供應一定的飼料，發給優待肉票（每出售一頭豬可以不要排隊優先購肉20—25斤），此外還免費供應防治豬瘟的藥（每頭豬每年打二針，僅藥水成本就0.8元）。在農業社方面：負責供應小豬（1956年就以賒購方式供應小豬250頭，其中有50頭是社里母豬生的，有200頭是從外地販來的），收購肥料，以及用預分、賒購和現金購買等方式供應一部分飼料（1956年就供應了米糠一萬斤）。這

些都給了社員以一定的幫助，今后還準備給以更大的重視和幫助。

除此以外，在單干的時候，貧雇農還有一部分剩餘勞動力在農閑時外出做臨時工，上中農則有大車牲口在外拉腳，泥瓦木匠更是經常在外做工。這些在單干時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在全面高級合作化以後便完全不同了。勞動力與大車牲口都加入了合作社，除了滿足社內的需要以外，合作社還統一調配泥瓦木匠、大車及農活少時的剩餘勞動為社外單位服務。這已是社里統一計劃經營的集體副業了。這不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完全符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規定，國家也多次指示禁止各單位不經有關部門和農業社擅自招攬小工和運輸車輛。因為他們已經是一種落后倒退的自發資本主義活動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合作社對於私自在外“抄肥”^①的人給以必要的勸止和整頓也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僅是符合於農業社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同時也符合本人的利益。有的“抄肥”戶自我檢查時說：“抄肥一年，錢也花了，工分也完了，糧食也沒份，落得兩手空空，過年還是回社好。”經過大辯論，在外“抄肥”的社員，基本上都回社勞動了。

李景漢的所謂“問題”和建國社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而李景漢的“問題”其根本點所指的是合作化制度“不自由”。他不惜用歪曲真相與捏造事實來誣指我們犯了一系列錯誤，以使用它攻擊合作化制度來達到其向右轉倒退的反動的目的。誰都知道，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命也就在於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基本勞動力在社的統一組織之下進行農業和副業的集體經營。而李景漢的所謂“不自由”也正是這四個方面，他所攻擊的靶子也就是這四根台柱子，如果把這四根柱子拆掉了，合作社當然也就垮了，而右派分子夢想的農村資本主義的復辟也就指日可待了。這便是李景漢“問題”的性質與目的所在。我們必須正告右派分子李景漢，這種復辟資本主義的妄想，是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

^① “抄肥”就是農業社社員私自搞副業活動，收入歸自己腰包不交給社，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自發行為。

三、李景汉的社会調查方法是伪科学的和庸俗的

科学的社会調查必須是客觀地全面地反映现实，并且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本質和規律。但是李景汉的調查，很大程度上却是恣意捏造、片面歪曲和掩盖規律。关于恣意捏造和片面歪曲，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这里再就其关于农民生活收入和生产的調查中的一些事例，补充說明他是如何掩盖規律的。

李景汉說：“今日在挂甲屯村……原来貧农和雇农成份的平均家庭收入約近于580元。原来中农成份的平均家庭收入超过580元。原来富农和一部分地主的平均家庭收入超过600元。”这就令人奇怪了，为什么高級合作化以后仍然是地主、富农的平均家庭收入超过中农、貧农和雇农呢？因为人們的常識都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質特征就与一切剝削制度私有制度根本相反，它最能体现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与一切剝削者对立。一般說来，在解放以前，地主、富农的平均收入高于中农，中农又高于貧雇农，这是客觀的規律，因为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决定收入水平高低的是私有财产的多少和剝削还是被剝削。但是这一規律在解放以后，主要是土地改革以后，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單干的条件下，收入最多的往往是上中农，因为他们与貧雇农相比則底子实，与地主富农相比則劳动好。及至高級合作化以后，基本的生产資料都已公有，并且实行了完全的按劳分配原則，各种类型家庭收入的水平便随着劳动力人数、强弱和出勤日多少来决定，誰家劳动多、劳动好，誰家收入就多。一般說来，中、貧、雇农的劳动力是好于地主、富农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劳动者，因此前者的收入也就高于后者。事实也正是如此，根据建国社1956年決算統計，平均每个劳动力的收入：中农503.8元，貧雇农381.05元，富农303.33元，地主276.04元；平均每个家庭的收入：中农625.7元，貧雇农463.65元，富农571.28元，地主337.38元（这里富农家庭收入比較高是因为他們劳动力最多的緣故，平均每戶劳动力人数：中农1.24人，貧雇农1.217人，富农1.88人，地主1.22人）。由此可見，科学的調

查总是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而李景汉的调查则与此相违背。

进一步，我们再看李景汉是如何调查计算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建国社曾经供给他一份1956年各户社员年终决算分配明细表，上面详细地列有各户的姓名、成份、人口、劳动力数、全年劳动日、劳动报酬、与上年收入比较等等，但是李景汉却对它藏而不用，另外制造了一个计算公式和方法，这就是：

$$\text{每户全年的收入} = \frac{(\text{一户1—7月劳动工分} \times 0.2\text{元}) + (\text{每月户内其他收入} \times 7)}{7} \times 12$$

所谓“户内其他收入”指的是房租收入和户内有人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收入，例如在工业、建筑、商业、政权、学校等部门工作或者是手工业者；0.2元是1956年每个劳动工分预定分值。这样的调查计算方法当然也不是科学的，其原因有二：

(1) 我们调查的对象是农民，农民的基本收入是两大项，即社内劳动报酬和家庭副业收入，这是反映农民劳动收入本质特征的东西。但李景汉却一方面把家庭副业收入抛弃在外，另一方面又把房租和工业劳动或其他劳动（如教员、干部）收入计算在内。事实上大多数农民都没有房租和工业等其他劳动收入，少数户有此项收入，他又是以此项收入为主，而不是以农业为主。所以，这样计算，当然是不能反映真正农民的生活水平的。

(2) 农民的劳动不论是农业或副业都具有极大的季节性（特别是在生产大跃进以前）。据建国社主任说，一般在春播与秋收的月份，基本上是全体劳动力出全勤，而且每天劳动所得的工分也多，男劳动力一天可得10—12分；在冬闲月份则是半数劳动力出半勤，男劳动力一天也只得七八分。所以，李景汉以1—7月份的平均收入来推算全年收入的计算方法也是不适宜于农民的，这是机械地套用了计算工人、教员、房租所有者等每月有稳定收入的方法。

李景汉自称他的方法是从大量现象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来作抽样典型调查的。但事实上却并不如此。这不仅从他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来，而且在他的实际调查过程中看得更明显。李景汉自己列

了一个訪問农戶的調查提綱，它共分12大类包括133种物品(这还仅只是写上名字的，此外每类当中又都有今昔对比和其他)，其中像象棋、扑克、裙子、脂粉、捕鼠器等等都应有尽有。据被他調查过的农民說，实际上他問的比这还要多，像小孩子擦屁股过去用多少草紙現在用多少草紙，甚至問妇女生小孩过去用多少草紙現在用多少草紙。这就是李景汉所謂的“典型”、“抽样”和“代表性”！它不仅是煩瑣而且庸俗，甚至引起农民——特别是妇女們的厭惡。

庸俗性还表現在他的接近农民的方式上。李景汉到农民家去的时候，口袋里常常是揣着兩盒烟、一包糖、还有面包等等，他以为只要有这样一点小恩小惠就可以引起农民的兴趣而不至于厭倦了。据他自己談，訪問最好是能帶上一个助手，他自己坐在当中或者一边用种种問題来吸引农民的注意力，助手就窃居另一个角落不声不响地記錄，据說这样就可以不知不觉地把农民的話勾引出来而且記下来；如果没有兩人，他一人就只談不記，据說这样就可以免除农民的疑慮。李景汉自称他是几十年的調查經驗并且有一整套的技术，其所講究的就是如此而已。难道这样就能避免农民的怀疑和顧慮嗎？沒有。据东北旺乡居民委员会主任談，李景汉在馬連窪作調查时就曾引起过当地农民怀疑，傳說和思想波动。

庸俗与煩瑣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它与資产階級社会学有着本質的联系。資产階級已經是一个沒落的階級，它再也不可能光明正大地反映时代的潮流，这就注定資产階級社会学只能玩弄那些庸俗与煩瑣的泡沫。資产階級与农民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农民不可能信任它，任凭資产階級社会学者怎样鑽研技术都是徒劳無益的。只有馬克思主义的調查方法才是唯一科学的，只有具备無产階級思想感情的人才能真正与劳动农民亲如兄弟、促膝談心。

四、李景汉調查的反动政治立場

李景汉的調查从選擇对象、取舍材料到整理报告，都有其明确的反动的政治立場。他自称調查了50多戶，但是絕大多数都是沒有原

始記錄也說不出社村和人名來的。其中只有馬連窪的9戶留下一些極不完全的記錄，有的幾乎就只有一個名字。據了解這9戶的成份和對農業社的態度如下：1戶富農（入社前有幾十畝地，4畝菜園，兩套騾子車，僱用長短工各一人，解放前還當過閻長），1戶老富裕中農（入社前有40多畝地，2頭騾，1頭驢和兩輛大車），4戶在解放前是貧雇農，但土改以後上升很快，都有菜園、大車和牲口，已成為新上中農或接近上中農，此外還有3戶貧農。在這9戶中只有2戶貧農對農業社是積極的，其他7戶，有的至今還沒有參加社里勞動而在家種自留地；有的對大車、牲口投資入社發牢騷：“財產攔進去了，得不到錢，受限制”；那戶富農入社以後偽裝積極騙取信任，甚至还一度擔任技術組長和記工員，但背地里盜竊公家的秧苗、白菜，工資多的輕活全分配給本家，工資少的累活分配給別人，自己遲到了不扣工分，還打擊其他社員的積極性。

從原始記錄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這些人告訴了李景漢一些什麼，以及李景漢又是如何對待這些談話的。例如，那戶富農跟他說：“布票不夠用”、“不讓留自留地”（其實他已經有270尺布票和3分自留地）。李景漢對於這樣談話都用紅藍鉛筆划上杠，加上勾，旁注“要g”字樣，上頭標着大圓圈和“特”字，末後又記上“對這次訪問我很高興，這辦法很好。”但是在原始記錄中對於那些說合作社和統購統銷好的話，李景漢就沒有這樣的標志了。可見李景漢在調查中熱心選取的竟是些什麼貨色！李景漢的這種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立場在這裡不表現得非常明確么！

* * *

李景漢的北京郊区農村調查的主要內容和我們的對証與批判就是這樣。歸結起來，他的這個調查是明確地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一方面是專門收集與反映了地主、富農等沒落階級階層的要求，攻擊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道路，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是運用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方法，販賣他那些庸俗而拙劣的貨色，攻擊馬克思主義，企圖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最後還應補充指出：李景漢並不是

一个孤立活动的右派分子，他的背后还站着章罗联盟及其所属的反动小集团为其后台老板；同时李景汉的北京郊区调查也不是仅此而已的单独活动，它仅仅是那个所谓“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反动小集团所阴谋策划中的“北京大调查”的一个开端。这个大调查的目的则是进一步地配合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来篡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如果把这些有关的政治背景和活动都联系起来，那么李景汉北京郊区农村调查的政治阴谋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本文所引李景汉的话，是出自他的文章：“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1958年2月1日至3日人民日报），未出版的小册子“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现在”和他在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1957年12月初稿

1958年5月修改

后 记

形势飞速发展，目前我国农村已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北京郊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文章是去年年底写好的，许多问题是就当时的情况写的。在现在的人民公社里将更加显示出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前途与社会主义集体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这就更加证明右派分子李景汉政治阴谋的破产，他们的叫嚣也就被铁的历史事实所再次粉碎了。

1958年9月

（原载1958年“教学与研究”第9期）

对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批判

定县中国人民大学下放干部调查组

前 言

一九二八年，李景汉脱下洋服，换上长袍，接受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的约聘，“深入民间”，进行了一桩较他几年前与美国文化特务甘博合作时规模更大的学术买卖。他以月薪二百多元的身价，委身于“平教会华北实验区”的工作，推行起“平民教育事业”，担任了该会定县社会调查部主任的职务。在定县进行了四年的社会调查以后，编著了一本资产阶级社会学界认为“差不多无所不包”（陈翰笙语）的“巨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该书出版后，李仍在定县进行调查。他的老上司陈达也语加勉励，认为李景汉的努力“很值得同情”。同时，他还认为“事实的搜集与分析，是社会研究的入门之路”。（引语均见陈达所写的序）。

果然，李景汉的这桩买卖是做成功了。自此以后，李景汉真是“鸿运亨通”，很得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青睐。既躋足于学者名流之列，又悠游于官僚买办之间，李景汉大翘尾巴，俨然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界的老前辈自居。

其实，资产阶级社会学本来就不是什么科学，而李景汉的不学无术，更为他的同行所熟知。只是在解放以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根本没有了兜售的市场，他们这才把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社会调查这面大白旗高举起来，想招摇撞骗一阵。他们的目的十分明显，他们企图强使共产党人信服：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可以填补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白”，借以达到阴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罪恶目的。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與資產階級社會學包括它的社會調查在內，永遠是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它就是在與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鬥爭中建立起來，並得到不斷的發展。它是人類智慧最高的集中表現，它根本沒有什麼“空白”需要資產階級的社會調查來填補。

在去年五、六月間，社會科學界的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我們面對面地展開了一場白刃戰，在這場激烈的鬥爭中，李景漢是資產階級“社會學界同仁”中高舉“社會調查”大白旗的勇將之一。他們也知道，社會學的理論已在廣大群眾中破產，唯有檢起作為社會學組成部分的社會調查來做他們最後的一張王牌，他們無視於無產階級的調查研究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早在馬克思活着的年代就完備地建立起來，並遠遠地超過他們。在中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最善於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社會進行調查研究的能手。但是，可憐的資產階級先生們卻主觀地斷定：要搞社會調查，就非他們不行。李景漢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堅守着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最後一個陣地。因此，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忠實信徒”諸如李景漢之流進行徹底的批判，這對於全部摧毀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最後陣地，肅清社會學留給人們思想上的不良影響，都有着重大的意義。

李景漢一生中所進行的全部調查，按其規模與後果來說是廣泛而惡劣的，他是憑恃“北京郊外之鄉村家庭”的調查起家，依靠“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發迹的。這兩個調查，對於李景漢來說，都是帶有商品性質的。但在政治上的危害程度却有輕重的區別。前者是他剛從美國回來在燕京大學教學活動的一部分，而後者却是晏陽初平教會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具有更鮮明的政治上的反動性。

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條件，就可以看出李景漢定縣調查的反動面目。李景漢在調查與編著“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期間，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中國革命轉入低潮，我們黨採取了從城市轉入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爭取和組織群眾，積蓄革命力量，以

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及其他地区的根据地相繼建立起来了。紅色政权所在地及紅軍所到之处，党发动了广大农民实行我們党的土地革命路綫。在这个时期中，紅色政权巩固起来了，特别是我們党的土地政策，对于全国广大农村中为数众多的貧雇农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而統治階級也最害怕这一点。

在当时，新軍閥蔣介石暂时結束了旧軍閥的混战局面。蔣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战胜了他的对手，因而彻底地投靠了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买办資产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这个蔣記王朝和它的主子們时刻也沒有忘記共产党的存在。他們除了組織軍事圍剿以外，也知道在政治上与共产党爭夺农村，爭夺农民。而晏阳初所标榜的加强乡村自治建設，推行平民教育的主張和行动，最有力地帮助了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李景汉的“社会調查”則是平教会活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与我們党爭夺农村陣地的前哨。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平教会之選擇定县作为他們的“实验区”，首先是由于定县豪紳兼大官僚大地主米迪剛的“邀請”，在他的老巢翟城村做出了一个“样子”，所謂“成效甚著”，实际上是大大地强化了封建地主階級对该村农民的統治。而后不久，平教会就与地方的反动政权机构密切地勾結在一起，办公处也由翟城搬到城里的考棚^①。这样就愈益得到蔣記王朝的重視和嘉許，在民国二十年四月，蔣介石和张学良还派人总结了他們的經驗。晏阳初說过：“本会对于定县的实验最先注意的就是社会調查”（概況調查第1頁），由此可見，作为整个“平教事业”重要部分的定县社会調查，其性質和作用的极端反动，已經不言自明了。

其次，平教会到定县大規模开展活动是在軍閥連年混战之后，定县的豪紳階級所以欢迎与支持平教会在定县的活动，也有它自身的打算。在民国十六年以前，定县人民遭受过三次大的战乱，一次是直

^① 考棚是定县城內一所很大的建筑。

皖之战，一次是直奉之战，一次是晋奉之战。特别是民国十三年直奉之战和民国十六年的晋奉之战，给定县人民带来极其惨重的损失，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甚至连地主阶级文人所编纂的定县县志也不得不慨然而叹：“民国以来，政争迭起……十余年来，骚然无宁岁”，“地方之糜烂，甚于五代之季”，（定县志卷十七兵事篇）。在民国十六年以后，定县的局势表面上看来似乎“太平”多了，但地主阶级看到，对于经受连年战争的洗劫，对“民主”、“自由”要求日益迫切的劳动人民，如果不搞些花招以转移人民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要求，那他们统治的基础是很容易动摇的，而平教会的一切主张恰恰符合了他们的这个企图。同时平教会拥有大量的美国经费（有说是庚子赔款，有说是洛克菲勒基金），“高级的学者名流”和“无偿”的波支猪种和斯字棉，以及一整套摧残劳动人民革命意志的教育方针，这样的“好事”，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这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就是这样通过它的代理人，带着精神鸦片，麻醉人民的斗争意识，紧紧地与中国封建地主结合起来，共同骑在人民大众的头上。

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就是为这种罪恶的事业服务的，解放以后，李景汉不仅不愿意认识自己的社会调查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反而大肆渲染自己的调查是如何忠实于“客观事实”、如何奉行“千闻不如一见”的原则。根据我们最近在定县的调查证明，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是完全不可靠的。他们吃着面包、牛奶“深入民间”，他所布置和依靠的调查网，绝大部分是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走狗村正、村副、头役和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如医生、小学教员等所组成的。他们根本没有深入到农村的基本群众中去，群众对他们的调查是敌视的，在我们最近的调查中，定县元光村贫农寇继光对我们说：“当时平教会天天讲天下人都是一家，一般高，没有区别，都是平民，但是会里的头头，都是有钱的人，暗地与地富们勾结，所以群众说他们是老财的组织”。因此他们获得的材料真少伪多，再加上李景汉本人的阶级本能和歪曲、拚凑、捏造的伎俩，这就决定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

調查”不可能反映当时定县社会的本質。

为了徹底揭穿李景汉定县社会調查的“秘密”——这是他三十年来借以欺世盜名的本錢，我們最近組織了一次对三十年前定县社会概况的調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們有兩個可靠的保証和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第一，我們有党的領導并得到基本群众的支持，这一笔三十年前的旧帳，年代虽然久远，但在对当时社会的基本問題上，我們取得了充分的材料，可以把这一笔帳算清楚。群众对我們十分热情，他們找我們談知心話，算細帳，提供和搜集資料，帮我們摆事实找根据，有的群众甚至半夜还找上門来提供情况。第二，我們有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論作为調查工作的理論基础，馬列主义統計学作为調查工作的行动指南。此外，我們是下放在定县参加劳动鍛煉的干部，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們在一年来的劳动中，已經与广大的农民群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这种真誠的友誼帮助我們順利地获得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这同时也說明了我們的調查与李景汉的調查有着本質的區別。

我們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們这次調查先選擇了四个村：翟城，东亭，高头和牛村，后来又增加了元光和东堤阳，这些村庄都是李景汉当年进行調查的重点村。

我們这个調查組由中国人民大学在定县的部分下放干部組成，計有張冀，万鍾民，于祖堯，王兆蘭，王俊生，傅春生，何士珺，叶善蓬，朱菊玲，刘元欽，范金菊，赵国虎，施兆福，秦玉琪，曹作軫，楊敦品，黄名長等十七位同志。我們根据調查中所發現的問題，写成这篇論文。全文分为五部分：“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的概况；关于土地占有問題；关于階級关系問題；关于农民生活狀況問題；关于賦稅和县財政問題。这篇論文是由于祖堯，傅春生，何士珺，赵国虎，万鍾民等五位同志分別执笔写成的。至于調查材料，我們准备另行整理彙編。

第一部分 “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的概况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李景汉之成为旧中国統治階級所賞識的

御用文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他的活动和作品一直披着“不問政治”，“实事求是”的超政治，超阶级的外衣，来欺瞞世人。实际上，从李景汉这一辈子齷齪的行徑以及一系列的著作中所反映的观点来看，都不难說明他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立場上与劳动人民为敌。他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投靠“平教会”，并在美帝国主义文化特务甘博的支持和經濟援助下进行的社会調查工作以及他所編著的“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一書，强有力地証明了李景汉是帝国主义最机灵、最忠实的奴僕。同时也是維護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利益的辯護士。

李景汉在該書的序言里，公开供認了他們在定县的社会調查，“不是純为学理的研究，所謂‘为調查而調查’，乃是为实用而調查，为随时应付本会之需要而調查”。这里的所謂“实用”，所謂“需要”，究竟是什么呢？李景汉也毫不害羞地答复了这个問題，他說：“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調查工作……特別注意愚、穷、弱、私四种現象，随时整理搜集之材料，分析各种現象之構成要素；发现愚、穷、弱、私等現象之原因，試下相当的結論……分別供給本会各設計之負責者，使他們有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对于定县社会調查的“实用”和“需要”，尚不仅如此，晏阳初在他的序中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說到社会調查，有人以为这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以法令行之，可以有种种方便。但社会調查的目的在得到事实的真相……在完成这套实地調查的学术研究之后，政府才能有方法上的一种根据”。他又說道：“寻出生活上的問題，进而解决此項問題，即整个工作要以社会調查为指南針”。

从这些不打自招的供詞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为什么李景汉是一个道地的洋奴，就是因为他們的調查是要“特別注意愚、穷、弱、私”的現象，对我们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剝削的根本原因加以抹煞。通过他們的調查，中国阶级社会中尖銳的阶级矛盾被抽掉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太愚蠢，太穷，太弱，太自私的現象了，这就正符合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胃口。

李景汉他們通过对“愚，穷，弱，私”的專門調查，就把一切社会問題都归結为人民“文化知識低下”所造成的。因此，就非得用四大教育①不能救中国。这种通过教育就可以解决中国国弱民穷的主張是极其反动的改良主义道路，是与我們党的階級斗争的路綫針鋒相对的。

其实，“平民教育”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并不是什么平民教育，而是地主階級与資产階級的綜合教育。根据我們这次对当时平教会教育內容的初步了解，可以看到他們所宣揚的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所灌輸的是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所培养的是安份守己，甘心受压迫，受剝削的奴隶性格。同时，更恶毒地挑撥农民与其他各階層人民的感情，在这次調查中，老农們还会唱当时平教会所教唱的“农夫歌”，且看歌詞內容就可見其流毒之深远：

農 夫 歌

穿的粗布衣，
腰里掖着旱烟袋兒，
手拿农作具，
受得劳苦与风寒，
农事完毕，
將粮交納完，
士工商兵輕視咱，輕視咱，
誰能活在天地間！

吃的家常飯，
头戴草帽圈，
日在田野間，
功德高大如天，
急急納粮捐，
自在且安然，
沒有农夫，

对于这首歌詞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毒素，不用解釋也是很清楚的，其中心思想不就是讓农民安份守己，不要革命，“安然”地接受压迫和剝削嗎？至于他們的教育方針和內容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李景汉之所以成为国民党統治时代的紅人②，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調查可以用“民間”的身份作掩护，为政府取得“社会事实的真

① 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穷，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的反动主張。

② 李景汉曾先后受聘于国民党中央訓練团講授社会調查方法和担任联合国农粮組織的統計專員，真是显赫一时。

相”，提供給国民党政府“建設社会方案作根据”。事实上是給国民党政府加强統治加强压榨的方案作根据，給地主阶级加强剝削作指針。可是，李景汉却不願意承認这一点，他說：“在报告多种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評論与結論，連較詳細的解釋也是很少的”，“因为堆积的材料这样多，叙述的篇幅已經很長，只先將这些不很整齐的原料发表，供給研究农村社会人們的参考，好像矿工把山間一塊一塊的矿石开出来，送給化驗师去化驗，由他們随便得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概况調查李序）。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謊！

讓我們来看一看“定县社会概况調查”包藏着什么貨色吧！

李景汉从1928年开始到七七事变前，一直在定县搞調查。在調查工作进行了四年时，拼湊了这部784頁的“巨著”。在这部資产阶级社会調查的“巨著”中，大量無用的表格圖式約占去三百來頁的篇幅。余下的四百多頁則充滿着对統治阶级和那个社会制度的歌頌。对定县的风土人情作瑣碎繁雜的考据和描繪，以达到其專門发现“愚，穷，弱，私”四种現象的目的。最可惡的是他利用各种伎倆在一些富有阶级內容的問題上，諸如土地分配，雇佣关系，农民生活水平，財政賦稅和教育等方面掩盖阶级矛盾，強調阶级調和，粉飾太平，給人造成一种中国根本不需要革命的印象。

李景汉把“辛苦数載”的調查材料，整理成十七章。除其中第一章地理，第二章历史及第十六章灾荒基本上是从有关定县的志書上抄襲来的，我們不去管它以外，其余十四章，自然也沒有必要逐章詳加介紹。我們在此，只就其貫穿在整个調查中的主导思想，立場和方法予以总括的批判，至于一些具体問題，如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阶级关系，农民生活水平，人民的賦稅負担和县財政等，我們將列成專題加以批判。

首先，我們通过对“概况調查”一書的結構的分析，就可以看到李景汉在定县的社会調查工作是以反动的資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論作指导的。他与其他某些社会学者一样，根本否認物質資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决定的力量。他把人們文化知識水平的高低說成是社会

发展的主要因素，他們認為只要社会上有“知識”的人能够发发慈悲，使“缺乏知識力”的人民取得知識，这个社会就会“健全”起来。因此，他們对于社会的考察和調查就不可能首先注意到社会的經濟基础。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調查恰好說明了这一点。他的調查是从上層建筑的集中表現即定县的政权机关和地方組織开始的。其次及于人口，教育，健康衛生，农民生活費，娱乐，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調查，最后才涉及到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等問題。在他們看来，社会現象，不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而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上層建筑。因此，他們的調查結果不可能不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走向反动的改良主义道路，乃是必然的結局，李景汉之墮落成为右派分子是自有根源的。

第二，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不厭其煩地歌頌了官僚政客，特別是孙发緒的“德政”，对定县著名的豪紳米迪剛也是讚揚备至，这就是“概况調查”第三章“县政府及其地方团体”的主要內容。在这一章中，除了抄摘一些县政府組織系統之类的圖式，各科室的职責等官样文章外，着重的考証了从清朝到民国的县知事，县長的任职期限，資格及年岁等。歌頌孙发緒創立“模范县”的功績以及米迪剛創辦“翟城模范村”对于全国农村“村治建設”的“貢獻”。

孙发緒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們沒有詳加調查，但从李景汉所渲染的来看，孙发緒如何由定县县長升任山西省省長，又如何努力推行定县模范县的經驗，并为閻錫山所秉承，使山西全省都推行了翟城式的村治等等，也就足够說明孙发緒是个什么人了。

至于李景汉所一再推崇的“米迪剛先生”，則几乎全定县的老人們都知道，他是翟城村拥有八頃地的大地主，自民国二年至十年历任河北省的議員，副議長等职，米家对农民的盤剝压迫十分殘酷。“模范村”事实上是巩固封建地主統治的同义語。根据我們这次在翟城村的調查，当时的村自治公所完全由地主階級把持。“老百姓对于自治根本摸不上边”，村長是地主米洛聚担任，他有二頃多地，村副是米洛重，他有一頃多地。村里最有权势的士紳还是米曉周，他是米迪剛的

二兄弟，村里的學田和公款全由他掌握，李景漢所一再鼓吹的“因利協社”，實際上是米家搜刮村民的高利貸組織，老鄉們至今尚稱之為“因利錢局”。“因利錢局”的管事人韓洛荃同時就是米迪剛家的管家。在定縣進行土改時，人們把米迪剛稱為黃世仁，而把韓洛荃叫做穆仁智。

但是，李景漢對於米迪剛卻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不只一次地恭維米迪剛如何有才幹，有遠見。事實上，他是在宣揚只要“村里領袖”（即地主）都能像米迪剛那樣“熱心舉辦公益事業”，那麼“全國村治劃一計劃能夠實現。民主政治國家的基礎，就能穩固的建設起來了。”（概況調查第119頁）顯然，李景漢所說的民主政治國家的基礎就是地主階級的絕對統治。他為了突出表現米迪剛對於這個“基礎”的貢獻，不惜捏造說翟城村的“鴉片及賭博等不良習慣早已絕迹，即連紙烟亦少有用者”。大家要知道，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這是很聳人聽聞的。但是，我們在翟城村調查時，於不經意的閑談中，老鄉們就列舉出：同洛尚，同洛云，米牛爾，秦洛璽等都是抽鴉片、吸嗎啡的大烟鬼。而米洛毡，同洛順，米洛盛，韓洛芬，秦洛琢等是最愛賭錢的大賭棍。由此可見，李景漢為了說明“村治”的成績，就敢抹煞事實肆意捏造。

第三，在人口問題上，李景漢也十分熟練地偷運了馬爾薩斯有關人口理論的觀點，不過，他是分次偷運，在冗長的篇幅中散見於各章，一下子不容易被發現而已。

他在人口調查中，利用他的調查材料論證了“家中人口多少與家中地畝多少顯然有直接的關係。地畝愈少之家庭，人口亦隨之而愈少；地畝增多之家庭，人口亦隨之而增多。亦可以說人口愈多之家庭，地畝亦隨之而愈多。二者互為因果”。（概況調查第138頁）

他在農民生活費的調查中，則論證了：“家庭的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實際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趨勢。換言之，家庭人口增多非為家庭之福，實為家庭之累”（概況調查第309頁）。這難道不是典型的馬爾薩斯的論調嗎？

他在人口調查中，還有這麼一段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說：“人

們常想中国旧式家庭既然为大家庭制度，其每家之平均人数必然超过西方小家庭制度之平均人数。实际并不如此。西方的农村家庭之平均人数多在4.5与5口之間。定县的平均家庭人数为5.8，較西方家庭仅多一口上下。中国农村社会中大多数的家庭不滿5口，而且有不少一口之家。这多半由于死亡率甚高，尤其是兒童的死亡。中国人种实在有衰弱的現象”（重点是我們加的——作者）（概况調查第143頁）。

我們姑且不去討論地亩与人口是否有本質联系，也不研究家庭人口增多对那一个階級的家庭是累贅，以及死亡率高的究竟屬於那个階級的兒童，我們在后面几节中还要專門談这些問題，这里，我們認為他的这些有关人口和家庭的論証，是在販賣貼上中国商标的馬尔薩斯毒品。因为从这些論証中，我們只能得出如下的結論：

1. 一个家庭的地亩与人口既然是成正比例的增減，而家庭人口的增多又要使生活程度降低，不能使人們得到家庭的幸福。所以，那些地亩少，人口少的家庭（农村中貧雇农的家庭），兒童死亡率高的家庭，一辈子討不起老婆的家庭應該認識到这就是“家庭之福”，而不应再有其他奢望。

2. 中国人口由于死亡率甚高，弄得“中国人种实在有衰弱的現象”，那么只有加强人种的改良，讓那些“优良人种”多繁殖，多結婚，建立美滿幸福的小家庭，那些社会上“低劣人种”則应禁止生育或少生育了。

这就是李景汉反复論証的目的！

此外，我們还要指出，李景汉与所有的資产階級社会学者一样，除了政治上极端反动以外，在他的“理論”上往往經常要陷于痛苦的邏輯上的自相矛盾中。例如，他認為地亩与家庭人口成正比例的增減，而生活程度又与家庭人口成反比例变化，不知自称对“家庭大小問題”研究有素的李景汉究竟如何解决呢？这种問題讓李景汉之流是一辈子也無法解决的。像这种自相矛盾，無以自解的混乱状态对于資产階級社会学來講是司空見慣，不足为奇的。

第四，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对許多富有階級內容的

社会现象，全部抹去了阶级的烙印，掩盖阶级矛盾，强调阶级调和，但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却并不高明。

他在教育，健康与卫生，娱乐，风俗习惯和信仰等的调查中，根本不願意提到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以贫乏的原因以及他们真实的精神面貌。李景汉所看到的，所描绘的都是社会上层阶级的排场和礼俗。例如，他对于乡村婚丧等礼节的记叙十分详细，这对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贫雇农来说，根本就是一种妄想。

他在农民生活费，财政赋税，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等调查中，都是把所有阶级的人口或农户打在一起加以平均的。同时在统计的分组法上要演戏。这样就把阶级对立，阶级分化的情况加以掩盖。他在农业一章中就是这样：当他考查租田制时，就把地主撇开不算，口称要按田产权来调查农户，实际上却是按是否耕种田地来划分，这样一来，全部从事耕作的农户（即所谓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就100%的有地种（参看概况调查第629页的第264表），于是，问题就成为农户只有种地亩数多少的区别，而不存在什么阶级对立。

李景汉几乎用同样的方法来总结定县当时第一区71个村的土地分配情况，他按照耕种田地的大小和是否耕种田地来划分农户，（参看第653页的第279表和第654页的第280表），结果，当然也是令人满意的：那就是占有100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实在不多，只有0.8%，他们占有土地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小的（4.6%），而大多数（99%以上）的农家则耕种95%以上的土地。于是诸如“这一带地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渐增，而佃农渐少”（同上书第629页），“大多数的农家是耕者有其田的，佃户仅占十分之一”（同上书第653页）等结论就脱口而出。

李景汉曾经认定：“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的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同上书，自序第3页），那么很显然，当时的中国早就“耕者有其田”了！一切对土地革命的要求，阶级斗争的学说，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等，统统是胡闹！

事情的真相究竟怎样呢？李景汉只能自怪不慎，我们就利用他在该书第654页上所透露的土地占有资料，加以粗略计算，就可以看出，在这71个村子里，6,555个农户中，8.2% ($\frac{95+444}{6555} \times 100$) 的地主和富农（其中包括着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已经占有土地总数的30% ($\frac{19870+22640}{133274} \times 100$)，即使“自耕农”中所包括着少部分富农或地主的户数和大部分的土地亩数还未计算上去，李景汉卑劣的真面目也是很清楚的了。对于土地占有的态度是决定一个人革命或反革命的分界线，李景汉应该属于那一类，同样也是很清楚的。

李景汉不仅在他的调查中偷换阶级对立的内容，同时，他还是一个粉刷阶级社会的化妆师，一切旧社会的罪恶事实在他的调查中一笔勾销。他说：“本区地主与佃户间之关系颇好，没有地主无理压迫佃农的事情。这大半由于双方有同族或近邻同乡之谊，平日感情很融洽，每遇婚丧等事皆互相往来庆吊。因此没有听见有佃农抗租或霸种，或地主欺诈或威吓的事情发生”（同上书，第635页）。

可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翟城村调查的时间也不算长，却听见了不少有关李景汉的老朋友米迪刚家的“旧闻”，这是农民血泪的控诉，请“没有听到”过的李景汉听一听吧！

一件是地主米洛华家（米迪刚的祖父）丢了一个车圈子，硬说是米洛杰偷的（是同族吧！），巡警奉命抓了米洛杰，定要罚他的钱，洛杰拿不出钱，被逼出卖了两个闺女抵还，一个卖到清风店给人做小老婆，另一个卖到元光村。事后查清是一个二流子偷去的。

一件是李洛厚知道地主米迪刚家的管家韩洛荃（韩本人也是一个地主）仗势干了许多坏事，爱在街上讲，不怕与韩闹对抗。韩为了拔去这枚眼中钉，乃雇人用绑架的办法，在夜间把李洛厚父子二人绑去打死，投入井中。

再一件是梁双喜借了米家掌握的因利钱局四百元钱，这四百元是利上滚利累积上去的，根本无法还清，债主逼，保人催，双喜走投无路，结果投井自杀，死后米家还是霸占了双喜家四亩杨树（共计80

棵) 和一块地抵帳。在这之前, 双喜的姐姐从地里刨了一棵小杏树, 被米家知道了, 就硬說这块地已归米家, 結果又賠了兩桌酒席了事。

还有米家每年都是根据佃戶庄稼收成的多寡好坏而定租的, 头年看到庄稼長得好, 接着就要提租, 租子交不上去就要收走土地, 地主們經常吓唬农民說: “反正要种地的人有的是”。农民交好租子, 种地才有着落, 剩下的粮食大多吃不到麦收, 都是吃糠咽菜, 喝稀糊塗粥混日子, 卖兒鬻女, 打短工, 下关东有的是! 这就是翟城村杜洛西等几位六、七十岁的老农們所描繪的当时社会的情景。而李景汉却如此顛倒黑白, 掩盖社会真相, 他們感到非常憤恨。

第五, 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調查, 只是罗列現象, 用現象來說明現象, 用現象来掩盖本質。根本不願意触及問題的本質, 原是他一貫的手法。

例如, 他在有关教育的調查中, 一共只有85頁的篇幅, 就用了95个表格来罗列各种各样的現象。在賦稅調查中, 135頁的篇幅, 各种稅法条文及圖式共約占去90來頁, 剩下的文字說明又是大量的稅目的解釋, 其他如健康与衛生, 农民生活費, 乡村娱乐, 风俗习惯及信仰的調查等, 类似的情形同样严重地存在。

我們从他这許多方面的調查中, 只能看到大量“愚, 穷, 弱, 私”的現象, 而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例如, 他在教育調查中摆弄了一大堆材料之后, 所找到的中国农村文盲所以多的原因是这么兩条:

第一, 田亩与文盲的关系, 即“家中田亩数增加, 識字者亦随之增加, 田亩数减少, 識字者亦随之减少, 貧富与教育程度有密切之关系”。

第二, 田亩与接受教育時間長短有关系, 即家中田亩数愈多的, 入学時間就愈早, 上學年数就愈長。家中田亩数愈少, 入学時間愈迟, 上學時間愈短, “总之, 农民經濟能力与他們的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

我們認為在旧社会里, 家庭的貧富和識字者的多少, 受教育時間

的早迟长短,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本质的联系,旧中国农村的文盲所以多是由于几千年来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不谈打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无法解决彻底扫除文盲的问题的。

尽管李景汉曾经下定决心对调查材料不表示态度,不下结论,可是,他经常忘记这一点,在许多问题上情不自禁地要露出马脚,暴露了自己反动的政治立场。

第六,李景汉除了罗列现象,用现象解释现象之外,对于一些极其次要的现象进行琐碎繁杂的“考证”,这个功夫可算是到家了。因此,在他的调查报告,庸俗无聊的东西,占去了极大的篇幅。

在这位堂堂的大学教授“巨著”中,我们竟可以找到旧式妇女的缠脚布多宽多长,什么颜色,什么质量,价钱多少的记录(同上书,第270页),不能不叹为观止。更有甚者,他用七页的篇幅调查了农民的食品,除了一页多点是叙述农民的吃饭时间,食品的种类和比例,以及诬蔑农民不会讲卫生以外,其他六页就开列了一张食谱,解释定县农民23种主食和21种蔬菜的名称和做法。我们引用一下他对“饺子”的解释来看一看他所调查的所谓“社会真相”:

“饺子,饺子有煮饺子与蒸饺子两种,煮饺子也叫做水饺,蒸饺子也叫做蒸饺。农家常用白面与荞麦面包饺子,饺子馅有荤素,普通多用白菜,萝卜,胡萝卜,北瓜等。饺子皮与包子皮一样做法,不过包子的形状是圆的,饺子的形状是半扁圆的。包子竟(别字一个,尽字之误)是蒸的,没有煮的,饺子有蒸的,有煮的”。

天啊!这位先生竟把妇孺皆知的常识当作至宝似的“矿石”来开采!这种例子是极多的,例如,他在乡村娱乐,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调查中,记录了許多无聊的,地主阶级所欣赏的歌谣,地主阶级所奉行的风俗习惯等,为了节省笔墨,就不再引证了。

这就是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我们怀疑他的调查是给中国人看的。

李景汉几十年来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欺世盗名,当然,我们在上面还只是概括地指出他的社会调查的轮廓,其他的毒花毒草,我们还必

須詳細地、澈底地加以批判。

第二部分 关于土地占有問題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剝削制度。土地大部分操縱在地主階級手里，广大的农民却少地或無地，这样就为地主对农民的殘酷剝削提供了物質基础；同时这也正是我国农村長期处于貧困和落后的根本原因。为了使农民群众获得徹底解放，使旧社会的农村狀況完全改觀，首先必須推翻旧的統治关系和旧的土地制度，这也就是我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經走过的革命道路。

地主和买办階級的代言人，为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应用各种反动的理論来为旧社会的土地剝削制度进行辯解；李景汉之流就是这样一种人物。

李景汉無視旧中国农民遭剝夺，处于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貧苦狀況，硬說“大多数”的农民是“耕者有其田的”，过着什么暖衣飽食的生活。現在来看一下他所引用的材料和所作的解釋吧。他說：“71村6,555家中，完全耕种自有田地者（即“自耕农”——作者注）計2,682家，約占总家数的41%；耕种之田地內一部分为自有田产而一部分系租入者可謂之半自耕农，共計2,308家，約占35%；耕种自有田产一部分而租出自有田产一部分之农家数目約占7%；沒有田产而完全租种田地之佃农約占11%；男子为人佣工而只得工資糊口之家約占2%；將田产完全租出而不自种之地主約占1%；無田产而也不以种田为生之家約占3%。从此看来，大多数的农家是耕者有其田的，佃戶仅占十分之一。”（李景汉：“定县社会概況調查”，第653頁）

这里，我們不能不从根子上来揭露一下李景汉的这一花招，所謂“大多的”农家就以“自耕农”、“自耕农兼租种”和“自耕农兼租出”三个組的农戶來說吧！它們合起来占总农戶的82.8%，看起来的确是个多数。但問題在于李景汉这三个組所包含的内容是些什么，是否都能算作“自耕者有其田”呢？这是需要研究的。

“自耕农”，这應該是指那些自己耕种自有土地的农戶，主要是中

农,也有小部分貧农。但是有一部分为数不大的雇用長工和短工来耕种自己占有的土地的那些地主和富农,似乎在他所列的組別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其实不然,只要从他把“完全出租的地主”单独列为一項,那么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把那些沒有完全出租自己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列入了“自耕兼租出”这个組里了,而沒有出租依靠雇工来耕种的少数地主和富农分子却列入了“自耕农”这个組里去了。

“自耕兼租种”的农户應該主要是貧农和一部分中农。

“自耕兼租出”主要應該是出租的富农及一部分富裕中农。按照李景汉的方法,这一部分出租土地同时也自己雇人耕种的地主富农分子也包括在內了。这当然也是錯誤的,因为自留耕地又出租的地主、富农都不能看作是“耕者”,因为他們只是完全或主要依靠被剝削的雇农来从事耕作的,他們自己本身确不是什么“耕者”。

为了便于研究問題,姑且利用李景汉的分組形式,按照我們从高头村所得到的材料,并按照对这种分組內容的正确理解来研究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是“耕者有其田的”。

以下是用高头村1930年左右103戶的材料,按李景汉的分組形式所作的农户分配材料:

类	別	戶	数
自耕农		24	
* 自耕兼租种		47	
** 自耕兼租出		4	
佃农		12	
雇农		5	
完全出租之地主		2	
非地主也不耕种者		1	
*** 合計		95	

* 其中有貧农36戶。

** 凡自留耕地兼租出的地主、富农都沒有包括在內。其中只是兼租出的富裕中农。

*** 按照103戶中可以包括的內容所作出的合計。

按照这个表所包含的内容，需要先把“自耕兼租种”中36户贫农的情况研究一下，他们的土地占有材料如下(高头村的)：

	户 数	平均人口数
3 亩以下	8	6.1
3 — 不足 6 亩	11	7.4
6 — 不足 10 亩	7	4.3
10 — 不足 15 亩	7	6.9
15 — 不足 20 亩	2	11.5
20 亩以上	1	—
合 計	36	

这些农民看来好像都有自己的土地，但却少得可憐。其中有50%的农户，他们占有的土地都不超过6亩。这个村的36户贫农共有人口265人，共占地256.4亩，每人还平均不到一亩。共租地395.6亩，每人平均租地1.5亩，租地超过自有地1倍多。即使这样每人也不过合到2亩半地。显然他们是要靠租地来勉强为生的。这些农民都是处在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下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把他们称作“有其田”的农民呢？很明显，按照我们的这个材料来看，到底有多少农户是“耕者有其田”的呢？充其量不过就是那28户而已，他们只占总户数的27%。难道这是农户中的“大多数”吗？显然不是。

相反，如果按照李景汉的研究方法，则同样的材料将会作出另一种结论。因为那样我们就需要把完全没有出租土地的2户地主和2户富农列入“自耕农”了(这一组则由24变为28了)。有自留耕地兼租出的2户地主和2户富农就要列入“自耕兼租出”这一组里去了(这一组则会由4户变为8户)。按照他的观点，还需要把“自耕兼租种”的全部也包括在内。这样计算的结果所谓耕者有其田的当然就不是27%而是80%了，这自然是和李景汉的结论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见，李景汉只不过是采用了一种混淆黑白的分组研究观点和方法，来掩盖在土地占有关系中存在的阶级差别，从而证实他那

荒謬的論點以為剝削統治進行辯解。事實恰恰相反，決不是大多數的農民已有其田，而是迫切地需要得到自己的土地。

李景漢不僅否認舊中國廣大勞動農民所處的那種愈來愈加貧困的狀況，反而認為“自耕農、半自耕農”在增加，而赤貧如洗的佃農却在減少。他這樣寫道：“據農民的意見（農民的意見？這不是借刀殺人，便是進行可恥的捏造——作者注），這一帶地方（原東亭區——作者注）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漸增，而佃農漸少”（同上書，第629頁）。

這完全是一種顛倒是非的說法，在舊中國由於地租、高利貸、商業資本以及其他各種苛捐雜稅的剝削，農民日益貧困；特別是國民黨當權以後，地主、買辦和官僚們相互勾結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村的統治和壓榨，農民的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最後他們不得不以低價賣出自己的土地，遺棄了自己的子女走上破產、赤貧的道路。定縣並不例外，在1926年左右在東亭附近的元光村只是由於龐村高利貸者劉洛海一人的剝削就喪失了土地300多畝。就從李景漢自己所引用的關於“民國十七年”6個村的“典當田地”的材料也可以看到當時農民處境之困苦。據他所寫，在這些村子中有“七分之一人家是典當田地的”，當價還不到地價的一半。至於當田的原因有幾種：“由於家中生活費不足者占41.9%，還舊債者占19.4%，辦喪事者占16.61%，辦婚事者占12.9%……”（同上書，第746頁）。可以看到由於日常生活費的不足和償還債務兩項就占到61.3%。諸如此種剝削和貧困的加深，“農民一面更多地失掉了土地，一面更多地依附於土地；失掉的土地是屬於自己的，依附的土地是屬於地主的……”（陳伯達：“近代中國地租概說”，增訂本第75頁）。在這種情況下將是貧者愈貧，富者益富；土地更加集中了，佃農也就更加擴大了。

根據我們最近調查的東亭鎮1930年左右207戶的各階級土地占有情況的資料可以說明這一問題（見下頁表）。

地主、富農階級的戶數僅占總數的6%，但集中了全部土地的46.2%。而占有戶數60.7%的貧苦農民只占有土地的12.2%。難道貧苦農民的數量還算少嗎？

类 型	戶 数 (%)	占 有 土 地 (%)
地主	3.1	34
富农	2.9 > 6	12.2 > 46.2
中农	33.3	41.6
贫雇农	60.7	12.2

李景汉不仅在土地占有关系上混淆黑白，而且在“自有田产”这一概念的掩盖下大耍花招。

“田产”是表明土地占有数量多寡的一个概念。因此它只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十分明显，如果我们不分占有土地的多少，只是在“田产”的籠统的概念下等量齐观那是錯誤的。

李景汉盗用了这一反映客观的概念，进行了無耻的、反科学的勾当，他利用“中一区”71个村的材料作出一系列的虛構的平均数字。其中包括71个村每村“有地之家”和“一切家庭”的平均地亩数，还有71个村总的“有地之家”和“一切家庭”的平均地亩数（前者为25.5亩，后者为21.6亩）。試問，在一个村的範圍內，特别是在71个村的範圍內，不管他是只有少得可憐的一亩地、几亩地的貧苦农民，也不管他是占有几百亩、上千亩的地主、豪紳，却都一律加以平均，这种拙劣無耻地抹煞階級差別，掩盖农村階級矛盾的手法不是十分明显的嗎？难道采取这样一种手段就可以証明旧中国农村的那种严重的貧富差別不存在了嗎？这一切企圖都是枉然的。

不仅如此，李景汉在解釋占有田产大小不同的原因时，那种为地主階級辯护的拙劣本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竟然把在土地占有数量方面存在的階級差別和經濟根源統統归結于家庭人口的多少。他写道：“地亩愈少之家庭，人口亦随之而愈少；地亩增多之家庭，人口亦随之而增多。亦可以說人口愈多之家庭，地亩亦随之而愈多。二者互为因果”（同上書，第138頁）。为了証实他的这一謬論，以大施魔术的手法玩弄数字資料。現在来考察一下他所引用的这个材料吧（資料来源同上書，第138—139頁）。

515 家六種家庭人口之平均數

民國十八年

地 亩 組	家 数	人 口 总 数	平均每家人口
0—9	174	823	4.73
10—29	167	1,071	6.41
30—49	76	593	7.80
50—69	43	453	10.53
70—99	37	398	10.76
100及以上	18	233	12.94
一切家庭	515	3,571	6.93

表中按地亩数分的各个組，只能表明占有土地規模的大小，却决不能說明土地占有数量的多少。平均每家人口数，这只能表明家庭大小的規模，却不能代表人口数量的多少。

在前两个較小規模的組里(0—9, 10—29亩)所包含的主要部分是貧农，和一定数量的中农以至个别的富农。在70亩以上規模的組里所包括的主要是地主、富农。(在离城近的較小的村里，在50亩以上的組里，地、富就比較多了。)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一点：在旧中国貧苦的农民由于生活的逼迫，再加上惡劣的經濟狀況和保健条件而造成的晚婚，較高的嬰兒死亡率等因素，就使得他們不便于去維持和不易发展那种旧的大家庭制度。相反，正是那些地主之家，由于他們有着雄厚的寄生基础，因而才有可能去維持那种几世同堂，几輩同居的封建大家庭的傳統。因此占有土地規模大的(地富之家)，大体來說家庭的規模(家庭人口多少)較大，反之則小。

但是占有土地規模的大小与人口数量的多少却没有这种联系，同样家庭規模的大小与土地占有的数量多少也没有这种联系。李景汉在这里趁隙大耍把戏，他用占有土地的規模代之以占有土地的数量，把家庭規模代之以人口数量。就这样来混乱正常的邏輯关系，給人們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土地愈多的人口愈多，土地愈少的人口也

少。事实恰恰相反，倒是戶少、人少的剝削階級占有了大量土地，戶多、人口多的广大农民却占有极少的土地。我們只要就他所引用的材料略为加工，这个事实的真相就会大白。

	中 值	戶 数	人 口 数	土地占有亩数		平均每人占地(亩)
				絕 对 量	%	
0—9	4.5	174	823	783	>27%	0.94
10—29	19.5	167 >66%	1071 >56%	3256.5		3.04
30—49	39.5	76	593	2402.5	4.5	
50—69	59.5	43	453	2558.5	5.6	
70—99	84.5	37	398	3126.5	8	
100及以上	164.5	18 >10.7%	233 >16%	2961	>40.4%	12.7
合 計		515	3,571			

根据原材料計算出土地占有亩数和平均每人占地数，这就使我們看出：占戶数66%，人口56%的农户(广大貧苦农民)只占有土地的27%；占有戶数10.7%和人口16%的戶数(主要是地、富)却占有40.4%的土地，而且愈是占有土地規模小的組，他們每人平均占地亩数也就愈少，这完全符合实际。

現在再用我們由翟城調查得到的1930年左右300多戶的材料来看一下情形是怎样的：(按李景汉上述分組形式进行的)

占有土地規模	戶 数	人 口	占有土地数(亩)	平均每人占地(亩)
0—9	117	422	588	1.14
10—29	159	901	2,491	2.8
30—49	45	338	1,560	4.6
50—69	16	160	850	5.3
70—99	11	130	885	6.8
100及以上	12	188	2,510	13.4
合 計	360	2,139	8,884	

从我們最近得来的材料，也同样証实了这个問題：不是人口多的

占有地也多，人口少的占有地也少，相反的是占有大多数人口的农户占有少量土地，占有人口少的农户（主要是地、富）却拥有大量土地，这正是旧中国土地制度的根本特点。

由此可見，李景汉所宣揚的那种人口决定一切（包括土地占有）的論調是毫無根据的。誰都曉得财产占有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国家的經濟基础，一定的經濟基础是反映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如果說一个社会的經濟基础和整个制度能为家庭人口的数量所决定，这豈不是荒謬絕倫的嗎？李景汉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維護旧的剝削制度。

伴随着土地占有的集中而来的是土地使用的分散。过去，地主阶级掠夺了大量土地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他們把大批的土地以高額的地租出租給分散的小农，而自己却完全不經營或者只經營着面积不大的一小部分土地，这样就形成了土地使用分散的局面。

一方面是土地占有的集中，另一方面是土地使用的分散，这就是旧中国土地分配的特点。

李景汉一方面为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进行辯护，同时却又大談土地“耕种”的分散問題。他的这种态度看起来好像有些矛盾，其实不然。对于李景汉來說，維護旧的統治剝削制度是他的本能，他的立場是異常坚定而明确的，他对过去封建制度所遺留下来的土地分散的状况表示不能滿足，只不过是為旧的統治和剝削制度开辟更为寬广的道路。从他所表示的具体态度和立場就可以看出这个問題。他对土地使用上存在的分散状态是这样評論的。他說：土地使用的分散在“工作方面頗不經濟，灌溉甚不方便，实有重新整理之必要”，又說“有利的方面是一农家可以有高窪与肥瘦不同的田地”（同上書，第625頁）。从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可以看出他絲毫沒有，也不願意触犯到旧的土地剝削制度，相反，只是出于对旧的土地制度的关怀，他的主張只是在旧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

李景汉打算如何“整理”呢？按照他的說法就是要建立“使土地大量的集中，采用大規模的耕地合作的办法而能采用机器，从事大規模生产”的“大农場”。什么样的“大农場”呢？当然不是像他說的什么“苏

俄集体农庄”的騙人的鬼話而是“适于資本(重点是作者加的)集中”和“雇用农业專家的农場”(見“定县土地調查”第41頁)。

由此可見，李景汉所向往的道路正是农业中的資本主义大經濟的道路。

李景汉在土地关系的問題上提出了各种荒謬的論点，采用了各种反科学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掩飾农村的階級矛盾，为旧中国的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剝削制度辯护。但是他又不滿足于封建式的小塊耕作狀況長期存在，因此在不損害旧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土地耕作分散形式的改良办法，从而通向資本主义的农业道路。

以上所述就是李景汉在旧中国土地問題上的真实面目。

第三部分 关于階級关系問題

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一書編著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企圖抹煞階級矛盾，麻痺人們的思想，削弱群众的斗爭意志，从而为巩固封建地主买办階級的統治服务，因此，在他的这本书中，貫穿着虛伪，捏造，歪曲。

李景汉懂得，要想巩固地主买办階級的統治地位，首先必須要抹煞階級斗爭，因此他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来尽量美化剝削階級与被剝削階級之間的关系，如在租佃关系上，李景汉捏造說“本区地主与佃戶間的关系頗好，沒有地主無理压迫佃农的事情，……平日感情都很融洽”。^① 在雇佣关系上，他写道：“主人对工人很照顧，每年中秋节，主人請工人坐上席，并亲手給工人斟酒”，^② 在借貸关系上，李景汉無耻地为剝削者捧場，他說“債主对于負債人到期不能偿还时，其态度大半頗为和平，因为債主是本地殷实的农人，商人或錢局”，^③ 李景汉把剝削者与被剝削者之間的关系，描写得是沒有压迫，沒有矛盾，沒有斗爭，互相間是亲密無間的，企圖以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635頁。

②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647頁。

③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736頁。

此来掩盖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但是事实始终是事实,掩盖是掩盖不了的。

根据我们最近在定县的调查,只从下边几个方面,就可以充分地说明三十年前定县地主阶级高利贷者对于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当时定县阶级矛盾之尖锐,从而也就可以揭露这位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言人——李景汉所著的臭名昭彰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的反动性。

(一)

先从租佃关系谈起。我们在定县的东亭、元光、东堤阳、高头、牛村、翟城等六个村进行调查所了解的情况刚好与李景汉相反,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很融洽”,而是矛盾十分尖锐,不是“主人对工人照顾”,而是前者对后者的残酷剥削。

首先从地租上看,三十年前定县这一带的地租,主要采取两种形式缴纳,即实物租与货币租。实物租一般以谷子(即小米)为标准,货币租则以银元为单位,从我们的调查中,一般佃农向地主缴纳实物租的情况如下:

三十年前定县翟城等六个村佃农向地主缴纳
实物地租情况调查

(以谷子为标准)

单位:斗

村名	每亩产量			每亩地租			地租率(%)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东亭	15	8	4	13	7	3.2	86.6	86.5	80
元光	9	—	3	7	—	2	77.8	—	66.8
东堤阳	12	7	4	9	6	3	75	85.7	75
牛村	14	—	2	12	—	1.5	85.7	—	75
高头	14	—	2	12	—	1.5	85.7	—	75
翟城	12	8	—	—	—	—	—	—	—
平均	12.7	7.7	3	10.6	6.5	2.2	82.8	84.4	72

从以上材料,我们即可看到地主阶级当时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

殘酷的。从一般中等水平来看，地租率高达84.4%，农民辛苦一年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柴禾、谷糠和寥寥無几的粮食。我們訪問了許多老农，曾經向他們提出这样的問題：“你們辛苦一年，得不到什么东西，为什么还要租地主的地种呢？”他們的回答是：“地在人家手中，不租来种，就連我們一年吃的糠，燒的柴禾也得不到啊！那时候我們整年吃糠咽菜就是这个道理”。要是遇上个丰收年，佃农們还可多得一点粮食，要是遇上个天灾人禍，地租还得照繳，佃农就只有破产。

这些情况李景汉是尽量加以掩盖的，如果用我們調查的实物地租繳納情况的資料与李景汉的“調查”資料对比，即可看出李景汉对数字的歪曲与捏造。

关于三十年前定县翟城等六个村实物地租情况李景汉的
調查与我們的調查对照表

(以谷子为标准)

單位：斗

	每 亩 产 量			每 亩 地 租			地 租 率 (%)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李景汉的調查数字	14	10	5	6.5	3.2	1.5	46.2	32	30
我們的調查数字	12.6	7.7	3	10.6	6.5	2.2	82.8	84.4	72
差 数	1.4	2.4	2	-4.1	-3.3	-0.7	-36.6	-52.4	-42

注：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一書中为了掩盖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剝削程度，他不敢計算地租率这一尖銳無情的指标，我們所列的李景汉的亩产量及地租兩欄数字，是分別由該書兩個地方找到的。“亩产量”見該書第660頁，“地租”見該書第639頁。

从以上的对照可以看出，李景汉为了掩盖剝削，他采用了夸大亩产量，縮小地租量的手法，这就充分地暴露了李景汉的本質，李景汉到底維護那一个阶级的利益，就不言而喻了。

另外，我們也曾調查了定县三十年前的貨幣地租繳納情况，与李景汉的調查对照，也同样說明了这一点。

我們的調查資料与李景汉的調查資料，数字相差如此之悬殊，这只能是由于資料来源不同的緣故。我們的資料，是由为数众多的被剝

削者亲手提供的，而李景汉的資料，不是从剝削者那里得到的就是自己捏造的。从这两个对照看来李景汉“調查”的階級性不就十分明显了嗎？

三十年前定县貨幣地租繳納情况对照

(每亩貨幣地租)

單位：元(銀元)

	上 等 地	中 等 地	下 等 地
李景汉的“調查”所得資料	5.6	3.3	0.7
我們的調查所得資料	10.4	8.17	5.31
差 数	4.8	4.87	4.16

注：李景汉的調查資料見“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633頁。

不仅如此，李景汉在他的“大著”中，对貨幣地租却大加贊賞。他說：“現款納租法与双方都很便利。地主無須監督佃农，可在种地前收款，謂之上納租，免去許多爭執。佃农除已交之款外，可自由种地，不受地主之干涉”^①，在將实物租与貨幣租相比較中，李景汉还这样来玩弄詭辯术：“只按該年而論，上等地和中等地用現款納租較高于用农产納租……若按一年中价格最高之时，也許按农产之租金略高于現金納租矣。”^②

看样子，李景汉还裝出一副好人像，还处处为农民打算。这里，我們就不能不通过一些事实来揭露一下貨幣地租的實質，从而現出李景汉丑惡的嘴臉。

事实上，貨幣地租对农民的剝削比实物地租是更加殘酷的。据我們了解，在定县一般貨幣地租都是采用“上納租”的形式，即农民在种地以前(一般是清明节以前)都必須向地主繳清全年租金。我們知道，一般佃戶都必須在秋后打下粮食，才能繳得起租子，要在种地以前繳租是十分艰难的。但是为了种地，多数的佃戶只有向高利貸者去借錢繳租，忍受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这就大大地加重了佃农的負擔。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632頁。

②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634頁。

不仅如此，在秋收以后，新粮大量上市，地主高利貸者、投机商人，又压低粮食价格，用低价收購佃农的粮食，佃农出卖农产品以后，除偿还高利貸者之外，就所剩無几了。所以根据我們了解，农民是极端仇視貨幣地租的，而对地主來說，却是大大有利。因为当时一般地主，又是高利貸者，他們收得貨幣地租以后，又可將它作为高利貸資本，重新又来剝削农民。这种貨幣地租和高利貸相結合的剝削形式，其殘酷于茲可見。而李景汉却把它描写得对农民那么方便、有利。其所以如此顛倒黑白，歪曲真相，只不过是為了迎合剝削階級的口味，取得他們的垂青罢了。

地主階級，在地租上对佃农进行剝削，并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还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来对佃农进行压榨，如借故“加租加押，大秤收租”或“小塊土地，大塊出租”等，根据我們的了解，这些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由于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在当时（即1929—1932年左右）仅东亭一村，佃戶破产的就达20余戶，如貧农張曼之（現在东亭村第五生产队）就因还不起地主的租子，不得不含悲忍痛，將自己的五个亲生女兒，卖掉四个，自己还被逼得去給地主扛長活（即当長工）。

在这种封建地主階級对农民殘酷压榨的情况下，地主階級与农民之間的关系，是像李景汉所写的那樣“地主与佃农的关系頗好”嗎？是“平时感情都很融洽”嗎？

情况不是这样的，由于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地主与农民之間，結下了世世輩輩的血海深仇，不是“沒有地主無理压迫的事情”，而是沒有地主不無理压迫佃农的事情，不是“沒有听見過地主威吓或欺詐的事情发生”，而是到处都听到农民对地主罪惡的悲憤的控訴。

还是听一听农民的发言吧！元光村五十多岁的貧农寇繼光說：“那时刀把子在人家手中，誰敢动一动就别想活了，那时我們是有眼淚往肚子里流，有仇恨往心上記啊！”即使这样，也不是沒有农民反抗地主的事情发生，据貧农侯国宾（現元光村党支部副書記）說：“民国二十年在元光村就发生了十几戶佃农毆打地主的事情”。那时他还亲身

参加了。在1945年定县发生了平民团大暴动。在定县土改时，光元光一村即斗倒了兩戶地主十二戶富农，在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千年的血海深仇，恨不得把地富們活剝生吞。虽然干部一再交代政策，但仍然不能平抑农民的义憤。这些情况，这些农民的控訴，恰是給了李景汉一个既清脆、又响亮的耳光。

(二)

再談雇佣关系。广大的农民，受到了長期的殘酷的剝削，大量破产，他們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力，去給地主富农們做牛做馬，受着他們的奴役。而李景汉在叙述农村中的雇佣关系时，又使用了他惯用的手法，替剝削者进行無耻的吹捧，而对阶级矛盾是尽量抹煞。

首先，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对長工的工資，进行了有意的夸大。我們的調查材料与李景汉的調查数字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定县三十年前長工每年工資情况調查

單位：元

	最高工資	最低工資
李景汉的“調查”数字	60	45
我們的調查数字	40	20
差 数	20	25

注：李景汉的資料見“概况調查”第645頁。

由上表可見，李景汉对長工工資作了不符合事实的夸大，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縮小剝削者对長工的剝削程度罢了。在工資問題上，李景汉还对剝削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奉承；他說：“主人与工人有糾紛必須停止工作时，如工人領去的工資，比他所作的日期应得的工資为多时，主人常不計較，如果工人工作日多，所領的工資少，主人按照日期計算，照数补发”。①（重点是我們加的——作者），看，李景汉把剝

剝削者打扮得多么忠厚、慷慨！但事实如何呢？东亭村張喜良（現是东亭村党支部書記）說：“我替地主刘志甫扛了二年多長活，第一年工錢就沒有算清，第二年我病了，他就把我辞了，二年共該补給我工錢二十八元，但刘志甫硬扣下不給，当时我爹还佃他的地种，又不敢和他翻臉”。东堤阳王計全說：“当时咱村是个穷村，很多人給西堤阳地主胡洛发扛長活，他家有人在外做官，誰也不敢惹他，一年使几个長工，当活干得差不多了，就挑个眼（借故）給开除了，什么也不給”。从这些情况来看，剝削者是像李景汉所写的那样給多了“常不計較”，給少了“照数补发”嗎？

在剝削者对長工的生活待遇問題上，李景汉却把面目猙獰的剝削者，描繪得那么善良可亲，李景汉写道：“主人多在院里或閑院給工人准备屋子……凡是月工、長工主人都供給被子”。“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每年中秋节，主人請工人坐上席，并亲手給工人斟酒，飯后主人送給每个工人大馒头40个，也有点心水果，用籃子携回家中，叫做送籃子。”^②

根据我們向一些扛了多年長活的老农調查，在定县一般情况，長工是住在主人家中，替他們做牛做馬。曾做过十五年長工的安春子（东堤阳人）說：“我給西堤阳地主胡大海扛了八年長活，就住在牲口棚（地主喂牲口的地方）里，白天干活，晚上睡覺的时候还得喂牲口，睡的是柴草，冬天常常冻得我睡不着觉，我們三个長工，种了七八十亩地，地里的活干不完，有时还得給他家打水，喂猪”。做了五年長工的王熙盛（元光村人）說：“中秋节当家的（地主）給我們斟酒？我們只求他不罵我們就好了，那时我們是伺候人的人，还敢讓人家来伺候”。这些揭露，不正从根子上有力地粉碎了李景汉的謊言嗎！

李景汉提到的一些东西，过去也曾有过，如送籃子（根据長工們反映是早先听說过），那是很早以前，地富为了讓長工拚着命給他干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647頁。

② 同上。

活，也为了緩和矛盾，而用小恩小惠来攏絡人心的一种手段。即使这样，他們对于給長工这些东西，也是十分心痛的，因而早就把这种“习惯”給取消了。而李景汉却把这种雇佣关系中非本質的、表象的，而且早已取消了的并不存在的東西，搬到他的“調查”中去，为剝削者塗脂抹粉。

对于短工，李景汉在叙述他們出卖劳力的情况时写道：“他們平时工作者少，往往在家無事，就到入市”^①去出卖劳力，我們不能不問問李景汉，难道劳动人民出卖劳力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們“工作少”“在家無事”閑得無聊才去替剝削者做牛做馬，去鍛煉一下自己的筋骨嗎？李景汉还說：“雇佣这种工人，是比較經濟的”，听，这是一种帶有多濃厚的血腥味的口吻啊！这种話出自李景汉之口，当然并不奇怪，因为他过去就是長期在帝国主义豢养下，喝劳动人民的血汗过来的。

至于剝削者对童工女工的剝削情况，連李景汉也不得不承認，童工和女工“平常的工作不在男工以下”，但对他們的工資及待遇問題，李景汉却只字不提，据我們了解，当时定县的地富們，是喜欢使用童工及女工的，因为对于他們來說，童工及女工的确是干活多，工資少。当时一般的女工工資，每年是14元左右，只等于男工最低工資的三分之二稍强，而童工每年最多不过是四、五元。不仅如此，女工和童工，特别是童工，还經常受到虐待，挨打受罵，这是常事，这些情况，李景汉却是避而不談。至于当时的“人身买卖”，地主对“丫头”“老媽子”的苛刻与虐待，李景汉就更是敢稍有涉及了。

从以上情况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三十年前定县的雇佣关系决不是二者“亲密無間”，“照顧体貼”，而是剝削者对被剝削者的殘酷剝削与虐待，因而二者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三)

最后来談高利貸。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下，农民除了受到地主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645頁。

階級的殘酷剝削外，還得要忍受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三十年前定縣的高利貸者是橫行一時的。高利貸者心地之陰險，手段之毒辣，是很多人過去所想像不到的。在這一方面，我們所了解的材料與李景漢的調查，也有着嚴重的分歧。

關於高利貸的剝削程度，據李景漢的調查，“當時借款利息，最高是每月每元三分，最低利息是一分五，普通是二分”。^①但根據我們的了解，當時定縣的高利貸的利息，按貸款時間，可分為長貸（即一月以上）利息及短貸利息兩種，長期貸款的利息，一般是三分，最高的有達到五分、八分、十分不等。高利貸者收取利息的手段，也是十分毒辣的，有所謂“上六利”、“上七利”：即假使向高利貸者借款一百元，立了一百元的契約，而債主交付給負債人的，只是六十元或七十元，換言之，先把一年的利息扣下，到負債人歸還時，還得歸還一百元。還有所謂“驢打滾”，即利息按月計算，一年之中，利滾利，滾來滾去，負債人就被滾得傾家蕩產了。

短貸的利息，剝削就更加嚴重了，結算的時間，有半月、十天、一集（五天）、三天不等。債主為了取得高利，不惜採用最卑劣的手段，借貸的名稱、花樣就甚為繁多，我們只列舉幾種，就可見其一斑。有所謂“集利十大加一”，即結算時間為一集，利率為10%，此外另加1%的手續費，所以每借一百元，一集（五天）以後，按期歸還，連本帶利，就是一百一十一元。還有所謂“猴躡利”，農民們叫做“三天一躡”，債主們叫做三天一小結，半月一大結。即借一百元，三天以後連本帶利就是一百零三元，再過三天利滾利就是一百零六元九角。這些舉不盡的事實，是完全被李景漢掩蓋起來了。

至於高利貸剝削的廣度，根據李景漢的調查：“據村人的估計，借貸家庭約占一切家庭數目的20%左右”^②。但根據我們這次調查，當時定縣貧苦農民為生活所迫，向債主借款者，人數甚多，僅元光一村

①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735頁。

② 同上。

負債戶數就占全村總戶數的60%以上。因負債而破產者則數不勝數，元光村在民國十七年（即1928年）僅因龐村地主劉洛海一戶高利貸的剝削，一年之中，農民的土地被其奪去者，就有三百餘畝。

貧苦的農民，為了繳納貨幣地租，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剝削，去向高利貸者借款。但借款對農民來說，也是十分困難的事，沒有田產的農民，高利貸者根本不借給錢。凡向債主借債者，都必須以紅契文書（即田產執照）為押，還得找保人，立借契，到期不能歸還者，田產即為地主所沒收。如果負債人負債過多，無力歸還時，債主則將其房屋、炊具、衣物等全部變賣或沒收，將他趕出家門，這就叫做掃地出門。元光村貧農吳立三，就因他還不起地主的債，被地主趕出家門，一家大小六口，全部凍死街頭。

這樣，土地愈來愈集中在那些貪婪無厭的地主手中，而貧困者更加貧困，這些現象為什麼李景漢竟充耳不聞呢？

值得提出的是，李景漢在敘述債主與負債人的關係時，他極力地給剝削者插花戴朵，而卻昧着良心往被剝削者臉上抹黑。李景漢說：“債主對於負債人到期不能償還時，其態度頗為和平，因為債主是本地殷實的農人，商人或錢局”^①而債務糾紛的責任，他卻全部推在負債人的身上。他寫道：“因討債而成訟者亦有之，多由於負債人產業不多……遂不讓前債主知道，又將該不動產轉押給其他債主，至債主討債時，雙方均要沒收，於是訟事糾紛即起”^②。

从上邊揭露材料看，依靠吸人血汗發財致富的剝削者，李景漢把他吹捧成“殷實的農人”，而對飽受壓榨的被剝削者，李景漢卻誹謗他們是無理的、欺詐的、偷偷摸摸的。在李景漢看來，得利的是貧民，吃虧的是債主。李景漢在為誰喊冤，難道還不清楚嗎？

從定縣三十年前農村的情況看，剝削者占有大量生產資料，並以此來作為壓迫人民的工具，他們挖空心思，想盡辦法來從勞動人民的身上榨取血汗，來供他們吃喝玩樂；而農民卻過着剝肌見髓的牛馬不

①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736頁。

② 同上書，第736—737頁。

如的生活，許多农民無法生存下去，悬樑自杀者有之，冻斃街头者有之。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調查”对这一点，却避而不談，反之却对剝削者歌功頌德，大唱其贊美詩，对当时的階級矛盾，是尽量加以掩盖，其目的不过是想維護封建地主买办階級的統治罢了！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农村中的階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李景汉虽然煞費苦心地花了四年的時間来編纂了这一本臭名昭彰的“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企圖以此来麻痹人們思想，調和階級矛盾，粉飾太平，但这只是枉費心机，而他的反动面目，在以上的揭露中，却是暴露無遺了。

第四部分 关于农民生活狀況問題

李景汉作为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买办階級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民生活狀況这个富有階級色彩的社会現象上，当然也是不甘寂寞的。还在三十年前，他就在这个問題上，作了不少調查，放过無數厥詞。为了戳穿李景汉的鬼把戏，我們在調查翟城、高头、牛村、元光、东亭和东堤阳諸村三十年前的土地占有、階級关系等問題的同时，对农民生活狀況問題，也作了詳細的了解。其結果，又一次証明了李景汉的发家資本“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一書中有关农民生活狀況的描述，只不过是一大堆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为統治階級服务的東西而已。

在农民生活狀況这个問題上，李景汉一方面千方百計地“調查”和“搜集”数字和資料，并用以証明：在官僚买办地主階級統治之下，“大多数的农民，都能过着飽粗食、暖粗衣的生活”^①。各类农民的收入，無有多寡之分，这仅是由于各家人口悬殊所引起的假象，不論貧富，在生活水平上都沒有什麼差別，李景汉就这样用农民能过小康生活的虛假現象，把农民貧困化的真象掩盖起来。另一方面，他又作賊心虛，察覺到他的这种作法，并不能完全欺騙农民，为了同無产階級夺取农民群众，他又口头上假惺惺地叫喊：“农民生活极其低陋”，“視飽食暖衣为福境”^②，所以就必須通过他們的“生計教育”来“改善农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259頁。

② 同上。

村的生活境遇”。

李景汉就是在这种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下，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搬出了他对农民生活状况的全部看法。

李景汉在罗列了一大堆有关“定县翟城村34户农家”一九二八年的“调查统计”资料以后，他断然地写道：“34家主要之收入当然是农场的盈余，在记帐之一周年內共計6,740.49元，平均每家198.25元。最少之农场盈余为66元，最多之盈余为325元，大多数家庭之农场盈余在200元左右。次要之收入为各种副业之收入及人口中从事经商或教育者之收入款，34家共計1,052.15元，平均每家30.95元。34家中有此項收入者計24家，最多之一家收入达150元，普通多半不满50元，50—100元者有3家，超过百元者有4家。34家再次之收入为卖出牲畜及其副产物，共計996.71元，平均每家29.32元。有此項收入者共27家，每家皆有卖猪进款，大多数的家庭有卖鸡蛋进款，9家有卖木料进款，3家卖驴，一家卖马。34家中有出租一部分自己田地者，共收租金139.44元，平均每家合4.11元。有田租收入者計8家，最少者收入3.5元，最多者收入50元”^①。

与此同时，李景汉并声言：“此34家大致可代表农民过日子的情形”^②。根据李景汉的定县“可以相当的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况”^③的逻辑，此34户的收入水平即全国农家收入的“缩影”了。

为了弄清问题，我们可以用李景汉的材料来算一笔帐，34户农家的平均收入：

农场盈余	198.25元
各种副业收入	30.95元
出卖牲畜及副产品收入	29.32元
地租收入	4.11元
合 計	262.63元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1页。

②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47页。

③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第3页。

这里还没有加进李景汉的所谓“假定房租收入”18.53元，如合并计算，每户农家的平均收入将达281.14元之多。总收入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由于币制的变迁已经难给人们一个完整的概念。为此我们用不变价格将281.14元折算一下，用实物形态来表示。据了解在1928年时定县主粮——谷子为每斗售价0.72元，这样我们即可折为谷子7,027.2斤。这就是李景汉向我们揭示的典型农家的收入概况。

大家知道总收入与生活水平是互相制约的，每户7,000多斤余粮，不仅意味着农民能够“饱粗食，暖粗衣”，而且意味着农民的生活过得相当富裕了。这一点李景汉也看到了，而且也意识到他的这些“调查”材料，是经不起一驳的。所以他又来一个策略上的退步，他说：“大约34家的平均生活程度尚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并且在记帐的周年內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較的过太平日子”^①。

为了揭穿李景汉关于农民生活的这些谬论，我们必须弄清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农家才能过“饱粗食，暖粗衣”的生活，第二，李景汉所指的“大多数”其数字界限究竟如何！

根据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介绍的材料，饱粗食，暖粗衣的农家生活费用的开支情况，我们列表如下并表明计算方法：

（从衣食住几个方面来研究。根据李景汉的调查，按六口之家计算。表见下页。）

若按当时土地的产量计算，定县当时一般较好的土地，每亩为250斤左右，所以4,236斤需用地16.9亩。应该指出，4,236斤这个数字中，还有许多农民的支出项目未包括在内：

以上为维持“饱粗食，暖粗衣”的农家所必须耕种的田亩数。

但除生活支出外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还必须要有生产支出，如种子、肥料（根据老乡的反映，在定县为了维持地力每亩要施豆子18—22斤，当时豆子亩产为150斤），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页。

項 目	生活費支出		計 算 方 法
	金 額	折谷數 (斤)	
1. 糧食		3,389	按照一般農戶計算需用，薯干487.5斤，小米1,725斤（折谷子2,474.2斤）雜糧427.5斤*。 男人衣服8元，女人衣服7元，小孩衣服4元，被褥折舊2.6元，共計21.6元。 住房3間，每間50元，共150元，按使用50年計，每年折舊為2.1元，還不包括日常維修在內。 根據“定縣牛村的平民教育”一書地丁稅507.48元，地方用款1,259.75元，按牛村208戶平均每戶8.5元。
2. 衣着	21.6元	540	
3. 居住	2.1元	65	
4. 賦稅	8.5元	201.6	
共 計		4,236	

* 參閱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260頁。

1. 16.9畝土地需用細肥18斤×16.9畝=304.2斤
種細肥需要地畝為 $304.2/150=2.02$ 畝
2. 1928年左右該地每畝需要種子 18.42斤（折合谷子）
16.9畝則需種子 $18.42 \times 16.9=307.6$ 斤
生產這類種子需用地 1.23畝

由以上計算我們即可得出：

1928年左右定縣的六口之家，要維持簡單再生產和過“飽粗食，暖粗衣”的日子，沒有二十畝以上的土地是不行的。（16.9畝+2.02畝+1.23畝=20.15畝）這也是從李景漢的調查中所必須得出的結論。

值得指出的是，根據我們的調查，當時定縣純自耕農的比重異常輕微，大多數農戶都要租地種，而地租又非常高。看來，一般農戶要過這飽粗食，暖粗衣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

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一下，在定縣當時情況下，占有二十畝以上耕地的農戶究竟有多少？這裡舉出一個我們在定縣翟城村（這是李景漢調查的重點，他的34戶典型農家的所在地）的土地占有情況來說明（見下頁表）：

由下頁表可知，占有二十畝以下耕地的農戶，占全部農戶的71%。這樣，“大多數農家都能過飽粗食，暖粗衣”的花言巧語，在我們的考證之下，就變成大多數的農民皆不能過飽粗食，暖粗衣的結論了。

1928年前后定县翟城村土地占有情况

土地占有量	户数	占总户数的%
1. 無地者	20	5.41
2. 1 亩—10 亩	135	37.3
3. 10 亩—20 亩	105	28.62
		71.06
4. 20 亩—30 亩	42	11.42
5. 30 亩—40 亩	23	6.21
6. 40 亩—50 亩	12	3.22
7. 50 亩—70 亩	7	1.82
8. 70 亩—100亩	16	4.30
9. 100 亩以上	8	2.20
合 計	366	100

馬列主义一直教导我們，在階級社会中，一切社会現象無不被打上階級的烙印。在三大敌人層層压榨之下，定县的农民能过“太平日子”嗎？大量的事实与数字証明，李景汉捏造的謊言是站不住脚的。在我們这次調查中，农民們告訴我們不少悲慘的往事，和生活經歷中的血淚史，这些材料都是对那些自認為是善于了解“民間真情”的李景汉之流的人物的最强劲的控訴。

李景汉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仅用夸大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手法来粉飾剝削，是不能完全矇蔽人的。因此他又挖空心思別出心裁地搞了一套所謂“貧富之家生活皆無显著差異”的謬論。

李景汉在叙述了翟城村34戶农家的平均支出情况之后，他写道：“上表是將34家总起来看，不論貧富或家庭大小的差別”^①說这是“十分不够的”，还有必要对收入不同的农家在生活程度上的差別进行一番分析。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統計計算以后得出結論：“收入多的家庭人口亦多；也可以說，人口多的家庭收入也随之增多，二者互为因果；这是家庭收入虽多而未必生活程度亦較好的一个主要原因”^②，“家庭的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305頁。

②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305頁。

程度降低的趨勢。換言之，家庭人口增多，非為家庭之福，實為家庭之累。”^①

由此看來，李景漢認為無論收入多少之家，生活程度皆相差無幾，即或收入有懸殊之別，也僅為人口多寡不同這種原因所造成的假象。

事實如何呢？我們只要指出下列一點，即可揭示出李景漢的這一“發現”的荒謬性，就連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破刀爛斧，也不能挽救這位“調查專家”的命運。

誰也知道，在勞動生產率既定的條件下，創造價值的多少，是與參加生產活動的人數成正比的。對於作為生產單位的家庭來說；其收入的多少和人口（這裡首先是指勞動力）的多寡有直接的依存關係。不過，這一結論只能適用於沒有剝削階級存在的社會里，和經濟條件相等的同一階級的內部。至於階級社會中，人口與收入的大小，早已脫離了關係，收入多人口少，或相反收入少人口多，卻是普遍的大量存在的現象。在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之中，收入的大小是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為轉移的。為了徹底揭穿李景漢的騙局，我們在翟城選擇了能代表農村各階級的典型戶，對他們在1928年的收支狀況和生活水平進行了調查。

被調查者的家庭情況如下：

姓 名	成 份	家 庭 人 口			自有土地畝數	出租土地畝數*
		男	女	合 計		
米 迪 剛	地 主	10	7	17	800	-550
米 洛 邈	地 主	7	12	19	140	
米 洛 哲	富 農	5	7	12	130	-20
呂 洛 炳	富 農	4	5	9	83.5	
仝 洛 華	中 農	6	12	18	30	+20
秦 洛 聚	中 農	4	5	9		+19
張 洛 峯	貧 農	2	3	5	2	+2
杜 洛 西	貧 農	4	4	8	6	+13

* 這裡不包括地富在外村的土地。

翟城各典型戶1928年全年收支情况：

單位：元

姓 名	成 份	全 年 收 入	全年生活費支出
米 迪 剛	地 主	2,500.00	
米 洛 邈	地 主	1,848.90	602.80
米 洛 哲	富 农	812.34	395.94
呂 洛 炳	富 农	675.00	568.00
全 洛 华	中 农	736.49	477.20
秦 洛 聚	中 农	477.24	250.36
張 洛 峯	貧 农	73.60	73.30
杜 洛 西	貧 农	112.25	93.25

注：我們所計算的收入是不完全收入，對於地富有些貨幣收入還未包括在內。如米迪剛當時在綏遠還有地、面粉廠及一些銀行字號中的投資，我們實在無法調查清楚。

按人平均的收支情况：

姓 名	成 份	按人口平均的收入	為最低收入戶的百分比	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費支出	為最低生活費支出戶的百分比
米 迪 剛	地主	117.06	1,156.1%		
米 洛 邈	地主	97.31	765.01%	31.7	273.27
米 洛 哲	富农	67.69	532.15%	32.9	283.62
呂 洛 炳	富农	75.00	589.62%	63.3	545.69
全 洛 华	中农	40.91	315.95%	26.2	225.86
秦 洛 聚	中农	53.02	416.82%	27.8	239.65
張 洛 峯	貧农	12.72	100 %	14.6	125.86
杜 洛 西	貧农	14.03	110.29%	11.6	100.

注：地富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是偏低的。但這種大為偏低的數字，也影響不了我們的結論。

從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口多少與收入之間沒有什麼必然聯

①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309頁。

系，收入高低不同的人家，按人口平均的收支也没有什么逐渐等同起来的趋势发生。而给人的印象是适得其反。

首先，我们从收入上来看，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富农，拥有大量的收入，即或按人口平均计算收入量，每人亦在70元以上，甚至高达147元以上。与此相反，广大的贫雇农，他们的收入却是微乎其微的，按人口平均仅有13元左右，折谷子只340斤，这里还得包括着生产费用与地租、赋税等的支出在内。中农的收入虽比贫农较高，但与地富比较也相差甚远。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不同阶级在生活费用支出方面，贫农按人口计算的每年支出费用仅13元左右，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中农的生活费用，也只达到平均每人26元。而地富，按人平均最少的也是30几元，甚至有高达60几元的，等于贫农的五倍以上。从上表我们也可以看到各阶层在收入递增的幅度大于在支出上递增的幅度。这也是符合规律的，因为地富们每年都要将一部分剥削收入转变为土地，或商业资本。再者，人在吃穿上的支出毕竟是有限的，这便是按阶级计算收入递增幅度高于支出递增幅度的原因。

这样看来，李景汉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调查，以及李景汉从“民间”调查得来的资料，究竟有多大价值，不就很清楚了吗！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同一地方，对同一年代的事物进行调查，而李景汉的“调查”材料与我们的调查材料，为什么出入这么大呢？

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很早就揭露过，罗列一些表面现象，片面地描述事实，然后从中任意地引出他们主观所要想得到的结论，这是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学者调查的手法。李景汉之从整理材料中得出了“无论贫富之家，生活程度皆相差无几”的谬论，原来就是这样一套鬼把戏。

为了彻底揭穿李景汉的这一套鬼把戏，我还举出几个他整理有关翟城34户农家生活费用调查资料时在方法上施用骗人伎俩的具体例子。

首先，为了制造农民生活水平较高的谬论，和掩盖不同阶级在收

支上的悬殊，李景汉应用了“按耕种地亩大小”和“收入水平高低”的分组法，结果得出了“大多数农家都能过着饱粗食，暖粗衣”以及“不论贫富之家生活皆无大差异”的结论。用这种方法来统计，则一组之中可以包括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地富，也可以包括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的贫雇农，这便是李景汉调查资料与我们严重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李景汉也玩弄了“虚构平均数”的把戏。大家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之类的概念。而李景汉偏偏要盗用这种概念，这样的平均数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样的农民生活状况，到底能代表那类农民的生活状况呢？将食不果腹的贫雇农说成是有地租收入的殷实富户，这不荒唐得可笑吗？这样作的本身，正好揭露了李景汉掩盖阶级矛盾的嘴脸。

最后，根据主观结论的需要来选择材料，这是李景汉和我们在调查材料上分歧的又一原因。

我们调查是按经济特征与不同阶级来抽样的。这样可以看出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在收支上和经营状况上的特点和差异。与此相反，李景汉却是按其结论的需要来选择农户的。据我们这次了解，当时有许多农家都被作为生活费用调查的对象，平教会调查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堆集满架，而李景汉为什么只公布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呢？显然，他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的。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它们并不符合李景汉的需要。

由此可见，李景汉有关农民生活费的“调查”，仅是一大堆谎言，和几张狗皮膏药而已。

综上所述，在一切有关农民生活问题上，李景汉和我们之间，不论在观点、立场、和方法上都是针锋相对的。譬如，我们在调查以后说：“半年糠菜半年粮是旧社会农民生活的写照”，而李景汉却说：“大多数的农民都能过着饱粗食，暖粗衣的日子”；我们调查之后说：“旧中国农村两极分化的现象甚为严重”，而李景汉说：“贫富之间生活无多大差别”。那李景汉的目的何在呢？我们通过这次调查把这个问题弄

得更明确了。

首先，在关于农民生活状况上，他以調查为幌子，散布了一堆农民生活优裕，貧富無差别的謊言以后，企圖由此引伸出用不着什么階級斗争的結論，从而在农民生活問題上来否定馬列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学說。

其次，在农民生活貧困的原因上，他搬出了反动透頂的馬尔薩斯人口論的主張，說什么农民貧困是由于“人口过剩”的必然結果。并想由此証明改善农民生活，并不需要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首先应节制生育，借此来巩固剝削階級的統治。

最后，在提高农民生活的途徑上，他又裝出一副伪善者的面孔，說了一句“农民生活低陋”的漂亮話，企圖借此攏絡人心，来为推銷他的“生計教育”和其他反动的改良主义政綱寻找市場。

这便是这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李景汉在农民生活問題上大放厥詞的真正目的。

第五部分 关于賦稅和县財政問題

在階級社会中，国家財政是統治階級用以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額外剝削的工具，它反映着集中为国家形式的整个剝削階級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剝削关系。因而在全部社会現象中，国家財政乃是階級性最为明显的一个經濟范疇。

国家財政的階級性，不仅鮮明地反映在財政資金的使用方向及其社会效果上，而且也鮮明地反映在財政資金的来源及其征集的方式上。

历来，統治階級都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財政負擔加諸于被統治階級身上，并通过財政資金的征集来影响各階級的經濟力量，以便达到巩固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础的目的。当然，在旧中国，作为統治階級的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买办階級也不会例外。正因为如此，李景汉作为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买办階級的忠实代言人，在集中主要力量从土地占有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貸关系以

及农民生活状况等方面，千方百计地掩盖我国农村中尖锐的阶级矛盾来为其主子作辩护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国家财政这一个重要的环节。

在财政方面，想要以歌功颂德的方式公开来为统治阶级作辩护，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众所周知，继北洋军阀的统治以后，代之而起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军阀统治。这个法西斯王朝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为了镇压进步民主力量，为了壮大官僚买办资本的经济实力，对人民横征暴敛，诛求无已，较历代封建王朝以及北洋军阀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财政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早已昭然若揭。因而在财政方面来为统治阶级做文章，就不能不煞费心机和巧施伎俩。

在这里，李景汉首先装出一副为人民请命的伪善者的态度，不关痛痒地批判了一下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以表白其立场之公正。继之就以法令条例的烦琐叙述和数字表格的重叠堆砌填满了整个篇幅。在布下了上述层层烟幕以后，则一反其在序言中许下的“不作任何评论和结论”的诺言，在字里行间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大量兜售其反动的货色。

我们知道，赋税课征的规模、税收负担在各阶级间的分配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乃是国家财政制度中最根本性的问题。看来，李景汉还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他的全部文章也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来撒谎、放毒以欺骗人民和谄媚于其主子的。现在我们就以这三个问题为纲，对李景汉的调查加以剖析。

一、

赋税课征的规模是人民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历来的统治阶级，也都以轻徭薄赋的谎言来骗取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他们在赋税课征规模这个问题上，不是秘而不宣，就是伪造数字。而李景汉也首先是在这个问题上来为其主子作文章的。正如他在赋税一章开头所说的：“本章范围，是属定县部分的赋税，主要目的是要想知道人民每年的

担負多少”，^①但是，李景汉用了一百几十頁的篇幅反复推敲和計算所得出的結果是什么呢？請看下表：^②

定县三年負擔的国、省稅及县地方捐

1927年征收数	1928年征收数	1929年征收数	平均每年征收数
653,115,662元	519,149,863元	493,623,559元	555,296,362元

这就是說，定县每年的賦稅征收总額为555,296,362元，“按当时定县人口約40万計，平均每人每年約負擔1.38元”。^③又根据李景汉关于34戶普通农家生活費用的典型調查，平均每戶全年总收入为281.14元，平均每戶人口以6人計，則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为47元^④。如此計算，平均每人每年的負擔額在其收入額中所占的比重为3%。

上述数字如果确实，且說接近于真实吧，那么三十年前的中国人民就誠屬幸哉了。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般資产階級国家的稅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使是和平时期也要达到巨大的数額。根据苏联科学院經濟研究所的統計資料：1937/38年度中，美国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課征的稅收約占其当年国民收入的20.3%，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征收的稅收也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4.2%。^⑤

誠然，三十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經濟极端落后的国家，人民的負擔能力是远不能和資本主义国家相較量的。但是負擔率竟相差如此悬殊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况且在30年代的旧中国，新旧軍閥連年混战，軍費开支浩大，而反动政府不顧人民死活，采取杀鷄取卵的稅收政策又稱著于世，人民的稅收負擔率何能低至如此限度？不信，我們再来算一笔帳。如李景汉所說的“定县是中国一千九百余县中的一个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況調查”，第447頁。

② 同上書，第574頁。

③ 同上書，第575頁。

④ 同上書，第302頁。

⑤ 苏联科学院經濟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統計資料彙編”。

县,人口約40万众,約等于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县內的农民生活、乡村組織、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的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①因而我們可以把定县人民每年的平均負担額作为全国人民每年的平均負担額。按当时中国人口約4亿計,那么国民党反动政府每年的全部賦稅收入仅有444,000,000元。而根据我們粗略的統計: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岁入,仅关、鹽、統三項間接稅每年入庫就經常在8亿銀元以上。^②一句話說穿,李景汉所統計的定县人民每年稅收負担总額是一个騙人的数字。

在这里,李景汉所引用的数字,几乎是全部取自官方档案材料。这些材料的虛假性已不待言。而且有很多材料,如临时攤派,各級官吏的貪污中飽,包稅商人的敲榨勒索等等則根本無案可查,而这些給人民造成的負担要远远超过实际入庫的賦稅收入。据估計,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稅收大体是:三成归國庫,三成被貪污中飽,四成为漏稅。^③其中漏稅部分悉数进入与貪官污吏相勾結的商人的私囊,而人民的稅收負担并未因此而有絲毫減輕。因而,仅根据官方档案材料来分析和研究人民的真实負担情况,实不啻于自欺欺人。

然而,即使根据官方档案材料来推算,上述稅收負担总額也是被大大縮小了。在这里李景汉玩弄了隱匿、偷漏等卑鄙手法。

根据李景汉的調查,1927—1929年間定县采取包稅方式征收的稅捐計有:烟酒牌照稅,牙稅及附捐、屠宰稅及附捐、花生木植捐、牲畜花稅捐等六項。这六項稅捐的收入額,李景汉是按照包征数計算的。

所謂包稅的征收方式,系稅务机关以某种稅捐招商包征。首先通过承包商投标的方式确定稅捐的包征額,然后由包稅商人直接向納稅人征稅。这种包稅制是一种极端落后的原始征收方式。包稅人取得征稅权后就可以向納稅人任意敲榨勒索,为所欲为。其所征稅款要远远超过包征数,給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担。而包稅人的敲榨勒索行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況調查”,序言第3頁。

② 1950年3月22日“人民日报”社論:“稅收在我們国家工作中的作用”。

③ 同上。

为，实际上又是被法律所承認的。因为包稅本来就是官商双方的一笔买卖交易，包稅商在經營这一笔交易时，要墊支一部分稅款，开銷征收費用，在特殊情况下还要承担賠稅的風險等等。商人不牟利，于此又何所求？

我們这一次在定县調查，根据翟城、元光、东亭等村鎮农民的反映，“当时定县有一套龐大的包征組織，按县→区→村、鎮→集市的次序逐級向下发包。县有总包稅人，区、村、鎮、集市則有分包人。这些大大小小的包稅商人層層向下搜刮，而这一切的重担最終都压在农民身上，甚至农民在集市中站一下，卖一把扫帚就得納稅”。这些三十年前的往事，今天农民談起来仍是記憶犹新，而自詡为“民間疾苦調查人”的李景汉，当时身历其境，在調查报告中竟只字未提，其居心何在就不言而喻了。

根据以上分析，从研究人民負擔的角度出发，計算以包稅方式征收的各稅，就不能仅以包征数为依据，而必須估計到包稅人的加征幅度这一个重要因素。固然，精确地計算包征各稅的实际征收数是有困难的。但是根据已有的材料推算出一个最低的实际征收数，却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包稅条例，在一般情况下，包稅人至少要向稅务机关預繳包征全数的五成，按上述各种包征稅捐總額124,197元計算，包稅人每年就要預繳62,050元（为便于計算去掉了尾数）。对于包稅人來說，这是一笔墊支資本。包稅人必須由此取得最低的資本利息收入。按当时定县一般高利貸利息为大三分計（參閱本文关于階級关系部分），包稅人全年取得的資本利息收入就为22,337元。此外包稅人还要支付征收費用，如雇用征稅人員，印制稅票、帳冊等等。征收費用若按征收額的5%計算（这是当时地方机关征收國稅提取征收費用的最低比例），^①全年的征收費用就为7,077元（〔包征数124,197元 + 資本利息22,337元〕×5%）。資本利息和征收費用兩項合計为29,414元，与包征数合并計算則为153,611元。如上所述这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509頁。

还只是最低的推算数。即使以这个最低的推算数为根据，李景汉在这項人民負担上也至少为其主子打了几近1/4的埋伏。

此外，在其它稅捐項目上，李景汉也玩弄同样手法以隱匿人民的真实負担情况。如田賦附加各捐，根据李景汉的調查，1927—1929年間每亩田賦正稅为0.183609元，附征各捐为0.057384元^①，附加額仅及正稅的1/3。而我們这一次在定县調查，根据农民的反映：当时田賦正稅数目并不算多，但是附加捐項目如修繕、公安局、保安团队、警校等等举不胜举，其附加額合計起来要超过了正稅的七、八倍。当时农民很怕附加捐，听到要征附加捐，就会說，“今年又吃不上了”。附加稅捐加諸于人民身上的負担，其沉重于茲可見，而李景汉却把它描写得輕若毫厘。这些細帳就不一笔一笔去計算了。

李景汉在計算人民的稅收負担上，不仅采取分散隱匿的方式来縮小实际征收数字，而且还明目張胆地偷漏整項的賦稅收入。以掩盖人民的真实負担情况。

如所周知，从北洋軍閥政府到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对中国人民进行殘酷的財政掠夺，施尽了一切卑鄙的伎倆。他們除去巧立各种各样的附加稅捐名目以外，还采取了所謂“預征”的方式。根据薛暮桥在“中国农村經濟常識”一書中的統計：中国預征田賦的地方有十几省之多，四川有許多县份已預征到民国四五十年，更有預征到六七十年，甚至八十年的。^②

我們这一次在定县調查，根据农民的反映：在1929年定县田賦已預征到1936年，即預征了八年。預征虽系預借性質，但由于逐年遞次預征，实無異于原稅加倍征收或开征新稅。同时，由于預征数不仅包括正稅而且还包括附加稅捐，因而預征加諸于农民身上的負担尤甚于附加。而此事在調查报告中亦只字未提。当时李景汉也身历其境，对于农民身受这样橫征暴斂的痛苦，为什么竟充耳不聞，抑或聞而未录？根据李景汉的統計：1927—1929年定县平均每年田賦正附稅捐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況調查”，第495頁第195表。

② 薛暮桥：“中国农村經濟常識”，第96頁。

總額為133,105元(去掉尾數)①。若按逐年遞次預征一年的田賦計算(實際上是不止預征一次的),那麼李景漢就在農民的田賦負擔上為其主子打了一半的埋伏。

除此以外,被李景漢整項偷漏的稅收負擔還有關稅。我們知道,關、鹽、統是戰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三筆大收入,每年在其歲入總額中所占的比重達70%以上,有時竟高達90%以上。而這三種稅收均屬間接稅性質,由全國消費者負擔。定縣人民當不能例外。在統計定縣人民的賦稅負擔時,若明目張膽地漏掉這一項收入,那就未免太露骨了。因而李景漢在這裡不得不作了一下交待,說“國稅中因有關稅數項數目未得,未有算入,故實際國稅的負擔當不止此數”②。然而這項負擔數目果真不得嗎?李景漢在統計統稅收入時,估計北路(天津、保定來的)貨物的統稅每年為1萬元。根據當年定縣的貨物運銷規律,南路(從漢口、石家莊來的)貨物大多是土貨,而北路貨物(從天津、保定來的)則大多是洋貨。在這裡完全可以根據北路貨物的運銷量來估計定縣人民負擔的關稅。我們若以與北路貨物的統稅相等計算,定縣人民每年負擔的關稅至少也在萬元以上。這裡又是一筆埋伏。

以上只是舉其舉舉大者,至於零星隱匿和偷漏的稅收負擔就更不計其數了。

現在我們來總計一下,就以上列舉的負擔項目,李景漢為其主子究竟打了多少埋伏。請看下表:

項 目	金 額
1.包征各稅(烟酒牌照稅、牙稅牙捐、屠宰稅及附捐、花生木植捐、牲畜花稅捐)	29,414元
2.田賦預征	133,105元
3.關 稅	10,000元
總 計	172,519元

①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580頁第239表。

② 同上書,第575頁。

埋伏数字在其統計的稅收負擔總額 555,296 元中所占的比重几近 1/3。

若將上述埋伏数字入帳，那么定县人民每年的稅收負擔，總額就不是 555.296 元，而是 727,815 元。而每人平均負擔數則由 1.3 元增至 1.8 元。当然这个数字还远不能反映出当年定县人民的真实負擔情况，因为，如上所述，这只是根据已有的材料，举其犖犖大者推算和估計出来的最低負擔額，还有更多的負擔是無案可查的。好在我們在这里的任务，并不是全面而系統地研究三十年前定县人民的稅收負擔，而是通过以上几个片断的分析来揭穿李景汉的虛伪面目。

二、

李景汉在稅收負擔總額方面为其主子打下了埋伏以后，就轉而在稅負在各階級間的分配这个問題上来为其主子做文章了。

我們知道，在階級社会中，国家向誰征稅，稅收負擔主要落在那一个階級身上，乃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問題。因为它明显地反映着社会階級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本質。所以李景汉作为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买办階級的代言人，就必然在这个問題上为其主子傾注全力，乃至奋不顧身。

如所周知，一切資產階級学派都是絕口不談階級的。当然李景汉也不会例外。在这里他沒有、也不敢公开提出稅負在各階級間的分配这个問題来。在这个問題上，他的文章是巧妙地從賦稅的分类开始的。

李景汉在“賦稅”一章的开头，就把定县負擔的全部稅捐划分为直接稅、間接稅和行为稅三大类。^① 其中行为稅有無單列一类的必要，这是一个理論上的問題，而且这一部分稅收在稅收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对于这个問題的研究無关宏旨，因而我們暫且不去探討它。在这里，問題的关键在于那些捐稅屬於直接稅，那些捐稅屬於間接稅。因为这个問題关系到直接稅和間接稅在全部稅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 449 頁。

根据賦稅一般原理，直接稅是以財產和收入為課稅根據、并直接向納稅人征收的；而間接稅則以商品流轉為課稅根據，稅款包括在商品價格中，通過商品交易完全轉嫁給消費者負擔。在剝削階級國家中，這兩種稅就其本質而言本無區別。不過就課征方式和稅款來源而論，兩者是不同的。間接稅是絕對轉嫁的，稅款由廣大消費者負擔；而直接稅則是根據財產或收入來課征的，因而其稅款的轉嫁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兩者相較，顯然直接稅要比間接稅合理一些。因而直接稅和間接稅在全部稅收中所占的比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國家的稅收政策。

李景漢在賦稅分類中，竟把本來屬於間接稅性質的烟酒牌照稅和牙稅牙捐這兩項重要的稅收劃歸直接稅類。根據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稅收條例，烟酒牌照稅，由烟酒商按其營業規模（商品流轉額）繳納；牙稅牙捐，則由集市交易的買賣雙方按交易額（亦即商品流轉額）繳納。烟酒商和集市交易的賣方，在納稅以後，可以把稅款加在價格中轉嫁出去。固然，牙稅中有一部分是規定由買方直接繳納的。但是，就買方在交易中所支付的價款總額來看，這部分稅款還是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由此看來，顯然烟酒牌照稅和牙稅牙捐是屬於間接稅性質。

李景漢所以把這兩項稅收劃入直接稅類，並不是由於理論上的無知，而是玩弄偷天換日的手法，在這裡留下一個伏筆，以便在分析賦稅收入構成的時候來為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稅收政策塗脂抹粉。

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一下李景漢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稅收構成的分析。請看下表①：

定縣自1927—1929年三年中平均每年担負之直接、
間接及行為三稅之比較

直接稅	間接稅	行為稅	合計
53.4%	40.7%	5.8%	100%

① 同上書，第579頁第238表。

其中直接稅的比重占首位，較間接稅的比重多12.7%。這樣看來，好像國民黨反動政府在執行着合理負擔政策，其稅收制度是沿着以直接稅为主体的道路，朝着日益合理的方向而向前發展的。這豈不是極大的德政！

然而，若我們讓烟酒牌照稅和牙稅牙捐歸隊，按其固有的特征列入間接稅類，那麼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重就會發生如下變化：①

直接稅	44.7%
間接稅	49.5%
行為稅	5.8%

在這裡，占首要地位的，就不是直接稅而是間接稅了。如就全國而言，如前所述，僅關、鹽、統三項間接稅在國民黨反動政府全部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則達到70%以上。這就是說，戰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稅收政策，其鋒芒主要是通過間接稅而指向廣大勞動群眾的。這一點早已昭然若揭。而李景漢卻還在這裡枉費心機、弄虛作假，對其主子雖可謂忠心耿耿，但其撒謊之拙笨卻猶如“此地無銀三百兩”。

李景漢在玩盡了上述一切卑鄙手法以後，有點得意忘形，忘記了“民間疾苦調查人”的身份，忘記了“不作任何評論和結論”的諾言，竟然公開大放厥詞，作出了反動透頂和荒謬絕倫的結論。

請看李景漢的結論：“直接稅太偏重地主的賦課，而忽略房主與資本家的征收，這是我們中國稅制一大缺點”。②說他這裡提倡合理負擔政策，讓資本家和房主也分担一部分地主的稅負，那是假的；若說他在向反動當局獻計，再加強對原來已被租稅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搜刮，以減輕原來已微乎其微的地主階級的稅負，却是真的。請看李景漢的另一條結論：“民十六至十八年三年平均每年所征的臨時稅捐 117,482.971元中，直接稅就有

①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581頁第240表。

② 同上書，第577頁。

115,219.404元,占了十分之九有多,此数几乎全由地主征来”。^① 又根据李景汉的统计,这“十分之九有多”的直接税,绝大部分为田赋附征特捐和村捐^②。而田赋附征特捐又系就田赋正税附加征收,其征收额随田赋正税的征收额为转移。^③这样看来,田赋正税及附加捐税和村捐等一切农村直接税,也同样是“几乎全由地主征来了”。

质言之,旧中国的税收制度以直接税为主体,而直接税的负担又几乎全部落在地主阶级身上,这就是李景汉在税负在各阶级间的分配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全部结论。

这个结论的前一部分,前面已经批判过了,不再赘述。这里,我们仅就直接税究竟主要由那一个阶级负担这个问题来探讨一下。旧中国的直接税,主要是田赋,因而直接税的负担问题,实际上就是田赋的负担问题。那么,田赋果如李景汉所说的那样,“几乎全由地主征来”吗?

我们知道,旧中国的田赋,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财产税,系由土地所有者按其所有田亩多少来缴纳。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田赋的最终来源,而仅就其这一特征来考察,能说田赋“几乎全由地主征来”吗?

如果说田赋几乎全部由地主征来,就不管说,农村的土地几乎全部为地主阶级占有。我们这一次在定县翟城等六个村调查了三十年前的土地占有情况,虽然看出了当年土地占有日益集中的趋势,但是还没有发现一个村,其土地集中已达到几乎全部由地主阶级占有的程度。李景汉生平绝口不谈阶级,而在这里破例谈了一下,但是,谈的确实冤枉过正了!说田赋“几乎全由地主征来”,岂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撒谎吗?

我们再从旧中国的田赋征收制度方面来考察一下田赋的负担问题。根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田赋征收条例,田赋没有起征点的规定,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578页。

② 同上书，第579页第237表。

③ 参阅上书，第494页。

稅率採取比例制。這就是說，只要有土地，不論其多少，那怕只有半畝地，就要繳納田賦。這樣，占農村人口絕大多數的中農和貧農也就成為田賦的主要納稅人了。從本文前几部分中我們已經看到，三十年前定縣農民在地租、高利貸、商業資本等重重盤剝下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那幅悲慘的生活圖畫。雖然如此，最終他們也逃不脫田賦這一額外剝削的索套。

尤有甚者，由於田賦稅率採取比例制，就是說不論田畝多少，每畝產量大小，自耕或是出租，都按同一稅率征收，因而就造成了田賦負擔更加不合理的情況。田畝愈多，產量愈大，地租愈高，納稅人所納稅款在其土地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愈小。反之，納稅人所納稅款在其土地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愈大。因而，就負擔率來說，田賦乃具有累退性。顯然，這是完全符合於地主、富農階級的利益的。由此看來舊中國田賦制度的階級性，難道還不夠明顯嗎？

這裡還需要談一下田賦稅額的來源，即實際負擔人問題。李景漢在大論其稅收分類時，對直接稅作了如下解釋：“大概說來直接稅系以財產及營業為賦課的基礎，稅的負擔即直接歸納稅者本人”。^① 這就是說，直接稅是不轉嫁的，完全由納稅人負擔。至於直接稅為什麼直接歸納稅者本人負擔，不轉嫁，李景漢並沒有作任何說明。本來李景漢就沒有打算在這裡對賦稅問題作真正科學的探討，只不過是留下伏筆，以便為他的“地主階級負擔過重論”作詭辯。

若要以真正科學的態度對直接稅是否轉嫁問題進行探討，那就必須把這個問題和客觀社會經濟條件聯繫起來一併考察。我們可以說直接稅是不轉嫁的。但是那必須有一定的前提，即地租、工資、價格等和課稅有關的經濟范疇都必須在作為徵稅人的國家政權直接控制之下。否則如何能保證地主在納稅後不去提高地租，資本家在納稅後不去降低工資而把稅款轉嫁出去呢？我們請問一下李景漢，在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統治下的舊中國能有這些前提嗎？

①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448頁。

实际上，在私有制的社會中，一切稅收，包括直接稅在內，都是可以轉嫁的。我們這一次在定縣調查，一位受了一輩子苦直到今天才翻過身來的貧農老大爺，含着辛酸的回憶告訴我們：“那時候我租了三畝地種棉花，一到要收成的時候，地主的狗腿子就天天往地里跑、看莊稼的年成，如果年成一稍好第二年就加租，幾乎年年都要加租”。從這個具體的事例中，不是可以明顯地看出，那三畝地的田賦，地主通過年年加租就完全轉嫁給這位貧農老大爺負擔了嗎？

即使如李景漢所說的那樣，直接稅不能轉嫁，而稅負的分配也確如李景漢所說的那樣，太偏重地主的課征。那麼從稅收的最終來源來考察，地主階級所繳納的田賦，乃是地租——從農民身上榨取來的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地主階級多負擔一些賦稅又何妨呢？難道竟值得李景漢這樣大發慈悲之心，為地主階級哀鳴嗎？

李景漢不僅在稅負分配問題上公開為地主階級叫苦，而且還進而公開向反動當局獻計削減地主階級的稅負呢！請再看他的一條結論：“論契稅稅率，失之太重，反于稅收前途有礙，將來亦應加以改良”。^①按“契稅是田房產買賣或典當時，承買或承典者所納的一種稅”。^②該稅又按田房產的價值征收，因而具有財產稅的性質。在舊社會中，由於購置田房產者多系財主，顯然契稅的主要納稅人乃是地主和資本家。而李景漢則鑒於30年代財產交易隨着階級分化和土地集中日益加強而日益頻繁的趨勢提出了此項建議，為財主打算，堪稱有“遠見”矣。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李景漢在稅負在各階級間的分配這個問題上已經完全無所顧忌，脫下了一切美麗的偽裝，公開申明自己反動的階級立場。前面說他在這個問題上為其主子傾注全力乃至奮不顧身，當不為言過其實吧！

三、

國家財政制度中的另一個問題——財政資金的使用方向，也是

① 同上書，第578頁。

② 同上書，第503頁。

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問題。因为它明显地反映着国家的本質和职能以及政府的政策和活动范围。当然,在这个問題上,李景汉也决不会緘默無言的。

首先,請看一下李景汉給旧中国县財政精心設計的一張預算支出構成表:①

定县1927—1929年三年度岁出各項預算之比較

單位:元

項 別	1927年度支出預算		1928年度支出預算		1929年度支出預算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1.党 費		7,100.000	8.0	16,800.000	15.6
2.政 費	44,932.800	48.6	36,993.400	41.6	43,922.000	40.7
3.教育費	37,600.640	40.7	37,016.640	41.6	39,348.640	36.5
4.建設費	1,466.000	1.6	1,471.600	1.7	1,471.600	1.4
5.特別費	8,474.000	9.2	6,343.150	7.1	6,343.150	5.9
总 計	92,473.440	100	88,924.790	100	107,885.390	100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政費虽占首位,但教育費的比重也不小,在1928年度已和政費并駕齐驅;第二,不仅如此,教育費还有着逐年增長的趨勢,而政費和主要作为临时支应兵差开支的特別費,其趨勢則是逐年下降。

看了這張定县預算支出構成表,人們就会留下这样鮮明的印象:30年代的旧中国,真是一片国泰民安、教育事业兴隆的繁荣景象!

然而,任何一个稍有中国現代史常識的人都会知道,30年代的旧中国恰好同他在这張表上所刻繪出来的圖画相反,正是处在一个兵荒馬乱战火連天的动乱时代。旧軍閥的混战甫息,新軍閥的混战又始,貪官污吏橫行,盜匪載道,真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請問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反动政府能够厉行精兵簡政,一再縮減作为維持反动統治的政費和主要用于支应临时兵差的特別費,而抽出大量財力兴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第596頁第247表。

举教育事业嗎？誠然，定县有其特点，当时是所謂“实验县”，教育事业較为发达。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一点，我們还要保留这个問題。

当然，要和李景汉算清这一笔帳是有困难的，李景汉所引用的材料既未注明出处，无从核对，而我們又苦于無案可考。但是只要稍加分析，仍可窺視其調查統計真相之一瞥。

請看李景汉是怎样統計各項岁出預算的吧！“其他各区地方的財政，以不屬县財政范围，故不論列”。^①这就是說，区的行政經費不列入县預算。按旧中国的行政区划，区一級机构在隶属关系上归县所轄。又根据旧中国的財政体制，区又非一級財政，沒有独立收入来源。請問其經費舍县財政又从何而来？更难令人理解的是，在他的統計中，連县政府本身的經費也不包括在县財政范围之內。^②查遍古今中外的財政著作那里会找得出这样奇怪的邏輯来？

請再看一条李景汉的統計法：“如遇軍事发生的时候需用大批款項，則另外筹集村捐开支，未入預算。”^③仅这一項临时支应兵差的开支，据李景汉的統計，在1929年就有2万余元。^④而这一笔按其用途本来屬于特別費項下的开支，仅仅由于系村筹集的，就从預算中被剔除了。

而李景汉又是怎样来統計教育費开支的呢？在这里只要举出下面一点就够了，連一笔尚未动用的而且已經停办了的中学的經費，李景汉也把它計入教育費項下。^⑤按照李景汉的統計法，怎么不会得出“政費和特別費逐年遞減而教育費則逐年遞增”的結論来呢？

我們知道，研究財政支出，除去分析它的構成以外，还需要考察每一項支出的內容。譬如拿政費來說吧，這項支出究竟用到那些用途上去了？这些用途对人民究竟有利抑或無利？只有这样，才会了解每

① 同上書，第583頁。

② 同上。

③ 參閱上書，第594頁。

④ 參閱上書，第585頁。

⑤ 同上書，第593頁。

一項財政支出的政治經濟意義和它的社會效果。而這個問題又是和國家政權的本質與功能密切相關聯的。

看來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李景漢似乎沒有像在賦稅問題上那樣的勇氣了。譬如關於政費和黨費的說明就只有那麼寥寥幾行，說了幾個機關的名稱和經費數字。但是李景漢在這個問題上也不甘罷休，一有機會就要為其主子塗脂抹粉。李景漢在論及教育經費時，則用了几倍於政費開支的篇幅，幾乎把定縣大大小小的學校的名稱羅列無遺，最後還不厭其煩地把已經贅述過的定縣教育經費來源列表展示。這樣看來，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縣政府的主要功能，好像是教育事業的組織和領導，而縣財政則是教育財政了。李景漢這種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本領確實已經達到登峰造極了。

最後，為徹底揭穿李景漢在舊中國縣財政這個問題上歪曲事實為其主子塗脂抹粉的鬼把戲，還有必要提一下縣財政在舊中國整個國家財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根據李景漢的統計，歸定縣支配的稅捐僅占定縣人民負擔的全部稅捐的 $\frac{1}{5}$ ，其餘的 $\frac{4}{5}$ 則悉數歸中央和省支配，^①這 $\frac{4}{5}$ 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李景漢沒有而且也不敢回答這個問題。很明顯，是用到各系軍閥之間的混戰和各系軍閥聯合起來絞殺人民革命力量的罪惡戰爭上去了；是用到那個龐大的，包括警察、憲兵、監獄、法庭、特務在內的，用來鎮壓人民的國家機器上去了，是用到供養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大大小小的官僚身上去了。

而定縣的教育經費呢？就是按照李景漢統計的數字，也還占不到定縣人民負擔的全部稅捐的十分之一。列寧在論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文教支出時曾說過的一段話，對於我們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會給予一些啓示。列寧說：“……也僅僅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已從收入最大的來源中，實施了自己的最主要的支出（用以保障資產階級統治的支出），而將次要的來源留給地方機關，作為所謂“人民需要”之用。以數十萬去供應軍隊，以一文錢去供應無產階級的需要——這便是

^① 參閱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570頁。

資產階級國家支出的真正比例。”^①

而李景漢對三十年前還遠遠落后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舊中國的縣財政，却如此歌功頌德、贊揚備至。我們除去說他在这里向其主子賣弄奴才相，還有什麼別的可說呢！

結 束 語

通過對定縣三十年前社會概況的調查和對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的批判，我們能得出一些什麼結論來呢？首先從政治上說，李景漢是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最忠實的代言人。李景漢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社會學者，不管他們說得多么好聽，裝扮得多么漂亮，而一俟遇到階級關係這個最根本性的社會問題，就會露出猙獰的面目，千方百計地為剝削統治階級作辯護，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李景漢的那副奴才相在其“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的“巨著”中不是已經暴露無遺了嗎？

同時，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一定階級的政治服務的。所謂超階級的、超政治的“純學術研究”只不過是騙人的鬼話而已。李景漢的這部“巨著”不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在农村中進行着你死我活的鬥爭那個時代的產物，從而起了維護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作用嗎？

這就是一切御用學者及其一切活動的階級性。

其次，我們更深刻地体会到，站在反動階級的立場上看問題，其觀點必然是唯心的，方法也必然是形而上學的。在“巨著”所羅列的全部社會現象中，有那一個是李景漢按照它們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它們的呢？就連風俗習慣這個非本質的社會現象，李景漢也把地主階級的風俗習慣歪曲成是全體農民的。在問題的分析上，則全部是從現象到現象，那里看得出一點它們的內在聯繫來呢？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153頁。

李景汉不仅用唯心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歪曲事实，而且还用捏造事实、断章取义等卑鄙手法来印证他们主观臆造好的反动结论。在“巨著”中，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社会调查的反科学性。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重要的体会，就是毛主席关于“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英明的论断，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一切资产阶级教授、学者的真实面目。在李景汉这部七百余页、洋洋数十万言、被资产阶级社会学界誉为“无所不包”的“巨著”中，究竟有多少内容涉及到社会现象的实质问题？在他所论及的那些属于社会现象的实质问题中，又有那一个能以自圆其说、言之成理呢？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确实是“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弱”。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彻底破除对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的原因。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调查和批判，只是作为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社会调查的批判的开端。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因而，我们丝毫也不能麻痹和自满，必须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战线上再接再厉，继续前进，直到全部、彻底、干净拔掉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社会调查的白旗。

（1958年9月于定县）

駁斥李景汉关于社会調查的 实用主义方法

哲学系教师 刘炯忠

右派分子李景汉关于社会調查的哲学观点是道地“美記”的实用主义,虽然他和右派分子吳景超等其他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一样,很少公开談到他的哲学观点,但是他的实用主义方法的狐狸尾巴毕竟还是掩盖不住的。

(一)

我們知道,实用主义在对待哲学根本問題上是采取“逃之夭夭”的态度,关于这点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主編的“定县农民教育”中說得很明白:“我們想产生的教育建設方案,既不是偏于“心理的”建設,也不是偏于“物質的”建設,他們自以为这样的方案,才是既顧到“心理的”方面,也顧到“物質的”方面,只有这种心物“綜合”的建設,才是超于“心理”和“物質”之上。这其实并非什么新鮮的花样,而是实用主义关于精神物質合一而物質离不开心理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过用着逃避哲学根本問題的方法把它掩盖了而已。我們的“平民教育”主張者虽然宣称不偏于“心理”,也不偏于“物質”,但在另一个地方却認為不管是“心理的”或“物質的”建設都是“人的建設或新民的建設”。而所謂“人的建設”是什么呢?就是各个人的“整个人的心身的发展”,亦即是“新人格的建設”。究竟怎样才算是达到“新人格的建設”呢?晏阳初、李景汉等都一再強調指出:要特別注重“公民教育”,这种教育就是李景汉所說的“三民主义”教育。而“三民主义”在蔣介

石匪帮的手上，已經是經過惡意歪曲并束之高閣的东西，实际上他这里所指的“公民教育”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教育，不过挂上了“三民主义”的牌子而已。根据蒋介石所解释的这种“公民教育”是“誠”一个字，“誠者成也”，“不誠無物”。这里所謂“誠”就是指对国民党及其法西斯国家的忠誠，“認定国家为至高無上之实体，国家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就得“牺牲”。这样的“新民”就是要做蒋介石的替死鬼，只有这样才算是达到“平民教育”所說的“人的建設”，也就是“新人格的建設”。这种物存在于心之中的“誠”的建設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不是什么超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东西。就是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所主張的“三民主义”，在宇宙觀上，我們和他也是不同的；如毛主席所說的：“共产主义的宇宙觀是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三民主义的宇宙觀則是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

李景汉一伙之逃避哲学根本問題，还表現在他对“社会調查”的喧嘩声中，他正是借用注重“事实”、“实际”，而声討“舶来品”、“主义”来把自己的实用主义观点加以掩盖。他說：“……講社会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經詳細解剖民众的內容，專心研究工人現狀的呢？我們以为若要徹底的补救社会，断不能凭借任何一种舶来品的什么主义。解决社会問題的基础在乎赤条条的事实。”李景汉在这里正是企圖用攻击“舶来品”的方式来攻击馬列主义，好像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生搬硬套的“舶来品”，是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这是惡意的歪曲。是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苏联及其他共产党的一样，是馬克思主义，因此都是德国的“舶来品”，但是由于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要求每个国家共产党人要根据自己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提出綱領策略、决定政策和解决問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相結合。因此它决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帶着“偏見”的“宗派主义”。正是由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从而作出战無不胜攻無不克的正确决定，已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践充分証明了这一点。而决不像

李景汉所說的：“講社会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詳細解剖民众的內容，專心研究工人現狀”的鬼話。

李景汉之攻击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在他所写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書中也露骨地表現出来，他正就是借用所謂“事实”为名来进行的。他說：“乡民虽然不懂得共产与赤化的真意，却是怕的了不得，也听說当时北京的政府是討赤，若某人有了赤化的嫌疑，罪过极大，当局要重懲的。”他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就公然把国民党在进行內战时，把搶掠得来的民脂民膏叫作“討赤費”。

可見，李景汉所謂不談“主义”是为了反对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而宣傳的是法西斯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並沒有如他自己所說的：“超出了人間計算利害的崇拜”，或者是超出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

就是在全国解放后，李景汉还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进攻我們的党和馬列主义，他在一次教师座談会上就公开罵我們党“左手拿着馬列主义，右手拿着苏联武器。”他“在国家統計局召开的座談会的发言”又攻击我們“建国以来处处以苏联先进經驗为据”，这是“教条主义”。他在文汇报記者右派分子刘光华的訪問时又說：“目前我国的許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原則，干巴巴的缺少根据丰富事例的活生生說服力”。总之，李景汉到处把馬列主义歪曲成为“教条主义”的稻草人，然后加以攻击、这和詹姆士在表述他的“徹底的經驗主义世界觀”所玩弄的手法一样，把唯物論說成只是“字面的解决”，因此，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从而也就是缺乏“說服力”的。其实，历史唯物論并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概括了社会历史的大量丰富的事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社会发展的一般律規的。因此，在历史唯物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呈現着具体和抽象、个别和一般、部分和整体的辯証統一。既有丰富的材料，也指出了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質和規律性，如馬克思所著的“法蘭西內战”、“拿破侖第三政变記”和恩格斯所著的“德国农民的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書就是历史唯物論著作的范例。正因为历史唯物論是从

总结社会历史事实来的，所以它就成为指导实践的南针，同时由于它来自社会历史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它就提供了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原则解决的方法论。李景汉在这里不过是企图通过反对“教条主义”的借口来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哲学根源就是利用“具体”、“调查”等等的词儿来掩盖其逃避科学的抽象、来反对革命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

李景汉口口声声反对“学理研究”，而事实上作这种抽象研究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这是可以从他前后矛盾的言论中看到的。他说：社会调查不只是为了“应用”，它又属于“纯粹科学的研究，寻求真理，能随时校正已有学说的谬误，而建设新理想、新学说、新定律。”这就是说，社会调查虽然是为了实用主义的“应用”、方便性，但要怎样才能方便于中国这样特殊的“脚”和“头”呢？那么关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应用还是得进行一番“纯粹科学的研究”才可。李景汉一伙在定县所搞的“实验区”正是为了承担这样的任务，经过研究有效用之后，就在全国范围之内加以推广。这样，在他的说法中虽然有矛盾，但是从他反对“学理研究”指的是要反对研究马列主义而要研究实用主义，他所主张“应用”指的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应用，那么矛盾也就达到统一了。

我们认为，真正的教条主义是应该反对的，因为它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统—，引导人们只是作单纯理论的“学理研究”。所以毛主席一再指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时毛主席总结了过去红色区域之所以弄出许多的错误，原因之一都是由于“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怎么办呢？毛主席又指出了：只有作“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人而没有对于农村的深入调查，毛主席认为：这是“没有农村中的基础概念”。因此运用概念作出的判断也必然是缺乏事实作根据的。但是，话得说回来，我们主张面向实际，接触实际，并非因此就要来否认“学理”的重要性，没有理论作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这才是割

裂理論和实际的統一。李景汉反对“舶来品”反对“主义”，对社会問題的解决主張“一步一步的进行”，“随事实覺现实，随时切实实践”。这是明显的“爬行的經驗主义”。所以，李景汉对于他的社会調查作过这样的比喻：旧中国的社会好像是一个“大杂货店”，究竟它的“盈亏如何”，已經好久“沒有清理”了，这就是他認為中国社会問題一直沒有获得解决的症結所在（其实当时中国社会問題之所以还没有馬上得到解决，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結合，其力量較之革命力量來說，还暂时占优势，以及由于革命方面主观上还犯过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錯誤）。从而他提出要用“社会調查”来“救中国”的主張。但是为了“清理”中国这个“大杂货店”究竟有多少缸缸鉢鉢，并“非一朝一夕所能算清，須用很久的時間，多人的才力不可”。因此，他認為当前的急务是要大家来一件件地“清理”，如实地記下“本帳部”。这和胡适当时所提出的口号：“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从而引导青年去“整理国故”，逃避现实的革命斗争，追求“小我”的“不朽”一样。李景汉認為：現在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就是“打倒，凡不順某人之眼，或不合某派之心的事事物物，統在打倒之列”，这是“主观的成見、偏見、情感”。是“乱打乱倒”。而且他还伪装成为关心民瘼，为民請命的仁人出来，說是这么一来“老百姓夾在打与倒的中間可就大受其罪了”。他的結論就是：“先慢打倒”。

如大家所知道的，馬列主义及其政党在解决社会問題时有二个特点：一方面是时刻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用科学冷靜的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和它的发展过程，这样在解决問題之先，才拿得穩。另一方面，既然正确地認識了客观情势和它的发展过程之后，就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样才能打得狠。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要坚决依靠“老百姓”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既然革命是“老百姓”在我們党的领导下干起来的自覺行动，因此，它們就是处在打手的方面，而不是夾在“打与倒的中間”，“大受其罪”的就决不是“老百姓”，而是那些应被懲罰的旧制度、旧事物、反动派。李景汉在这里不是为“老百

姓”，而是为反动派請命、哭灵。

其实，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在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中已經作了天才的分析和概括，分清了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明确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工人階級能否实现对农民的領導，則是中国革命的成敗关键，同时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組織群众才能够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来进行“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毛主席热烈歌頌革命暴力的明确立場和态度就駁斥了李景汉“先慢打倒”的謬論。毛主席說：“‘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秩序，阻碍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反过來說，“無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們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国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轉变。”同时毛主席又很形象地駁斥了借惋惜破坏而实际上是反对革命的腔調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温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的暴烈的行动。”因此，在革命过程中免不了要引起一些“鷄飞蛋打”的，正如“人民日报”在“群众运动威力無穷”的社論中所說的：“不乱国民党的天下，就沒有共产党的天下”；如果現在不打爛一些缸缸罐罐的話，將來就要打爛更多的缸缸罐罐。但这决不是李景汉所說的“乱打乱倒”的“糟”，事实上我們的革命暴动，决不是如李景汉所歪曲的那样是“一切打倒”，我們要打的只是那些“吃人的仇敌”。如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武裝上要打倒地主，打倒都团，推翻县官老爷衙門差役的政权，推翻族权、神权和男权，以及清匪、廢苛捐等等一切封建反动势力。当然站在这些势力的立場来看革命，是“一切打倒”、“乱打乱倒”的。李景汉的叫吠正是如此。就是在解放后，他在“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現在”的报告中，無形中透露了他这种余悸說：“过去，不仅一般人家，就連地主富农在內，都过着精神不安，甚至日夜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明明是站

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來說話。我們的革命暴動之所以不是“亂打亂倒”還表現在：對於一切有利於人民群眾的東西，在當時都採取了保護和興建的态度，如“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開展“合作社運動”，“文化運動”以及“修道路”、“修塘壩”等等，干着對於人民來說是“從來未有的痛快”事兒。可見，我們這樣的結果，並不會招致“國困民窮”，更不會造成“亡國滅種”；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如果“革命運動所造成的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正是由於我們黨領導我國革命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建國才九個年頭，已經逐步在消滅我國“一窮二白”的舊面貌，建設成為和平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支柱，成為東方出現的“巨龍”。如果是照李景漢那樣“先慢打倒”的主張去干，這樣才真的會加深“國困民窮”的慘局，招致“亡國滅種”的厄運。

總上所述，李景漢之所以要假借社會調查，從“事實”出發，而反對“主義”、“學理研究”，反對“偏見”，反對“打倒”諸如此類的喧囂，不過是為了反對革命、反對馬列主義。其政治陰謀是至為反動的。

(二)

既然我們在前面揭露了李景漢所以要宣傳和進行社會調查的反動政治陰謀，往下我們就來揭露他如何偽裝這個陰謀的。

在李景漢的著作中，他屢次強調：“凡人能把一樁事業作到好處，一個重要的條件是本人對於他的工作有堅決的信仰，或相當的興趣，尤其是關於現在的社会調查工作”。你們看：社會調查的成敗取決於從事調查的人的“信仰”、“興趣”，這是從調查方面設下了主觀主義的陷阱。另一方面，李景漢又說：在調查訪問時，“雖然有許多問題在心裡，不可發問過於急促，先要造成談話的良好環境”。這是從被調查者方面設下了主觀主義的陷阱。這二方面合起來，恰好完成了實用主義關於社會調查的“事實”的主觀主義。為什麼呢？因為李景漢所搞的社會調查，不是真實情況的調查，而是惡意歪曲真實情況的調查。為了推銷拍賣這種毒品，免不了要作一些“宣傳”工作，使得還未上這種社

会調查当的人，都能轉变到像李景汉那样的反动立場，死心塌地来为国民党統治階級服务。这样才会对那种歪曲事实真相的社会調查工作有“信仰”、“兴趣”。如果竟然有人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場去搞社会調查的話，結果則不是粉飾而是揭露了，正如詹姆士所說的：人类的一切認識是不确定的，因此必須用对我们所說的世界真实存在的信仰来补充它。所以李景汉的社会調查的真实存在就要靠人們的“信仰”、“兴趣”来补充它，实际上他在这里所指的“信仰”、“兴趣”是指要坚定地站在反动立場运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的問題。当然，我們也認為一个人要作好一件事是要有兴趣的，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去作好。但是，兴趣、信仰并非如实用主义者杜威所說的那样：是由某种本能产生的，是人适应环境的一种机能或工具；把兴趣看作純粹是有效用的主观的东西。其实兴趣如同意識一样，它們的內容是客观的、社会性的。一般說来，不同的階級就有着不同的兴趣。如古人所說的“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的道理正是如此。例如美国腐朽的資產階級对“好萊塢的大腿”有兴趣；反过來說，工人階級却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事业有兴趣。馬列主义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并非是由于要靠人主观的兴趣，更不是要像宗教那样靠人的信仰，因为靠信仰的教条，是不能在實踐中、經驗中加以檢驗的；而首先是由于它反映了社会发展規律，是真理性的知識，符合于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它就在無产階級当中找到自己的物質武器。可見李景汉所說的“信仰”、“兴趣”是要靠站到或轉到坚定的反动階級立場上才可能产生出来的。兴趣并非天生的，而是受着階級地位制約的。同时，既然李景汉的社会調查是歪曲事实的調查，是調查者事先就拟好了怎样来維護当时社会制度的“許多問題在心里”，由于這些問題沒有反映当时所要調查的真实情况和本質；結果，即使如李景汉那样坚定地站在反动派的立場，仍然会遇到被調查者方面所給与的困难。这就是作真容易作假难。而李景汉又必須完成社会調查的工作，以便造成一个騙局，表示出这个調查是从被調查者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情况”，因此，就得“先造成談話的良好环境”。那就是要求被調查者能够根据調查者事先在心里拟好的許多問題来回

答，那么，这些被調查者就必须是已經轉到和調查者相同的立場和观点上来，才有可能。否則就会对不上口徑，造成揭露当时社会制度的相反目的，这是違反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所以李景汉在“实地調查的方法”一書專門設了“如何使地方人士接受社会調查”的專章。甚至如他所津津乐道的，不惜耍手段，利用小恩小惠来拉攏人心，他在作“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調查时就介紹了他利用着那“随机应变”的手段，来“謀得村民的好感”。例如，介紹村中人“到燕京医院”看病，种牛痘啦，“为本村的貧戶施过米面”啦，“在燕京大学找事作”啦等等庸俗的方法。就是在解放后，李景汉曾騙取了一次机会在北京郊区作过“农村調查”，若吉塵同志就揭露了他在到农民家里去的时候，口袋里常常是揣着兩盒烟，一包糖，还有面包等等。反动本性毫無悔改的右派分子，免不了是要用旧社会的眼光来对付新社会的人物的。当然解放了的人民是不会受他所拉攏收买的。就是在解放前，他这种作法在劳动人民群众中也是沒有他的市場的，既然李景汉的社会調查是要依靠被調查的人上圈套，所以他作出結論說：“总起来說，这种調查的是否成功，几乎全靠着調查者与村民的感情如何”。也就是要靠村民是否“上勾”为断，至于“使他們明白調查的意义是办不到的”。即是說，要把李景汉所搞的社会調查的黑店打开給他們看明白“是办不到的”。因为，那样作法村民是不会上勾的，除非他們調查的对象是站在和李景汉反动派同一立場的人才可以办到。这种人正是李景汉所經常地談到的紳士、乡村長之类是。这些“肉食者鄙”是会大言不慚地說：在农村里并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的。李景汉在談到这样的調查过程时說：首先是“按照調查的目的所拟表格”，“在开始調查以先”就“邀請本村警察署長、署員及村中領袖数人（当然是地主、惡霸、团总之类是）”“开一茶話会”来“博得他們的欢心”。他認為当时的調查“若沒有警察的帮忙，多半不能办到”。又他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的序言中也說到：“在調查时，县政府及各局也多予以很多的便利。这里应当特別感謝的是各村村長佐的合作”。你們看，調查的“成功”是要靠国民党的爪牙的“帮忙”的，这样的材料而能免除“成見”、“偏見”，豈

不是痴人说梦？如列宁所说的，这种调查，“为了获得资料（调查卡片就是根据这种资料填写的），差不多总是恰恰求助于那些为自己利益而隐蔽真情的人”。这样的材料只能是“完全任意编造出来和一点也不可靠的资料”。

是的，从事一种社会调查是必须讲究一定的方式的。例如，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为了要作好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工作，然后才能了解到真正情况和斗倒地主恶霸，我们的干部曾采取了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和同劳动等方式去接近他们，但是这和李景汉所说的要造成“良好环境”的圈套不同，因为他们这样作的态度是虚伪的、欺骗的、拉拢收买的行为，为的是要群众歪曲真相，口不随心说话。如同杜威所说的：“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反过来说，我们和农民过“三同”生活，其态度是非常诚恳的、交真心朋友的。如毛主席所说的，在调查时，是当他们的“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的态度。”只有这样作，才能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得农民群众“吐吐苦水”，说内心话。毛主席在“兴国调查”中就谈到了当时进行调查时的和谐情境：“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正因为毛主席和群众有着这样的好关系，使得调查更顺利地进行了。当然李景汉这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口密腹剑”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个，也不能作到这个的。

可见，有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也必然要得出两种不同的效果和结论。

再就调查的内容来说，李景汉既然在口头上强调反对“学理研究”，而“特别注重应用”。但是，在开始调查时，总该有一个入手的地方，李景汉为了“应用”起见，是这样入手的。他说：在调查开始时，“先大略估计本区小农、中农等农户的数目（预定没有地主、富农的）及其百分比。然后按照各种农户所占之百分比，在六十二村内分配要调查的农户数目，如此希望大致可以代表这一区所有农户之情形（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使避免过于偏重的弊病。”李景汉的“应用”方法是逐字逐句这样写着的。现在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

他說在調查“農戶”的情形時，要“避免過於偏重的弊病”，這是預定不要“偏重”於地主剝削的揭露，對於農村的階級鬥爭的揭露。而李景漢的社會調查正是為了掩蓋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所揭露的：“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達到反對革命的目的，而來對於所要調查的農村的“小農、中農與大農等農戶的數目及其百分比”“先大略估計”好的。李景漢這種作法並不新奇，而是抄襲實用主義的做法，運用“大略估計”的主觀假設，來作為“應付環境的工具”。因為在杜威那里，正是把現實看作任何在人類行為中有效用的東西。“估計”並沒有真實或虛假之分，它不過是為了達到統治階級的一定目的的工具，真理不過是人們手中的定貨單，要什麼貨就交什麼貨。李景漢正是這樣主張的，他說：本會之調查工作，“乃是為實用而調查，為隨時應付本會之需要而調查”。對於他來說，“真理”不過是“為隨時應付本會之需要”而設的“定貨單”而已。這就是他有時也來奢談“真理”的實在內容；就是說對於國民黨有效用，能夠騙取人信仰的就是“真理”了。這難道不是信仰主觀唯心主義的教條嗎？

談到在進行調查之先，要不要“估計”、可以不可以“估計”的問題。我們認為“估計”是可以的，也必要的，如同在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研究上，需要從假設入手一樣。恩格斯說：“自然科學在它的思維限度內，它的发展形态就是假設”。可以這樣說，科學的假設是科學方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科學假設的成立本身，已經是概括了大量的事實材料、是反映客觀事物發展規律性的一種思維形式，已經具有客觀真理的性質了。我們的調查和研究工作，正是根據這樣的假設來從事下一步工作的。但是，它的被提出和實用主義所理解的假設不同，後者是把假設看作是純粹主觀性的任意妄為的東西，只是看作“應付環境的工具”。可見，有着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就有着不同的對待假設的態度，如同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在調查前就有着不同的“估計”一樣。關於這點列寧指出了：統計也和其他科學部門一樣，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都是為了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

關於“估計”或調查大綱問題，馬克思就曾經為“第一次國際”擬

訂了对全世界各国工人階級的狀況进行統計調查的“調查大綱”，列宁也論述了“正确的提綱”是調查統計发生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毛主席在“‘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了：在进行調查之先“必須有調查綱目”，在“兴国調查”中也談到了要有“調查的綱領”去收集材料。可見在調查之先有“估計”有“綱領(目)”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它們之被事先拟好或“估計”出来，虽然是要按照应行研究的对象的性質和各該具体研究所担負的任务来决定，但是，不管它的形式如何，它之被“估計”出来却不是任意的，而是从“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为指导的。例如，毛主席在1930年9月作“兴国調查”时，从它的調查項目看，就“估計”当时的农村必然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关系、剝削关系和階級斗争关系，他的“調查綱領”正是包括了这些作为了解农村情况最本質的項目。其中包括：“本区旧有的土地关系”，关于田地的分配，他是从地主、公堂、富农、中农、貧农等等去看土地的分配关系。至于李景汉的調查則是尽量来掩盖这种关系。关于人口的成分，毛主席則是从地主、富农、中农、貧农、雇农、……等等去看其成分，至于李景汉則力圖掩盖人口的階級成分，而按照非本質的特征，例如按照一定年齡的特征去分类。正因为毛主席是按照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进行調查，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科学結論：“依上所述，真正的剝削階級(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們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就是說，通过这样的調查而表明了农村中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剝削关系。此外，毛主席还通过“地租剝削”、“高利貸剝削”和“稅捐剝削”等等的調查，深刻地認識了在农村里“斗争中的各階級”有地主、富农、中农、貧农、雇农……等等。从整个調查的目的来看，就是为了：“調查各階級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現”。并为了指导进一步的革命斗争服务的。如毛主席所說的：“只有認清中国社会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轉变”。这才是真正的“認清中国的国情”。而不是如李景汉那样故意的歪曲“国情”而作出主觀的“估計”来替反动派辯护。

而且我們事先所擬好的“調查綱目”，固然是在正確的立場和觀點的指導下進行的，並且根據所要調查的同類對象的特點、發展規律和過去的实际工作經驗擬出來的，所以我們的“調查綱目”與李景漢的“估計”根本不同，我們才是真正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則進行社會調查的，並沒有把“調查綱目”生硬地“嵌在”調查對象上，作“填鴨式”的調查，而是把“綱目”看作是一個參考材料，不斷根據調查過程中所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來修改補充，力求通過調查掌握實在的情況，使得主觀適應於客觀。馬克思在編制調查大綱時指出了：要按照各國的發展條件去變更大綱上的問題，要把問題具體化，以適應各國發展的特點。他說，“一般調查大綱（各地可以加以變更）”。至於李景漢的社會調查則不然，他口頭上反對“理論”、“學理”的指導，美其名為一切從當前的“事實”出發，實際上他是反對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而去接受實用主義方法的指導，這樣他們的“估計”必然是從頭到腳都貫穿着“偏見”的。他們在調查各個農戶的過程時，就是“希望”“大致代表”這一區的農戶的情形。這是虛偽的說法。實際上他不是“希望”，而是存心歪曲。因為，按照他們的觀點認為，社會和它的一切原因是不可以認識的。正如杜威所說：“在社會領域內所謂試驗的東西與自然科學中的試驗完全不同；它毋寧是伴隨着某種程度的希望和許多空話的嘗試錯誤底過程。”李景漢在這裡正是把社會調查當作某種希望的東西。列寧曾嚴厲地駁斥了這種“恣意濫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議論”，這種“議論”不過是“為了辯護丑惡事情的‘主觀’捏造”而已。而李景漢在攻擊馬列主義的方法是“鳥瞰式”的時候，認為它是空洞的“抽象”和“形而上學”的，不是從事實出發的。只有他的社會調查才是“顯微鏡式”的深入实际的方法。可是他們在定縣農村作了“顯微鏡式”的調查之後，奇怪得很，連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地主、富農的階級關係也睜着眼睛看不見，這才是把客觀实际，按照李景漢所“預定之步驟”和事先的“估計”而“嵌在”他的調查之上，這是把客觀適應於主觀；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在李景漢的調查中，也看到他有時說及關於“土地分配”的問題，實際上不是關於“土地分配”

的調查而是歪曲。杜威正是認為个人生活的环境完全是一个主观意識的世界，只能在与主体的关系中存在。他說：所謂事物，不过是一种“能够对它工作的东西”，即是任由人們打扮的姑娘而已。可見李景汉的上述作法，并不是“量脚作鞋”，而是“削足适履”，企圖通过社会調查的“法宝”来挽救国民党制度于狂瀾之既倒，用心可謂苦矣！

(三)

根据前面的揭露，我們認識到李景汉是按照他事先主观地“估計”好的提綱去进行調查的，往下我們就来看看他是如何搜集“事实”来“驗證”的。他認為：“一切判断均要以事实为根据，在各地社会生活中找出活的証据，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杜撰。这样得来的东西，与所下的結論才真正是学术的产物。”

馬列主义認為：人的各种認識是要經過实践的“驗證”、“复案”才可以成为真理性的認識的。一方面，我們認為，科学假設之被提出來，它本身虽然是帶着真理性的而不是如实用主义那样看作是主观妄为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認為無論是什么假設，既然是假設，就必需有事实来“驗證”，否則就不能成为科学的理論而只能停留在假設的阶段上。毛主席在談到自然科学理論时正是这样說的：“許多自然科学理論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們創立这些學說的时候，而且在于为今后的科学实践所証实的时候”。对于从事社会調查的工作更是如此。列宁在“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一書中，就談到了社会科学的認識的“驗證”問題。他說：“本書根据經濟的研究及統計报告之批判的解剖对于社会經濟制度，从而对于俄国階級構成所作的分析，現在由革命进程中一切階級的公开政治发动所証实了。”毛主席在“东塘等处調查”的报告中，就談到了要調查事实来“驗證”認識的真理性質。他說：“在李家坊調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兩級苏維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組織和生活情形。在这次調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觀念是模糊的。”在这次調查中，有了事实作“驗證”了，“使得我发现以村为單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正是由于这

样的调查研究,为以后实行土地改革时,从以村为单位纠正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这样便于调整调配土地,这就证明我们党的政策是以科学的调查作为根据的。而不是如李景汉那样诬蔑是“想当然”的。又在对待中农的土地政策上,有些人认为分配土地,中农会吃亏,毛主席经过“兴国调查”证明了“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又经过“木口村调查”也证明了:“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这就是党的在农村中实行团结中农的政策客观根据。所以毛主席十分强调:在进行社会调查时,不要“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而要作“周密的调查”,以便获得足以“验证”的真实资料,这样才可以成为制定政策的科学根据。

必须指出,从来我们党的一切重要政策的决定,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甚至作了多次反复的调查、验证和修改补充之后,才作出决定的。这就是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有群众为基础的,是以马列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为了使得我们的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党中央还明确规定了,要在全国各地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目的就是使得我们的干部通过“种试验田”的实践,使得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工作,能够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达到理论和实践、政治和业务技术、领导和群众更直接的统一。这次李景汉“在国家统计局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有“宗派”是主观主义。其实,只有共产党人的人事制度才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执行的,并且是完全符合于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它在对待人和事的发展情况上,都要求从纵的方面——历史关系,和横的方面——社会关系等等来深入了解,经过反复的调查,寻求人证和物证的“验证”、“复案”,决不轻易下结论,这才是严格负责的态度。所以问题不在对于调查的事实,对于“估计”是否需要“验证”、“复案”,问题是在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寻求事实来“验证”、“复案”的。

关于这点,我们且来看看,李景汉在他那自鸣得意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报告中,所列举的在定县调查过的六个村的阶级关系的结果。他说:“这个区790农家共种田地20366.9亩,其中559自耕农所种

之田計14662.4亩,占总亩数的72%,220半自耕农之耕地計5563.5亩,占27.3%;11佃农之耕地計141亩,占0.7%。”單在这里就已看到李景汉的調查統計是在故意掩飾农村的階級矛盾。他在这里所作的农村的人口的分組法是錯誤的,因为地主、富农和基本劳动农民是本質上不同的階級、階層,即使地主家中也有的耕种一些土地,但却是雇佣农村的工人来耕种的;富农虽然自己也劳动,但是中国的富农,多以“地租債利等方式剝削农民”(見“怎样分析階級”);因此,就不能籠統地把他們歸属于自耕农或半耕农的行列中去。只有依照农村階級、階層的类型去区分农村的人口,才是科学的分組法。如我們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正是按照地主、富农、中农、貧农、雇农……等等来区分农村的人口的,这样才是按照它所反映的那些社会現象的本質上的标志去实行分組的。正如列宁所說的:“我們既然承認了現代农民中有很深刻的經濟差別,所以就不能仅仅止于按财产的多寡把农民划分为若干階層。”因为它们不只是“数量上的不同”,而且有着“質量上的差別”,这是区分农村人口的最重要之点。例如貧雇农和下中农在数量上是不同的,在質量上也是有区别的,但就他們都是属于基本劳动农民这点來說,他們在根本利益上是沒有差別的。至于貧雇农和地主、富农的差別,則不只是数量上,而更重要的是質量上,他們之間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李景汉之所以要把属于剝削者的地主、富农和基本劳动农民一样,都歸属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行列,就是为了掩盖他們之間的本質差別,抹煞了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农村中絕大部分耕地靠着剝削群众过活的事实,以便达到調和階級斗争的目的。同时我們要指出:科学的分組法是科学的平均数法的基础和根本,即是說,各种平均数法是要以同种类型的現象作为依据的、不同类型的現象就不能加以比較。既然李景汉不是按照本質上不同类型的各階級、階層分类,因此,他所列举的上述“农家”耕种的田亩的百分比数字,就沒有什么科学分析的意义。正如列宁所揭露,这样的“一般的概括的‘平均数’却有着完全虛假的意义。”这样的手法,如同資本主义辯護士所作的一样,他們夸大了工人的薪金收入,而故意把大亨們、經理

們……等等优厚的薪金收入也加到工人的收入之內，从而抹煞了这样的一件“小事”，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絕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资本家手上的事实。另一方面，李景汉还說：“据农民的意见（純粹是捏造），这一帶地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漸增，而佃农漸少”。这样在李景汉調查的六个村里仅有的11戶佃农，在不断地“漸少”的过程，自然而然地达到“耕者有其田”了。这样，在农村中仅有的一点剝削关系也消失到無影無踪了。同时要順便指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不只是一个县的調查，而是作为对旧中国农村的典型調查，即不只是限于他所作的六个村調查的意义；正如他所說的：在这个“县內的农民生活”……等情形，可以說是“相当的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形，也可以大致說明全国农村社会的縮影”。所以他在这里否認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和农民反封建的階級斗争，也就是为了一般地否認全国存在有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农民反封建的階級斗争。定县“平教会”的干事長晏阳初正是根据李景汉的調查而在他的“平民教育真义”中認為：中国社会並沒有階級的区别，因此，“我国人对于階級的观念，自来就很薄弱”。在解放后，李景汉在所作的“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現在”的报告中，还繼續替地主階級辯护。在他看来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並沒有有什么“差別”的。他說：“今日，有充足劳动力的原地主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昔日降低很多。”我們知道，在土改过程中，的确是和农民一样，給地主分配了一份生产資料，要他（她）們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同时，經過土改后，随着生产发展，接受劳动改造的地主，生活水平也会比剛土改时提高一些的，但是應該肯定，土改后还不很久的地主生活，是要比解放前过着那种“养尊处优”、“前奴后婢”穷奢极欲的腐化享乐生活是要大大降低了的。同时，地主們既然在解放前过着“飯来張口，衣来伸手”的好逸惡劳的生活，劳动力总是不强的，因此，在土改后就不可能有較“充足的劳动力”，而李景汉的上述說法，正是为了歪曲历史事实，来替地主辯护的。

李景汉既然抹煞了地主富农和农民的区别，所以他就进一步来

否認階級鬥爭。他在調查中說到了當地的租佃關係“頗好”，“沒有地主無理壓迫佃農的事情”，和“地主欺詐或威吓佃農的事情”。他在另一個地方談到奴隸主和奴隸的關係時也是唱的一個老調，他認為“從來無奴隸反抗主人之事發生”。李景漢在這裡還替一切階級社會的矛盾作油漆的工作。

李景漢在他的社會調查報告中，經常喜歡眩示他是注重“事實”、“實際”，而反對“教條”、“研究學理”的，他在解放前曾這樣說過：過去寫東西有着“一寫就是一大片統計數字的習慣”。的確，在李景漢的著作中是看到不少“事實”和“統計數字”的。但是，我們要指出：一方面，他所調查統計的“事實”和“數字”，並不反映社會的本質、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他所調查統計的“事實”和“數字”是為國內外反動派的政治和經濟的統治服務的。

馬列主義認為，“事實”和“數字”對於政治經濟學、調查統計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政治經濟學正是依靠着調查統計作為自己認識的武器的。通過各種調查統計的資料，就可以把複雜的、困難的經濟問題、發展過程簡單明確地表述出來。否則，關於無產階級的任何實際行動或計算都是無從入手的。正是因為這樣，列寧強調指出：“統計學家必須是我們的實踐的助手”。這就是說，為了實際工作，我們必須掌握數字。例如：我們黨中央提出了要為鋼而戰，要為今年生產1070萬噸鋼而戰。這個統計數字就成為我們實踐活動的強有力的號角了。可見，統計資料或數字對於認識和實踐都是非常必要的，問題是這些“事實”或“數字”是來自資產階級的“公務人”手上的呢，抑是來自工人階級自身參加得來的呢？由於來源的不同，就決定了它們的客觀性、正確性和可以利用的程度。而在李景漢的“一大片統計數字”中，正是屬於資產階級“公務人”的資料的。如我們前面所揭露的是來自國民黨的警察、縣政府、紳士、村長……等等這些為着剝削階級利益而蓄意弄虛作假的人的手上的。

同時，馬列主義認為：關於科學的調查統計，並不是任意的數字排列，而是用一定的數字來說明全面分析所要確定的社會經濟關係。

因此，在数字的本身，首先就不只是数量而是質量的問題，不是技术而是經濟特点的問題。至于李景汉所罗列的“事实”或“数字”則不是为了說明而是为了掩盖社会发展的質的方面，亦即是社会經濟关系的方面。而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产生与作用是以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为轉移的，这些条件就是社会发展規律賴以发生作用的社会經濟关系、階級关系。既然我們調查事实、占有資料和数字，是为了从这些事实資料和数字的分析中寻求出关于这类社会現象的发展規律性，那么在分析事实和数字时，就必须从社会經濟关系、階級关系的性質，以及从它的变化发展的情况上去着手分析，而不是从那些与寻求社会发展規律毫無关系的个别事实、实例或者抽象的标志去分析。从而可見，关于調查統計的基本概念就是那反映社会发展規律的本質的、全面的、整体的和相互联系、相互制約的概念。如列宁所說的：“觀察的客觀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因为“从共存过渡到因果性，从一种联系形式和相互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更深入的、更全面的形式”（列宁）乃是辯証法的要素之一，正是由于它才提供了調查統計的科学的基础和根据。并且使得調查統計的方法成为辯証法的表現形式之一，而不是折衷主义的杂拌。而在寻找因果关系、社会发展規律的关键，則要找出在諸多关系之中誰是最后决定的、誰是最后被决定的关系，这样才能找出它們之間所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約的本質关系，而不是把因果关系溶化在折衷主义的相互作用之中。如美国杜威为了反对馬列主义的唯物論决定論，而惡意地制造出所謂“全面的”“多元論”或“多因素論”，認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多元的”，亦即是要否認馬列主义所主張的关于經濟因素的最后的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而是由他所列举的下列因素的同等的作用：“法律和政治”、“工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表現和傳达的艺术”、以及“道德的情况”……等等因素的作用。从而他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主义所主張的“規律”、“必然性”“决定論”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因此，是已經“过时”了的，而必須为新的概念，也就是为“或然性”之类的概念所代替、为折衷主义所代替。

既然李景汉的作法，一如我們前面所揭露的，在他所作的調查統計的“事实”或“数字”中，掩盖了关于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剝削关系和阶级斗争关系——这些作为認識社会发展最本質的最主要的关系；这样，他就必然是要否認社会发展的規律、因果关系的。尽管李景汉为了掩盖他的社会調查的实用主义方法，在有些地方他假意地說社会調查是为了：“調查事实真相，发見社会現象之因果关系（至相当程度时，即可將已經証明的事实归納起来，作成定律）。”我們認為这是他所玩弄的障眼法。实际上，他是为了歪曲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否認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定律”而去从事社会調查的。关于这点，我們可以从他对旧中国貧穷落后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謬論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旧中国之所以貧穷落后，是由于“愚、貧、弱、私”四大基本特征（缺点）所造成的。这和胡适所主張的“五鬼鬧中华”一样，是既誣蔑中国人民，又是为国内反动派来开脫罪責，而且他这里所列举的“多因素”的謬論正是拾取了杜威的“多元論”的牙惠来曲解中国的社会問題。既然他否認了旧中国之所以貧穷落后是由于国民党制度所造成的，因此“救中国”的办法他認為不必通过革命“打倒”而可以通过“教育”、“社会調查”的方法来达到。这是头号的反动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貨色，这难道不是昭然若揭的事实嗎？这不是寻找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定律”而是寻找对于国民党統治阶级要怎样才是有利的方便性。杜威正是这样說的：“科学”不是寻找客观的“因果关系”或“定律”，而仅仅是为了寻找有效用的假設。关于这点，还可以从詹姆士对于休謨的“拚湊的哲学”所作的狗咬狗的“揭露”看到他的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性質。詹姆士認為休謨的哲学不过是“一种多数事实的哲学”，它并没有“把这些事实归諸它們所屬的本体”（即是沒有揭露本質）。这就是为了“有效用的”目的而掩盖着“本体”（或本質）的。而李景汉之所以要罗列“愚、貧、弱、私”的“事实”正是为了掩盖旧中国社会的“本体”。正因为他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折衷主义杂拌，所以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声言：“本書在报告多种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評論与結論。”这就是借用“事实”的罗列来掩盖其观点和立

場的实用主义方法。

馬列主义認為：調查和研究事实是一个辯証統一的过程，調查事实可以說是屬於感性認識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又是在一定的理論指导下的感性認識过程。而研究事实并作出結論，找出其中內在的規律性，这是屬於理性認識的过程；沒有事实的調查，这样的認識就如無源之水，沒有事实的研究和作出必要的結論，必然是限于單純的現象罗列或折衷主义杂拌，这二种作法，都免不了是割裂統一的認識过程。而李景汉既否認在調查时的理論指导，又否認調查事实之后要作出必要的結論，这都是用实用主义方法来降低或否認理論的作用。其实，如毛主席所說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現象問題，理論才解决本質問題。”所以，馬列主义認為：凡是那些已經被明确提出来的問題，在决定分析的任务时，都应当作出結論，給問題以必要的回答，否則就是缺少了調查統計工作中的最后阶段。而且列宁还指出了：無产階級政党在分析資料作出結論时要包括二个部分：“第一，是理論的，它能帮助工人階級認識工人运动的条件”，这就是說，要作出理論的总结。“第二，是实际的，它給我們的工作以直接的指示”，这就是說，單是理論的总结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出实践的主張来。馬列主义之所以要調查事实，正是为了要研究事实，从事实中分析以便綜合出指导实践的結論。毛主席在“兴国調查”所作的結論，正是列宁所指示的总结的模范。他在整理后記中就談到要作調查的“結論”問題。正如前面曾提过的，他在东塘等处調查了解到当时“这些地方的村乡兩級苏維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組織和活动情形”，并且“发見以村为單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同时提出了实践的主張：“以村为單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貧农的分配法，是應該改变的。”以后我們党的关于土地分配的政策之所以改为以乡为單位，正是遵照这种科学的結論为依据的。

是不是李景汉的社会調查真的沒有結論呢？不是的。从表面看来，他的調查是很少作出結論的。但是，他既然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場

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进行调查，这样他所搜集的事实就必然是代表一定的立场，反映一定的观点的。单就事实本身就是他所要作的结论了。例如他搜集或捏造了农村中只有“小农、中农和大农之分的”事实，这就是他所作出的在农村中没有封建的土地关系的“结论”了。这就是李景汉有时也喜欢引用英国的一句格言“事实胜于雄辩”的全部意义了。解放后，李景汉在他所作的“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现在”的报告中供认：我“今日认识到从前些微做过的所谓社会调查，由于缺乏阶级分析的知識，未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我们认为首先是由于他反动的立场驱使他歪曲事物的本质），也认识不清农村贫困的根源，也就当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这些旧资料仅仅提供了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已。

李景汉之所以要罗列“事实”不只是为了掩盖事物的本质，而且还是为了替国内外反动派加强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服务的。正是因为这样，李景汉所搞的社会调查，曾得到美蒋的爪牙的多方帮助，他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说到了这点。他说：“本会（指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先生对于调查工作非常注意，不断的予以指导与鼓励，甘博先生对于定县社会调查，甚为热心，数年以来，关于调查的计划与方法方面指导很多，对于经济方面曾予以慷慨的援助。”否则他们一伙所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就不容易拿到美蒋的津贴，他们的“职务范围”就不能“扩大”，“责任”也就不能“加重”，“大杂货店”的买卖就不能生意兴隆。他们对于美蒋是有过汗马功劳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得顺便指出他们的社会调查同时是属于“功能学派”的，就是通过社会调查可以为统治阶级来收集经济资源材料，军事政治的情报等等，以便于国内外反动派的经济的掠夺和军事政治上的控制。正是因为这样李景汉提出“救中国”（应改为：“卖中国”）首先从社会调查开始，也就是从“清理”中国这个“大杂货店”开始，过去由于“帐目糊涂”，所以它和美蒋的“买卖情形日渐萧条”，以及由于“调查统计不清”所以造成军事、政治控制不易，以致“社会秩序日趋紊乱”。为了便于国内外反动派的军事、政治的控制，李景汉一伙所搞的社会

調查是為了供給“平民教育”去培養“整套”控制縣級和鄉村級的奴才和爪牙。這就是說他們的社會調查是為“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作開路先鋒和收集情報的。所以李景漢在談到社會調查要注意收集“政治方面”的情況，他強調說過：要“注意關於新縣政（即法西斯的制度、鄉村的保甲制度）推行的成績，地方自治的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治安態度，人民團體的組織，秘密社會（當然，他首先指的是我黨的地下組織了）等情形”。李景漢在這裡把他的社會調查美其名為作“學術的旅行”要作出“學術”的探討，實際上他是要替國民黨作更隱秘的特務破壞工作。如他自己所說的：“旅行者不但在學術方面可以有所貢獻，而且也是能夠幫助社會的安全（着重點是引者加的），促進社會的建設，解決社會的問題。”

李景漢的社會調查，不只為了“社會的安全”而且還為了“社會的建設”，他說：“讀者也許知道大英帝國今日擁有這樣多的殖民地，其中許多地方最初都是它的國民在旅行中發見而報告於國人，因此引起政府當局的注意而進行占領的。你如果看見了旅行過新疆、西藏等邊地的英國人所編著的精密報告，一定要瞠目結舌，而發生無限感慨的，難道我們中國人旅行就生成是專為山水和玩賞不成。”原來李景漢所以要舉行“學術旅行”，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為統治者“占領”“殖民地”而作的。他在談到“邊區”的調查時也毫不隱諱地說，調查時要注意“本地有何等資源可以開發”，諸如此類足以“報告於國人”的大發見。李景漢正是本着這樣的調查“功能”來向當時從事社會調查的人進言：要效法“大英帝國”的成就，要對有軍事和經濟價值的見聞編著成“精密報告”，否則只是“瞠目結舌”，“無限感慨”或者只是“為山水和玩賞”，那是不能完成任務的，這是“忽略了與抗建有關的中心問題”。事實上，我們從李景漢所作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的報告來看，厚達828頁，真是洋洋大觀，他不只調查了定縣的“地理”、“歷史”、“確定人民的身份”，調查了定縣的財政、經濟和各種資源分布的情況，而且還調查了“許多不便于發表的材料”。這種“材料”，如同有關資本家利益和收入的“商業秘密”一樣，是不願給人明白此中

“秘訣”的。这种社会調查对于李景汉來說，的确如他所說的：不是为調查而調查，而是为了美蔣的“应用”而調查。我們在他們所編的“定县平民教育”的緒論中也看到了，他們指出当时的調查“有普通調查、經濟調查及农业調查三种，材料非常多，將來別有專刊报告”。他們这样作，美蔣当然会論功行賞的，通过这样就可以“驗證”、“复案”中国的确是“地广物丰”大可开发的國家。李景汉也談到了为什么要調查这样多的材料說：我們將这些“堆积的材料”，“不很整齐的材料”发表出来，为的是供政府“参考”，正“好像矿工把山間一塊一塊的矿石开出来送給化驗师去化煉，由他們随便揀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关于这点，可不用李景汉操心了，美蔣会从其中“揀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的，这不是充分地“驗證”了李景汉的社会調查是为美蔣的利益服务嗎？李景汉所強調的要搜集“事实”来“驗證”、“复案”原来是为了这个。开宗明义說出来不是更方便一些嗎？

而且还要指出：李景汉的社会調查的作用，并不只是限于定县一个县的范圍，而是有着全国性的“意义”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运动的目标”是在于“認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特別着重农民的教育与农村的建設，遂选定县为实验区。因此，李景汉又說，“平教会”的研究，“不是單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而且在定县“平民教育”的“六年計劃大綱”中也表明：他們現在所进行的“表証訓練期”是“以訓練为目标，以全国为范圍”“为全国訓練实际提倡”。可見李景汉所搞的这一套“社会調查”、“平民教育”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才选定定县为“实验区”，为的通过这样的“实验”来“驗證”这种方法、作法是有利于美蔣統治者的。这就是他們所說的理論和实践的“統一”了。

駁斥李景汉关于“平民教育”的謬論

哲学系教师 刘炯忠

为了揭露右派分子李景汉关于“平民教育”的謬論，必須結合他和文化买办晏阳初等人在定县所办的“平民教育”一起来批判。因为当时晏阳初在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簡称为“平教会”)担任着干事長的重要职务，他們之間的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为了揭露“平民教育”的老根子，又必須結合对于他們的祖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进行批判。

我們知道，杜威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总危机的时代，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杜威的哲学及其教育观点就是这个时代的帝国主义的产物。一方面，为了消除国内的“革命的危險”，杜威就企圖利用他的教育哲学来在“全国人民內心的深处“树立”民主的(应改为帝国主义的)习惯、思想和影响”。同时杜威为了配合美国壟断資本向外扩张，以便緩和国内的經濟危机，所以他就提出“世界理性”的教育来，杜威宣称：要“消灭国家的目的和广大的社会目的(即指“世界理性”)之間的矛盾”。因为：民族独立和主权是临时的、次要的东西，只有“世界理性”才是永恒的、主要的东西。可見杜威的教育哲学是为帝国主义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服务的。

談到晏阳初、李景汉等“平民教育”主張者的观点，正是师承杜威并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尽管他們披着“改良主义”的时裝，頂着“教育家”等等騙人的牌子，但是他們作为民族的敌人、文化的买办來說，始終是掩盖不了的。当着蔣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叛卖了第一次国内革命之后，他們就打着“平民教育”、“乡村建設”的号角出場，企圖組成反共反人民的社会战綫，以便和蔣介石的軍事战綫相配

合，其反动阴谋是至为恶毒的，他们在定县“平民教育”的“六年计划大纲”中说：我们“感于内忧外患之交迫，及国内与国际间之渴望”，所以有必要推行“平民教育”。杜威在华的“五大讲演”中就表明了这种“国际的渴望”：“中国今日很可以利用普及教育，使人人机会平等。普及教育的用处，并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即可“免除”阶级斗争）是使人人有平等的机会（实即使人人可以成为适合资本家奴役的对象），西方发达普及教育，远在工业大革命以后。中国今日正工业未兴之时”，苟能“及早预备，尚可挽救”。蒋介石在1931年召见晏阳初时表示了这种“国内之渴望”；关于“民众的组织 and 训练的问题。这个工作太重要了。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基础工作做起来”。晏阳初、李景汉等人所推行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正是为了实现国内外反动派的“渴望”应运而生的。事实上，由于“平民教育”的工作曾经一时迷惑过人，取得了“成绩”，这种组织很快地为中国的和美国的反动派所器重。并使得定县的“平民教育”被确定为推行全国平民教育的“研究实验及训练的中心”。晏阳初、李景汉之所以要搞“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政治阴谋，不过是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共的军事战线组成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社会战线。一方面，在国内通过小恩小惠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来替国民党收拾人心，转移革命目标；另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扩张开辟道路，提供资源资料和“合格的国民”（李景汉语）；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首先，杜威以及“平民教育”者，深知二十世纪是动荡的世纪，如果只用大炮而不用香饵是不能使“鱼者”上钩的，所以杜威就在美国提倡所谓“全民的”、“超阶级的”教育，企图以此来掩盖它的阶级实质和避免“阶级分裂”的加深，从而达到保卫“民主主义”的目的。杜威在宣称自己的教育观点是“超阶级的”、“全民的”时候，和他主张自己的工具主义哲学是“中立一元论”的手法一样，既不偏于那一个阶级、也不偏于那一个主义，并且借用真理的效用是“社会的”、“集体的”等等字眼，来把资产阶级的党性掩盖起来。晏阳初、李景汉所主张的“平民教育”，玩的正是这个花招。“平民教育”在自己主编的“定县农民教育”

一書中說：我們在這裡“不談空洞的理想，不顧目前的利害”的，是“超階級的”。晏陽初還在他所寫的“平民教育的真義”小冊子中，專門設了一章來解釋“平民教育”本身不是一種“階級教育”。他說：“還有一部分人，用了‘平民教育’的‘平民’二字，而誤認‘平民教育’是與‘貴族教育’成對待的名詞的。其實所謂‘平民教育’是說同是圓顛方趾，同是平等的人，都應享同等的權利，受‘人’所應受的教育。故‘平民教育’可以說是‘全民教育’或‘民眾教育’。若拉東洋或西洋‘平民’名詞的觀念來看我國的‘平民教育’，那便成了階級教育了。豈非笑話！”從來剝削階級的詭辯手法都是借用改變事物的名稱來改變事物的實質的，晏陽初在這裡正是這樣，他們就是借用“圓顛方趾”這樣的人的自然屬性來談抽象的平等，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借用“全民”、“民眾”的字眼來掩蓋“平民教育”的剝削階級實質。他們在“六年計劃大綱”中也是幻想把自己所“設計的立場”說成是“純粹為‘社會的’、‘教育的’、‘學術的’”立場。李景漢在談到“平民教育”時曾一再強調說：它是“為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設”着想的，所以這樣的教育即是“全民的生活教育”；為的是使“人人”都有文化。

馬列主義認為：教育不過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現象之一，在階級社會里，教育只能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因此在階級社會是沒有“超階級”的教育，正如毛主席所說的：“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李景漢由於自己言論的荒謬性，他在談到“農村的教育問題”時也默認了他所反對的觀點。他說：“我國原有之農村教育可以說是愚民教育或奴隸教育，是使農民的意識麻木，安於所處地位”。這不是把封建教育產生的階級基礎以及其作用說得很明白嗎？“奴隸教育”是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階級目的所決定的。接着李景漢又說：“現行教育制度仍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不合中國小農社會的需要。”這裡所謂不合需要，指的是農村人口受着“工業社會”的教育而向城市移動的現象（當然，認為勞動力的移動是受教育影響的說法是唯心主義的觀點），其實，在封建社會里，這種現象的出現，正如列

宁所說，本来是一种进步的現象，它可以补充城市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改变社会階級关系。可是这种現象对于封建統治來說，則是不大美妙的，因为农村人口走向城市移动，就会动摇分散的个体經濟的封建統治基础，所以李景汉把这些人統統罵之为“游民階級”。如果說，是有“游民階級”的話，也是由于国民党在农村的掠夺，以致造成农民無以为生，在城市失业，使得他們被拋到失业的队伍中。而“平民教育”的实施，正是为了要“教育”他們“安土重迁”，不要輕易离开农村，以便稳定小农經濟的基础。正如右派分子費孝通在“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等書中所提倡的一样，只有“重建”中国农村才能繼續巩固国民党統治的經濟基础，以及維持“工业帝国主义，农业中国”之間的“協調”。李景汉所以說：在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教育制度不能套在“中国小农社会”之上，这不是又說明了：他們的主張是要在一定的經濟基础上产生的教育为一定的經濟基础服务嗎？可見，杜威、李景汉等所宣称的教育“超階級性”，不过是利用客观主义来伪装其階級本質，这才是最徹底的資產階級党性的表現。这样，就能更好地在人民群眾中拍卖資產階級教育的私貨。事实上，从“平民教育”者的言論和实践看得很清楚，李景汉正是主張要通过教育把国民党的各种法西斯統治的政策貫輸給人民大众的。他說：“現代东西各国深悉教育功用之偉大，莫不汲汲从事于精密之設施，寓国家各种政策于各种教育事業之中（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以发达国民之腦力、陶鑄其民族之特性，树立其强固不拔之基础。”晏阳初、李景汉之所以要“汲汲”于把定县的“平民教育”的計劃从十年改为六年，乃是鑒于反共的“时机紧迫了”，要急于使得“受过平民教育的人，無論处任何团体，皆能努力为一个忠实而有效率的分子”（李景汉）。这样才能为国民党的国家“树立其强固不拔之基础”，而不至受到“奸人”（他們罵共产党人的口头禪）的欺騙。这就是为什么“平教会”諸人和一切刊物、口号、标語，毫無例外地十分強調对于国人特别是对于“八千万青年”的“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青年人精气旺盛而易感动”，因此，必須加以“訓練”才能成为建設和民主化中国的先鋒”。才能成为李景汉所說的：

健全“整个人底心身的发展”的“新民”；才能“使自己区域的人民恢复对政府的信仰，而且还可以使共区的人民也被吸引过来”（晏阳初）。这就是为什么李景汉在提倡“教育救国”时极力主张要以“政治教育为经”的原因。

可见杜威以及他的喽囉晏阳初、李景汉宣称他们的教育是“社会的”、“全民的”，而不是“阶级的”教育，到头来我们看到的不过是法西斯的教育，不过是有着“改良主义”“教育家”的掩护物罢了。

其次，实用主义教育观点的骗术，还表现在他们把教育看作是调和以及解决阶级矛盾的钥匙上。晏阳初、李景汉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正是怀着要来“调和”国内社会矛盾的目的。他们眼看国内的革命烈火熊熊，如果声称“平民教育”可以“消灭阶级”的话，人民大众尝着这么大的甜头，必然会由此减弱他们的“阶级的观念”（晏阳初）。晏阳初为了这个目的还制造出了这样的论据说：“如果说中国也有阶级，那便是‘知识’阶级，或说是‘士’的阶级。所谓‘士农工商’把‘士’列在首位，‘士’的阶级和其他各界，显然分个贵贱高下。‘平民教育’就在铲除这个‘士’的阶级，使所有的人都受教育，以达到士农、土工、士商、士兵的目的，实行‘均学’主义。所以说，‘平民教育’是打倒阶级的教育则可，如说，‘平民教育’是制造阶级的则不可”。既然他们认为教育是“超阶级的”，是“全民的”，因此，也就可以通过它来达到社会的平等，消灭阶级的差别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揭露认为通过“平民教育”就可以“打破阶级”的神话。实际上他们是要拥护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的长存。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主张和行动起来“打破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普及教育即“平教会”所提倡的“均学主义”。如毛主席所说的：“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的”。同时，既然晏阳初、李景汉所要“打破的阶级”并不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国民党的“三座大山”，那么他们说要“打破”“士”的阶级，所玩弄的不过是诡辩法术，这和另一个他们的同党“乡

村建設”的主張者梁漱溟的謬論一樣。他說：舊中國“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職業，而沒有兩面對立的階級”。不過晏陽初、李景漢在這裡所玩的手法還“高明”一些，捏造出一個“士”的階級來作為“打破”的對象，從而轉移“打破”的目標。我們從社會發展史看到了：在原始公社時代，是沒有階級的，後來由於大規模的社會分工：畜牧業和農業，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隨之而產生了社會最初的大分裂，即主人与奴隸、榨取者与被榨取者二大階級。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物質的和精神的分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是社會之支配的物質的勢力者，同時是社會之支配的精神的勢力。這個階級將物質的生產手段歸其統治，同時也要來安排精神的生產手段”。這樣才出現了為“物質的勢力”所支配的“士”人階級來。“士”人從他的經濟地位來說，他和有產階級是有不同的，一般說來，他們不占有生產資料，在階級社會，“士”的階級地位是按照他們所採取的政治立場、態度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來決定的。但是，一般說來，在階級社會“士”人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站在剝削階級立場的。不過，也有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士”人，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通過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鬥爭，使得原來站在剝削階級立場的“士”人，逐步轉變到進步的、革命的甚至是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而且，其數量也隨着鬥爭的發展而增加着。這樣，如果說，要“打破”階級的話，就應該站在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人的立場，去“打破”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可是，晏陽初、李景漢的主張却相反，他們認為共產黨的這種“打倒”是過於“偏激”，從而他們主張“不攻擊任何階級”也可以達到實行“合作化”的謬論。這不是在“打破”階級的外衣下維護階級嗎？

再次，實用主義還提出所謂“教育萬能論”的主張，他們宣稱：只是社會生命的生理的繼續發展還是不夠的，因為每一個新的世代都必須重新創造世代相傳的經驗，這樣為了要傳授經驗，非有教育不行，結果教育就成為社會生命延續不斷的主要的決定性條件了。李景漢在談到教育的作用時，正是這樣主張的。他說：教育的作用就在於“扶植社會生存，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這和蔣介石所主張的生活的意

又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的說法如出一轍。就是說，他們認為教育不只能消滅階級差別，而且如李景漢所說的：“教育為改進各種事業的原動力，社會變遷，民族之興衰，無不與此有密切之關係。”從而得出：教育決定社會發展的結論。李景漢還舉例說：“社會的進步，是依隨着組織能力的程度，社會愈進步，組織愈嚴密，愈完備。”然後他用“對症下藥”的口吻說：“中國農村組織不健全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由於國民教育的缺乏”，所以為了組織的健全，社會的進步，唯一的單方就是發展教育了。他們所主張的“教育萬能論”的魔術就是這樣扮演的。

我們認為：教育既然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上層建築現象，這樣它對於物質基礎來說就是被決定的、第二性的現象和第二位的動力了。但是，我們是辯證唯物論者，而決不是如資產階級所誣蔑的那樣：是什麼“經濟決定論”者，因此，我們同時主張：教育對於物質基礎的能動作用。這種作用首先表現在通過它可以使得人們，特別是青年一代學習和掌握過去所積累下來的技術和知識，使得社會生產繼續不斷地向前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教育是社會生產得以繼續發展的一個條件；但是，它卻不能成為決定性的條件。因為教育只是社會生活的精神方面，它畢竟是要受着這一個社會的物質基礎所決定的。社會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下去，首先是由於社會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的歷史，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正是由於勞動群眾通過生產才能維持和改善社會生活。並且就在生產過程中，由於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從而引起勞動者的生產經驗、勞動技能以及運用生產工具的本領也隨着變化和發展起來，這樣才有教育關於知識、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傳授。可見，教育對社會的發展來說，是第二位的動力。這樣教育的作用就決不是如杜威所說的：“社會只有仗着這種傳授和交際才能存在”。教育被看作是“社會生命繼續不斷的工具”。也不是如李景漢所說的：“教育為改進各種事業的原動力”，把教育的作用看作是“萬能的”，從而他錯誤地認為：對於舊中國

的“愚、貧、弱、私”（李景汉所捏造的中国人的四大基本特征）的医治只要通过他們所主張的“四大教育”就可以药到回春了，这是对于旧中国社会貧穷落后原因的惡意歪曲，其解决的办法也是至为反动的。事实上，我国革命的胜利已給他們的謬論以徹底的打击了。如毛主席所說的：“地主階級这样殘酷的剝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极端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經濟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至于李景汉所說的：“中国农村組織不健全的原因”，决不是首先“由于农民教育的缺乏”，而是由于“分散的个体生产”，有了这样的生产方式，才有着分散的生活方式和“組織的不健全”，既然根本原因是在封建剝削制度上，那么为了克服它，就只得根本推翻这个旧制度，然后在农民自願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化。关于这点可以从农民經過土地改革，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中的表現得到証明，中国的农民群众决不是如李景汉所誣蔑的那样：生来就是落后和自私自利的。

在前面我們揭露了晏阳初、李景汉等所主張的“平民教育”的階級作用之后，这里我們就来揭露它的内容實質。

根据杜威的观点認為：工具主义哲学本身可以說就是一种教育的理論，因为它的哲学价值和效用，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表現出来。既然工具主义主張一切要从“事实”出发，而他們所了解的“事实”就是經驗，就是指的習慣、信仰、信念、成功和失敗、社会的成就和制度的发展等等，在他們理解为一切人的脚底下的主觀經驗。他們就是用这样的“爬行經驗主义”来反对理論对于實踐的指导，認為如果實踐要有“先驗的”理論作指导，那就是“教条主义”。他們就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理論对于教育實踐的指导，正是因为这样，在美国的教育界研究教育理論的很少，如果有人去研究它的话，就被斥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样造成他們只是着重教学上的方法和技术的枝枝节节問題，他們認為教育問題正是靠这样的一个一个問題来解决的。杜威說：“在我們面前对于任何年齡的人，摆着一个課題，就是学习，依賴着經驗而学习，要把它发展起来，丰富起来。”可見，他們

的教育观点是不可知論的。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杜威首創了“劳动学校”的制度，按照他对这种制度的屡次解釋，肯定在这种制度下的学校生活，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准备。因为通过生活的实践，学生才取得經驗，这种实践是从学生底现实的、切身的、个别的需要出发的，只有这样才使得理論和实践“統一”起来，而且，学生在学校的实践就是社会的实践，因此在社会所有的职业就應該是在学校所有的职业，学校这样就成其为职业的学校了。杜威就是这样要把为劳动人民而設立的学校变成职业的学校，从而降低劳动人民学习理論、了解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規律知識的机会。

我国的“平民教育”論者亦步亦趋地尾随着杜威的教育观点，并提出主張說：他們的教育是从“事实”出发的。他們在“定县农民教育”一書中，标榜他們的“教育方案”是根据“归納法的科学方法”制定的教育方案，比那“玄想的”、“假定的原則”要“科学”些。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了；在实用主义者那里，所謂“事实”不过是各个人脚底下的主觀經驗，因此从主觀出发即使运用了“归納法”所制定的方案必然也是主觀的；同时，归納法和演繹法并非独立的思維形式，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不是从客觀事实出发所进行的概括，其結果才是“玄想的”。至于馬列主义的原理原則决不是什么“玄想的”，而是概括了自然，社会和思維領域的大量事实而作出来的科学概括。如列宁所說的：“价值是‘沒有感性物質’的范疇，可是它比供求規律更具有真理性”。反过來說，如果在进行归納时，沒有那規律性的知識作为指导，来进行个别現象的研究，就只能“爬行的經驗主义”，而不能是科学的归納。而在“平民教育”論者那里的作法正是这样。就是說，他們归納得来的“結果”是并不“可靠”的。而且事实上，他們这样来攻击馬列主义的“玄想”，而自己却販运了实用主义的“玄想”。李景汉吹嘘說：“平民教育的方法原則，东西洋的教育既無可抄襲，旧教育的方法亦無可遵循”，而是“从研究实验着手的”。他們就是玩弄这样的障眼法，企圖把自己的“平民教育”說成是从自己的脚底下“研究实验”得来的，而并非抄襲美国实用主义的，这难道不是掩耳盜鈴的手法嗎？

究竟“平民教育”的主張者是怎样抄襲了杜威的“劳动学校”制度呢？李景汉在解釋“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中說到了：“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想受什么教育須过什么生活”即是說，在这种教育的實踐中，要把重心放在学生的“做”或者“劳动”上，教育的方式要放在学生的“自发活动”上。李景汉接着說：其目的在于使得学生“有計劃有方法認真的作一件具体的事情”以取得經驗，因为“一盞司的經驗，可以敌过一吨的討論”（杜威）。他們就是这样用“事实”来偷換理論，用主觀的經驗来偷換“事实”。这样来貫輸实用主义的教育观点。

我們辯証唯物論者不但不看輕实践、社会生活，相反地，我們自始就認為实践是認識的基础、来源和檢驗真理性知識的标准。但是馬列主义却要坚决反对脫离理論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是盲目的，是事务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之看重实践、社会生活，从苏联对学生所进行的綜合技术教育可以看到，实施这种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得理論知識与生产經驗結合起来；以及使学生能够在社会实践中去运用科学的成就，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理論和技术的兴趣。因此，在苏联，綜合技术教育就成为对于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了。不过，这种教育是在馬列主义关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規律知識指导下进行的，它和实用主义的“教育即生活”的作法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是在取消理論的指导，而單純地主張从“做”、“劳动”中去“学习”，这样的“学习”，只能是盲目的、自发的；因此，他們的教育才真正是加深了资产阶级的理論和实践的割裂，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我們党的教育，向来就是提倡理論和实践統一的，指明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是我們的教育方針。它是培养又紅又專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唯一方法。正是依据着馬克思的这个指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之一。”即是說，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針是为了“改造現代社会”服务的，其目的是为了要达到取消理論和实践的割裂，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以至差別。至于实用主义之所以要提倡“做”、“劳动”的教

育,是为了維持和加深这种差別和对立。因为,在資本主义的制度下,为了使得生产能够正常进行,它要求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劳动力,这样使得劳动者也被引进了学校的門槛,这就是杜威所說的“根本情况底改变”。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尽量設法来限制劳动者的“学习”內容,即限制在完成資本主义生产操作过程所必需的簡單技术和文化之內,他們認為这些人,只有“实际的冲动的氣質”,所以他們的“学习”只能局限在“狹隘地实际的”“做”或“劳动”上。即限制在李景汉所屡次說到的“合格的国民”所要求的範圍內,否則在教育上將會造成浪費。这就是杜威所以要提出“劳动学校”制度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制度,使得他們同时能在教育方面引起“同样的根本改变”。这里正說明了有什么样的經濟基础就需要有什么样与它相适应的上層建筑。他們为了要培养适应于資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奴才,使得“民主主义”有保障,所以他們就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口号来,如杜威所主張的:“应当把学校中的木工、金工、紡織、縫紉、烹飪等工作看成是生活和学习的方法”。从而貶低理論知識傳授的意义。晏阳初、李景汉等的“平民教育”就是抄襲了杜威的这种做法。根据他們的主張,就是在“生計教育”一个項目的学习内容上要做到:“在城市中如关于工业、工艺等,在乡村里如关于农业农艺等。”并且美其名为通过这样的做法,才真正是“身到、腦到、手到”的办法,使学生直接地完成“增加生产改善組織的知識和能力”。必須指出,馬列主义及其政党,自始就重視“做”、“劳动”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因为,正是由于劳动創造了人类,也創造了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世界。但是,我們重視“做”、“劳动”的教育是在关于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理論指导下进行的。反过來說,在实用主义那里,他們之所以提倡“做”、“劳动”教育,則是为了拒絕給学生傳授关于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的理論,从而达到反对改造,特别是对于社会改造的目的,可見,这样的“做”、“劳动”的教育其实不是为了增加学生的“知識和能力”,而是为了增加資本的利潤、增加奴才性,并且还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为資本家生产物質財富这样“有效用的”目的。这种教育正如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斥責的：“資產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絕大多数人說来，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底附屬品罢了。”

同时，我們要揭露他們之所以要实行“綜合活动制”的政治阴谋。李景汉說：“中国近几十年来，并非沒有服务社会、改良民間生活的工作（这是替国民党捧場），然而成效很少的一个理由，即为办农业者不問教育，办理教育者不問衛生，各自为謀。是分割的隔离的，無其他工作可以联络的。因此成功的希望很少。”要怎样才有“成功的希望”呢？按照他們的主張：“本会根据在工作中的經驗，深信生活建設的基本工作，不能不連鎖进行”。这就是他們所以要提倡“綜合活动制”的原由。而“四大教育”則是这种“綜合活动制”的具体化。如李景汉說：通过“文艺教育培养知識力，生計教育培养生产力，衛生教育培养健强力，公民教育培养团結力”。他們就是企圖通过这样的“綜合活动制”的“四大教育”，来訓練效忠于国内外的反动派并控制着县級和乡村的“整套”奴才，从而建立成功反共反人民的社会战綫。如李景汉所說：“四大教育不是不相关独立进行的工作，只可說是平民教育工作連鎖进行的四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平教运动‘县單位’整套的应用学术与基本建設”的人才。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一書中还报导了“平教会”举办的各种“訓練班”，例如，“乡長副訓練班由定县政府与本会合作举行”。在这里自然用不着挂“平民教育”是“超階級”的招牌了。同时我們看到“平民教育”所奉行的“綜合活动制”正是和蔣介石所屡次提倡的孔子的“六艺教育”、“要学者从六艺的实行得到真知”的作法如出一轍，这就是要人民回到封建統治者所欢迎的东西。因此我們說：“平民教育”不过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我国，这样“根本情况已經变化了”的条件下，重复着李景汉所伪装攻击的“愚民教育或奴隶教育”。

至如杜威为有产者所設立的有“智慧的冲动、傾向和氣質”的專科学校、大学、高等学校等等，唱的又是另一套腔調了。如果說，那为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所設立的学校，其学习内容主要是“做”、“劳动”的話，那么为有产者而設立的学校的学习内容唯一的就“讀書”了。

要培养成为有系統“理論知識”(当然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学的那一套)的“通才”。这样所謂“智慧”、“理論”、腦力劳动是屬於有产者的,所謂“劳动”“实际”是屬於劳动者的;他們就是这样在教育制度上来进一步加深階級的分裂,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关于有产者的学校,晏阳初把它称之为“正式学校”以区别于“平民教育”,尽管他假惺惺地为自己声辯,說是在“平民教育”学校“受教者,是不分貧富貴賤的,决不限于貧民”,这也絲毫不能改变它的实質。晏阳初也曾供認过:二种不同性質的学校,是“根据我国一般平民生活程度,經濟能力的大小”而設立的。这样,“平教会”就巧妙地在中国“完成了”教育制度方面的“根本改变”。就是說,适应于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智慧商数”設立不同的学校。这种謬論的应声虫,在旧中国是不乏其人的,例如:梁漱溟說到:有产者“是代表理性、維持社会的”人。李景汉在談到教学上的“活动人物”时也唱着同一調子:一些人是“先知先觉”,另一些人是“后知后觉”,更有一些的人則是“可知可觉”。李景汉在談到“救中国”时經常是以“先知先觉”自居的,从来剝削階級及其代表都是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的。李景汉吃了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却反口咬人,把农民罵之为“愚民可惡”。总之,他們之所以要把人分为有“智慧冲动”和有“实际冲动”的人,这是把人的“氣質”生物化了,永恒化了,从而为階級对立作辯护。其实,人与人的本質区别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在階級社会里,首先是由各个人所处的階級地位和立場所决定的。并非剝削者階級生来是“金質”的人,劳动人民生来就是“銅質”或者是“鉄質”的人。反过來說,从科学发展史看来,出身“卑賤”的人,劳动者才是最聪明的人,劳动者并非生来就是不能掌握和学习理論的。从最近全国工农兵学习哲学的高潮看来,更是粉碎了剝削階級揚言:科学、哲学是神秘的观点。

反过來說,我們共产党的教育方針公开肯定:教育要为工人階級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并且,在貫徹这个方針的过程中,我們提出了文化革命,使得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人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工厂、人民公社……等等都

在大办学校，学校大办工厂、农场，从而使得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即是说，使得有实际知识的人要学到理论，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参加生产劳动，从而很好地实现具体和抽象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杜威及其在旧中国的徒子徒孙，叫嚣“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正是上述谬论的具体应用。

根据前面的揭露，我们了解到：杜威的教育观点是在工具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他们提出“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原则，而他们生活的了解又不是属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规律的了解，而是限制在每一个学生自己所从事的烹调食物、做木工、缝纫、做家具、玩具、编筐子之类的手工劳作上。杜威认为这样才能使得学生“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关于教育的方式则是以这种“自然的生活”的谬论为依据的。究竟“自然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在杜威看来，学生之受教育，不过是学生本身的“自我实现”，教育的内容是学生自给自足的，“不是什么外加的东西，而是每个人天生特性和才能的成长和发展”。这样，杜威就把教育和“发育”、“生长”的自然过程等同起来，认为教育的性质不是社会性的而是自然性的；所以晏阳初、李景汉所主张的“平民教育”不过是要使得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狭隘地实际”的“天生特性和才能的成长和发展”。这样，他们认为教育的过程只不过是由学生的“兴趣”自发地进行的过程，从班级的编制，以至学生的作业计划、问题的解答等等，都可以由学生随心所欲地作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杜威说：“活动不可由模仿发端，这是一般的原则，必须从儿童开始”。教师的作用只是归结为从旁引发学生的“兴趣”而已。并且他们还利用这种自发的教育观点来替教育“超阶级”的观点论证。既然教育不过是学生本身的“自我实现”，教育的内容是学生自给自足的，“不是什么外加的东西”，那么，即使是统治阶级也不可能利用教育作为训练适合于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了。

“平民教育”的主张者，正是追随杜威之后，提倡自发性的教育。如晏阳初所说的：“平民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养成自读、自习、

自发的能力”，或者說：“引起讀書的興趣”。李景漢談到“生計教育”的實施推廣方面，就主張要採用“感應原則（即供給適當刺激物以引起活動）與自動原則（即由農民領導農民自動實行）。這就是說，教育過程是一個自發過程。李景漢還把“平民教育”的這種教育方式概括為“導生制”，這種方式就是一種“學生教學生，和學生領導學生的教育方法”。至於教師“對於學生的活動與研究”所處的地位，不過是“站在輔導地位”。而且在“平民教育”所用的讀物上，如晏陽初所說：“有可以在平民學校里抽出幾分鐘的功夫來講授的，有可以讓他們自己去讀的”。所以預定是可以由學生自發地進行學習的。這就是說，他們在教學方式上的各個環節都盡量貫徹一個原則：降低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規律知識的傳授，不讓勞動人民了解自己所處的被奴役地位。而且實用主義在攻擊“舊教育”的“填鴨式”、“注入式”這些應受攻擊的方式的同時，提出教育要從學生的“興趣”出發，美其名為“個性解放”，企圖把“個性解放”駕在“社會解放”“群眾解放”之上，從而轉移群眾鬥爭的目標。這是極端反動的。當然，“個性解放”在新興資產階級用來反對封建的奴化教育上曾經有過它的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就是在那個時候，所謂“個性解放”仍然是建立在資產階級的个人主義基礎之上的。至於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而提倡“個性解放”，就免不了是反動的口號。其實，個性、興趣並非什麼“自給自足”的東西，而是“外加的”亦即是社會性的東西。中國古書上就有“楊朱泣歧路，墨翟悲染絲”的唯物主義命題，正是表明人的個性的發展並不是天賦的，永恒不變的，而是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的性質的表現。同時，我們還要揭露他們所主張的：學生的興趣是由某一種本能產生，是一種生物的本能，勞動者的“實際的衝動”的本能，產生了他們“做”的“勞動”的興趣，而學生們正是由於這些興趣和本能引導他們去適應外在的環境，也就是去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環境。所以杜威說：“學校應當成為形成社會關係，引起社會興趣的中心”。這種把人的興趣，社會關係是由學校決定，從而也就是由生物性所決定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如大家所熟知的，巴甫洛夫曾經科學地論證了：人的興趣的發生並非天生的自

发的过程，人的兴趣虽然要有大脑这样的复杂有机物作为“天赋的”反射或本能作为基础，并通过它而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人的大脑没有外界的社会的影响，并在这基础上产生更复杂的条件反射，那么它还是不能形成社会意识的。人的意识，人的兴趣，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意识自最初就是社会的产物”（“德意志意识形态”）。可见，并非人的兴趣决定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决定人的兴趣，从而不是教育、学校决定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决定教育、学校。并且教育的效果也决不是完全决定于儿童的实际活动，而首先是决定于受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教育的方针和教育的内容。这样，系统的理论教育和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向来重视理论教育的作用，还把“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之一。谈到教师的作用，列宁曾经强调说：“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升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教师他们所始终不能达到的高度上”。当然，在解放前，我们的红区以及解放后有一些地区，由于师资和经费的缺乏，也曾实行过“小先生制”，收到过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的作法和“平民教育”的“导生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小先生”是在一些受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教育的“大先生”指导下进行的；同时我们的教育任务是服从于社会革命的任务的，而他们的“导生制”则不过是为了降低和否认系统理论的传授和教师的作用，并且是在“改良主义”牌子下为反动派服务的。

既然教育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现象，它是受各该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制约的，因此，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的教育，只能是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服务，幻想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经过社会制度的根本革命，而能实现全国的“普及教育”，不管是缘木求鱼。事实上，从“平教会”成立以来，他们所作的扫盲工作，离“教育的普及”远得很，而且他们也供认了：实施“平民教育”的效果并不佳；“一面‘除文盲’，一面文盲又增加”。就是说，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行晏阳初所叫嚣的“均学主义”的。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论断的：“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

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只有在根本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建立了人民的政權，人民在經濟上、政治上徹底翻身之後，才可能有文化的大翻身。毛主席早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項重要工作。”人民中國成立才九個年頭，已經光輝地執行了自己的任務。在政治經濟飛躍發展的推動下，過去認為需要十年或十年以上才能完成的掃盲工作，現在看來可以縮短，今年已有67%的縣市基本上掃除了文盲，全國小學教育在不長的時間內可以基本上普及，農業中學也有了發展，高等學校的校數比去年也增加，此外各種業餘學校也有增加。有的工人農民出身的專家進了大學和科學研究機關、哲學科學再不被人認為是少數人的專利品，不是神秘莫測的東西了。可見，文化教育的發展是受一定的社會制度所制約的。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下，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原則，才有可能真正地實施起來，在革命和建設中發生極大的作用；從而使得幾千年來被剝削階級所割裂了的具体和抽象、理論和實踐、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統一逐漸重新恢復起來。在新中国，關於教育的發展，不只要注意普及，而且還要注意提高，普及和提高辯證地發展着。毛主席說過：“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但是，我們的普及和提高，是和“平民教育”的叫囂根本不同的，如毛主席所說的：我們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並且從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生動地駁斥了改良主義的幻想，“教育救國”、“教育萬能”的濫調。證明了列寧在他逝世前對於尚未取得政權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所作的寶貴指示：必須“首先用革命手段爭得造成”實行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否則說什麼“先培養人材，然後革命”那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安慰語。至於晏陽初、李景漢等所干的“平民教育”自始就是極端反動的貨色，不過是挂着“教育”、“改良主義”諸如此類的牌子，來掩蓋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更不用說，它是應該受到人民所拋棄的。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對於“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

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可見，今天轟轟烈烈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就顯得它的重大意義了。

駁斥李景汉关于社会学和社会的謬論

哲学系教师 刘炯忠

李景汉和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在猖狂地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端出他们自以为得意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来作为武器，这篇文章就想来揭露和批判他的武器到底是怎样陈旧透顶了的货色。

李景汉在谈到社会学和社会时概括地说：“社会学是一门较新的科学，是论社会全体的科学，是说明人类联结的起源、发达、构造和现象的科学。社会学设法寻找社会组织和社会演进的定律或原理。研究社会各部分彼此的关系，和一切有秩序的变化。”往下我们就来逐个地分析他在这里所表述的荒谬论点。

* * *

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并不是什么“新的科学”，而是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统治时代的产物。如果说，资产阶级学者曾经就社会历史的个别方面提供过积极的“新的科学”的话，那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例如，法国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曾经描述过关于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法国的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猜到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个别方面（如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等是）；以及亚当·斯密、里嘉图提出了劳动价值学说等原理；但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没有能够克服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没有能够创造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能够基本上消灭从来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缺点。更不用说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后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了。可见，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的科学”。在往后的揭露中，我们将看到它加深了历史的唯心主义的缺点，特别是到了美国、中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更加是彻头彻尾的为帝国

主义反动势力服务的杂货摊子，談不到什么李景汉所主張要加以“繼承的遺產”，而是一株毒草。

真正的社会历史科学，也就是“新的科学”，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現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例如：政治經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历史学、法律学……等等。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論的科学，它正是在無产階級的生产实践和階級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一切关于社会历史的积极因素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的新的科学，馬列主义并無需乎李景汉越俎代庖来建立“唯物主义社会学”、“無产階級社会学”。

談到資产階級社会学的概念，本来它是孔德所首先使用的，他曾幻想从学說上来論述社会学这一門关于社会的科学，建立如李景汉所說的“新的社会学”。但是，由于他們所处的时代已經是这样的时代：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出現了，工人运动高漲了，馬克思主义已經获得广泛傳播了，資产階級及其代言人已經逐步走上反动的立場了，他們为了巩固已經取得的統治，所以就慌慌忙忙的来給社会历史过程作出唯心主义的曲解，而孔德、斯宾塞的社会学的企圖正是这样。他們在解釋社会时，就是运用着关于社会的观念来代替关于社会物質基础的決定作用，他們断言：社会的发展是決定于人类的观念及其变化；因此，資产階級社会学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不是什么“新的科学”，而是道地的伪科学。虽然，整个來說，社会学在孔德等人的手上，就是反动的、反科学的了；如果說，在他們那里还有个別地方是正确的，甚至是还企求探討社会历史个别方面的发展規律的話，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总危机的阶段的資产階級社会学更不是什么“新的科学”，而是腐朽透頂的破爛了。

事实上，我們对李景汉的全部謬論的揭露和批判中，已清楚地看到他所夸口的“皇牌”的社会調查，不过是資产階級社会学中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功能学派”的貨色，为的是要替剝削階級收集一切对于經济、政治等方面統治有效用的資料而已。李景汉本人在談到

社会調查时，有时也“自慚形穢”，覺得它并不是“屬於学术方面的工作”，难登大雅之堂，而是为了“对于社会国家的实际用处”，亦即是为了对于国民党所标榜的“勘乱救国”的用处而作的社会調查。这样，正如毛主席所說的：“中国幼稚的資產階級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們預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較完备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关于真正的科学的社会調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問題，并非如李景汉所捏造的，靠着“只有二三个作大学教授的美國人，曾試用在西国已經实行有效的社会調查方法，来調查中国的社会情况”，而是自从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傳播以后，以中国的杰出的馬克思主义者毛澤东同志为代表进行了对于中国社会情况的科学的調查和研究。他的“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这种調查研究的典范。

至于談到晏阳初、李景汉一伙所搞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設”的“理論”，也不是什么“新的科学”，关于前者，不过是將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点在中国的改裝而成为“四大教育”而已，关于“乡村建設”則是他們所認為“时髦”的在西洋逐步发展起来的法西斯主义及其制度的中国化，为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例如，在他看来，西洋都市工商业之所以能“勃兴”，得靠英、荷、比等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在向外发展上“不失敗”，这就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場为帝国主义的擴張政策焚香禱告。又例如，他認為国民党的政权，要能在国民的“身体上、精神上、生活上实现功效，非于乡鎮有极切实健全的自治組織，絕無实现的可能”。所以他就提出主張：“要努力完成新县制的各級組織，健全农村机构，認真訓練农民，教育农民，培养农民本身的力量”，这样才能組成反对共产党的社会战綫。这就是为什么他和晏阳初一伙要极力主張健全“新县制”，健全“乡村保甲制度”的原因。这难道不是明目張胆地为帝国主义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而来建立中国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嗎？

真正的科学的教育理論和經濟建設理論，也只有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后，用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維发展的理論，关于政治經濟学的理論等等才有可能科学地解釋和解决。关于旧

中国的社会各种問題，事实上从新中国建国九周年的实践証明，在無产階級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已逐步改变了旧中国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实践証明了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才是真正的新的科学。

* * *

社会学如果要能成爲一門科学的話，那么，它只能是作为無产階級社会学別名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虽然是社会，但是，它决不是如李景汉所說的是“論社会全体的科学”，而只是論社会发展的有关共同方面，也就是只論証社会发展的普遍規律方面的科学，正是由于它的建立，有可能給各門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以正确的方法論，有了这个方法論的指导，就可以給“社会全体”的各个方而，包括右派分子所說的关于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点”，例如家庭、婚姻、人口等等問題在內都給以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說明。馬克思主义並沒有留下什么“空白点”，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就有力地駁斥过那些說馬克思主义有“空白点”的人們的誣蔑，他們这样作，不过是狂妄地“为欲替社会問題底解决开拓途徑”，恩格斯严正地說：在他們看来，“好像对于我們还有一个理論上沒有解决的社会問題”。后来，在“列宁生平事业簡史”中对列宁有过这样的公正评价：“沒有一个与工人階級解放斗争有关的知識和实践部門，是列宁未曾用其偉大思想来加以丰富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由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与发展，所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維的一切領域的基本問題，馬列主义經典作家都已經提供了原則的解答。只要我們善于創造性地以它們为方法論、世界观来指导在新的情况下探討，結論总是正确的；正是因为这样，馬列主义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了。因此并無需要右派分子来替馬列主义“补空白”也不需要他們来“丰富”馬列主义。

我們說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共同方面，亦即是研究社会发展普遍規律方面，但是，它的对象却不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全体”、关于各个具体領域的具体問題。当然，普遍和个別的区别是相对的，它彼此間又相互补充相互滲透的。这样才能够使得方法論的科学和具

体科学能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取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論的哲学意义。孔德之所以提出实证主义，把哲学“降低”为具体科学，正是为了“消灭”哲学，否認它是作为世界观、方法論的指导意义；引导人們只去注意一个一个具体問題的研究，而抛开社会本質及其規律的探討，以便掩盖資本主义的矛盾和無产階級与資产階級斗争的实質。今天的資产階級社会学，这个經驗主义傾向暴露得更加突出，他們拒絕研究社会历史的“理論問題”；而李景汉的社会調查干的正是这些勾当。他屢次声称：他的社会調查只是記錄“事实”而不作“理論”分析，看来好像他这样作是很“客觀的”，事实上却不如此，因为他正是在一定的“理論”亦即是实用主义的观点指导下去記錄“事实”的。例如李景汉在談到社会調查时，要人們注意到：“家庭的一張臥床，或一个酒壺”等等設備是如何“穿插在整个家庭生活的布置中”，而認為“它們是与家庭的規律、道德、經濟等方面都有关系”的；这难道不是和胡适一样要人們考証：“一个字”、“一座塔”的根源那么煩瑣、庸俗嗎？他們正是借这样的手法，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以便达到抹煞階級及階級斗争这样本質問題的探討，資产階級社会学之所以要人們研究例如：如何寻找恋爱的对象、如何接吻之类的問題，目的正是如此。

李景汉为了替他所主張的社会学是研究关于“社会全体”的观点作論証，为他所主張的反动的改良主义作論証，他巧妙地把社会問題簡單地归結为关于道德的問題、关于价值的問題。李景汉說：“关于社会的研究，处处是与人类幸福，直接或間接发生密切关系。”就是說，社会学研究的是关于幸福的这种道德問題，而不是什么社会規律的問題，究竟要怎样才能达到“人的幸福”呢？李景汉說：“有生物学的知識，人类可以减免疾病，有社会調查的結果，人类可以整个的解除社会生活的痛苦，增进社会生活的幸福。”他在这里又巧妙地把道德問題、幸福問題归結为“社会調查”的知識問題。正是因为这样，他認為“社会調查的主要工作是調查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从所归纳的結果里，就可以发見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发生某种社会行为”。而李景汉

認為“幸福”的增進就是和“效率”這種“人類社會的行為”密切聯繫着的。他說：“效率之增加與幸福之增加甚有關係。效率增加是幸福增加的一個必要條件。”李景漢之所以主張社會學的任务是要研究“人的幸福”問題，是直接地對於剝削階級有效用的。就是說，你們勞動者要能“幸福”，就得提高勞動生產的“效率”即李景漢所說的“生產效率”，因此，我們的工廠、企業、農場之所以要延長勞動時間，加強勞動強度，不過是為了提高“效率”，這也就是提高你們的“幸福”呀！所以廠主、企業主、農場主就這樣來選擇“道德行為”。“幸福”的增進是不必罷工、不必革命的，因為那樣是會影響“效率”的增進的。本來李景漢想從“超階級的”觀點來抽象談論“幸福”，結果卻是談的剝削階級的錢袋怎樣才能漲大，從而有產者怎樣能更“幸福”的問題了。這樣李景漢所提出的“社會演進”就只是歸結為“幸福”的增進，對剝削者有利的“生產效率”增進的問題了。而為了使得勞動者關心“生產效率”的增進，李景漢根據“社會調查”的結果，診斷舊中國這個病人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他開列的單方就是“對症下藥”的“四大教育”，在他看來“教育為改進各種事業的動力”。這樣他又把道德問題的解決歸結為教育問題。但是他又認為“愚、貧、弱、私”這是中國人多年來形成的劣根性，要來改變它們是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因此，也只能夠點滴的改進，這樣他又把道德教育的問題回到天性的問題。李景漢在這次瘋狂向党進攻的時候，就來大談特談“人性”的問題，為的是替他所提出的“寸寸金蓮”的“改良”作論證。為了要調查研究“寸寸金蓮”的“改良”，就得進行逐個社會具體問題的研究，所以他才提出社會學的任务是要研究“社會的全體”問題。清理舊中國這個“大雜貨店”，而不要去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不要急於去“打倒”。到頭來我們看到了李景漢說什麼社會學的任务是“設法尋找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定律”不過是一個騙人的幌子。而他所主張的“救國”更是掩蓋其反動面目的輕紗而已。

當然，李景漢的這套“理論”並非什麼“新的科學”，而是偷運着杜威的實用主義私貨。杜威為了反對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理

論，反对馬列主义关于社会物質基础决定社会精神文化的决定論，所以他就把社会問題归結为道德問題，而提出“社会問題底根本道德性質”，既然杜威把社会問題归結为道德問題，而他又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曲解道德，認為道德純粹是由个人选择 and 决定的，是和社会和經濟条件毫無关系的，而只是和一个人的“智慧”有关，这样他又把道德問題归結为“智慧”問題。而只要是对于各个人随时有效用的就是“智慧”，因此“智慧”是無需乎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知識的。而为了“智慧”則不过只需要“狹隘地实际”的“教育”就够了，这样关于道德問題就归結为教育問題。而杜威認為人的“智慧”对于白人和黑人是生来就不同的，因此要改变这种“白人至上”的本性也只能是逐步的过程，这样杜威就提出了他的“渐进的倫理学”来为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作論証。这样我們从杜威那里，清楚地看到李景汉是如何巧妙地把社会問題归結为道德問題又归結为教育問題来为他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服务的。

* * *

資产階級社会学不只歪曲了有关社会的科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歪曲了唯一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而且还歪曲了关于社会的概念本身及其實質。資产階級之所以要反对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理論，在实践上是害怕揭露資本主义社会人剝削人的关系，害怕揭露資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所以他們不得不千方百計地来抹煞这种关系，而来抽象地談論一般社会，或者是用观念的形式，或者是用自然的形式表現出来。而拒絕把社会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內加以分析。李景汉的社会調查玩的正是这种手法。他說：“‘社会’的意思就是一群人在一个地方一塊兒生活，彼此有来往，你有时候来看我，我有时候去看你，有时候彼此送礼物，有时候彼此帮忙，有时候大家在一起开会，如今天是的。总而言之，彼此多少有些关系。几家人合成一个小村，这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大村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县也是一个社会，一国也是一个大社会，甚至于天下的人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大社会。一家的人有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几房兒

媳妇、孙子、孙女也算是一个小社会。”李景汉在这里也谈到人的“关系”，但是抽象地离开了人的阶级地位来谈“关系”，把各个社会都有着基本的阶级关系，作为区分社会类型、性质、面貌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为阶级关系）割裂为抽象的按地域区分的关系，各“小村”、“大村”、“县”、“国”、“天下”之类，好象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这正是资产阶级所叫嚣的阶级合作“理论”，美国所叫嚣的“世界理性”、“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理论”。正是因为这样，李景汉还同时曲解了社会的起源，在他看来，社会并不是和人类同时出现的，而是曾经有个时候，例如在渔猎时代是有人类而没有社会的。他说：自从“农业成为生活上的主要基础之后，民族才能稳定，社会才能成立”。其实，在馬列主义看来，社会首先表现为生产关系体系的概念，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有着特殊性质的社会。”因此社会并非如李景汉所抽象谈论的地域的、家庭的性质，而是为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民族之出现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如斯大林所说：它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作为民族形式的特征来说，是要求“共同地域”的；至于作为形成社会来说，要求地域，但并非一开始就要求固定的地域，而最重要的是生产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为了要生产，就必须结成社会，所以人类和社会和社会生产是同时出现于地球的，正是因为这样，当农业尚未出现，人们尚未定居的时候，已经进行采拾、渔猎等生产行为，已经结成社会了。李景汉之所以要离开社会生产来谈社会，为的就是企图从主观观念来曲解社会及其起源。

而且，李景汉之所以要从地域、人口来区分社会，不过是为了反对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偷偷地引进地理环境决定论。例如，他谈到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从其内部的经济情况来决定，而是从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来决定的。他说：“在土地面

积狭小和人口繁密的国家或国土不适合于农业的国家，則土地受收获渐减律的支配，或受种种农业经营之不利地位，就自然的要求实行偏重以工业为主，其他产业为副的工业本位国主义，宁可牺牲其他的实业，而特别保护工商业。英、荷、比等国即是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这是明显的为英、荷、比等这些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辩护。当他们向外拓殖殖民地时，正是叫嚣什么英伦三岛国土小，荷兰国土低于海洋，“土地受收获渐减律的支配，或受种种农业经营不利地位”的限制，不能解决本国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所以得向外发展，要用炮舰保护工商业，这正是地理政治论的原本，而且是为他所主张的“农业殖民地国家，工业帝国主义国家”作论证，日本帝国主义叫嚣的“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样。李景汉还武断地说：正是由于“自然环境使中国成为一个农业国家”，此外还由于中国人向来有着“重农的心理”造成的。因此他极力地歌颂中国的农业国地位，他的“乡村建设”的“理论”正是和费孝通的“乡土重建”的“理论”一样，为的是替旧中国寻求一种维持“农业中国”的新出路，以便继续对于帝国主义有效用。当然，我们并不轻视农业，自始就认为农业和工业一样是国民经济的两大部门之一，正是因为这样，在有五亿农民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提出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我们所以这样作是为了发挥五亿农民的积极性，更快地发展农业，从而也就能更快地发展工业，尽快地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和李景汉之力求保持落后的农业国的殖民地地位是根本不同的。事实上通过新中国建国九周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并非天生地就是农业国，是永远不能改变了的，而是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就已经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全国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争取迅速地把中国建成工业国，否则，如毛主席所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同时反过来说，工业发展了，就能更快地并且根本地改造农业生产能力。

李景汉在谈到中国问题的中心时，他还引用了地理环境论来为

旧中国的貧穷落后作辯护，他認為“人口繁密，耕地不足”或者是“耕地分散”……等等是造成貧穷落后的原因，而土地、人口等条件的改变却是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间才能奏效的，所以就只能用改良的办法来改变旧中国的貧穷落后面貌。我們認為旧中国貧穷落后的原因首先是国民党的剝削制度。解放后，我国人口还在增加，仍在原来的土地上进行生产；但由于我們根本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人民群众发挥了冲天的干劲，使得农业生产物成倍地增加这就充分証明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証明了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新的技术科学指导下，在掌握客观規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土地的报酬能力是极大的，馬克思主义是能出产粮食的。

李景汉的地理环境論还表现在对于人性形成的曲解上，他說：“农民多在室外露天工作，受各种气候变动和一切天然物的影响，頗能养成他們勤勉的性質，”“都市人民多在室內工作或消遣，与天然接触之机会較少，并多在人与人間的往来之中；因此，他們的態度与活动多受人為的影响与控制”。这种把人的性質看作是受地理环境所决定，不正就是孟德斯鳩所主張的人类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的以至經濟的制度，首先是由气候所决定的观点嗎？我們認為，就是在同一的地域和气候条件下，由于出現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必然要出現不同的人的性質，主要是社会关系（在階級社会則为階級关系）的产物。中国农民之勤勉的性質当然是好的事情，但是在階級社会，勤勉生产的結果，也就是李景汉所主張的“生产效率”提高的結果，却为少数吸血鬼侵占了。而且这种性質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質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深知一飯一縷都是用血汗换来的，至于深居簡出的有产者是不能理解这个的，正如郑板桥詩中所說的：“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农民們更是懂得重視自己劳动的顆粒，今年山西等地发动的“第二次秋收”运动，貫徹顆粒还家的精神，就是为了弥补秋收粗糙現象的具体措施。还因为旧中国农民处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以及封建地主的統治下，生产力非常低下，簡單生产有时还不能維持，更不用談扩

大的再生产,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只能“克勤克俭”才能维持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李景汉之所以要从地理原因来解释旧中国的贫穷问题,为的就是抹煞造成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的社会制度,“调和”和抹煞阶级矛盾及斗争。

如前所说,李景汉不只用地域而且用家庭来区分社会,当然,家庭这种社会现象如恩格斯所说:它是“文明社会”的缩影,社会的矛盾和对抗在家庭中就有着它们的表现;但是,社会和家庭终究是不同的范畴,“文明社会”的家庭是阶级社会这个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并非天生就有着夫对于妻的奴役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而且就生产关系的地位来说,例如在劳动人民的家庭内,却是平等的;至于在社会则不然,劳动人民家庭的成员则不能与剥削阶级处于平等的地位;用家庭代替社会,就是企图抹煞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而且,家庭毕竟只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不是社会全身。“文明社会”的家庭是要“消亡”下去的,至于人类社会则要 and 人类万古长存着。企图把家庭和社会等同起来,而为那替私有制服务的家庭形式的永恒性作辩护,是不能容忍的。李景汉这次向我党进攻的时候,还大做其家庭的文章,说是“在新中国农村中,由于农女参加了劳动”表面上说来,“她们具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好得多了”,但实际上他却恶毒地进攻我们,说是在农村,“有不少家庭变为‘旅馆式’的家庭了”,“老年人越来越被轻视而不被家庭照顾”了。这完全是恶意的攻击,事实上,新中国劳动人民的家庭,是幸福、和谐并具有乐趣的家庭,老年人更受到人们的尊敬,特别是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给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成立了“敬老院”,使他们在晚年中过着较好的生活。李景汉捏造什么“旅馆式”的家庭,不过是为他们所歌颂的“文明社会”的死亡哭丧而已。

李景汉之所以要曲解社会的概念及其本质,而来抽象地谈论什么“彼此来往”、“彼此送礼”、“彼此帮忙”,这样的“人类的行为”,企图把阶级社会描绘成为一个“和谐的钢琴”,只有统一而没有矛盾和斗争,这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在理

論上是拾取了杜威的牙惠。杜威說：“各社会互相交通往来，是共同生活的要素”，而所謂“共同生活便是自由交际，互相往还，交換感情，交換种种有价值的东西的生活”。

在李景汉認為，階級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不是階級斗争，而是“共同生活”，如他所捏造的：“农民的同类意識，同情和需要，使他們发生同乡观念，推动他們发展共同的事业。”因为他們“大家是鄰人或有血統关系者”，所以他們“彼此之間休戚相关”，“友誼极深”。李景汉在这里如同他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一样，把地主、富农也看作是农民（大农）而包括在农民的概念之內。从而提出这样荒謬論点：“农村的人口在社会心理的特征方面是比較同質的”，“农村社会則是比較單純的，統一的”。很显然，他是借此来否認农村中的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以至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所以他就直截了当地談及农村“内部調剂問題，包括农民自身工作与享受問題的調剂，地主与佃农的調剂，各种階級間的調剂，新旧思想的調剂等項。总之，关系不調是社会問題发生的原因。”把階級斗争看作是社会的病态，而把階級調和看作是社会的常态，这是从来剝削階級及其辯護士的偏見，以及他們反对馬克思主义的破鎧爛甲。其实，在階級社会片面強調“合作”，“来往”，“調剂”，而抹煞了这种行为的社会物質基础及其階級性，是免不了为剝削階級的警犬的。統治階級的“来往”，不过是为了“官官相护”，“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說明統治階級之間虽然也有勾心斗角，但是在加强自己的統治，共同对付劳动人民上，他們則是“一致”的，所以有“礼尚往还”的风气。管仲說过：“礼生于有，而廢于無”，“倉廩实，而后知礼节”，为什么地主的亲友可以“彼此送礼”，这是因为他們剝削农民的结果，都是“庫有余粟，廩有余粮”的，反过來說，地主断然不会無故“送礼”給农民。在婚姻关系上，正如俗語所說：“竹門对竹門，木門对木門”，“齐大”了就“非偶”。这难道不是“礼不下大夫，法不加至尊”的逼真写照么？道德和法是有階級性的，如果說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也有“来往”的話，那是“人为刀俎，我为魚肉”，李景汉就曾批評过那种“專事

知識論的哲學家”是迂腐的，剝削階級總是要剝削的，那有“專門磨刀而不切肉”的人（李景漢語），因此他說：“我們從事社會研究者，不但要把刀磨得好，也是要隨時磨刀，也要隨時切肉”。這裡所謂“切肉”，當然是切勞動人民的“肉”，敲骨吸髓了，正如杜威所坦白供認的：剝削階級就是要通過“交際”來取得“種種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地租、利潤和利息之類的“價值”，這難道是“合作”嗎，不是的，而是刀與肉的關係。

* * *

資產階級社會學不只歪曲了關於社會的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的概念及其本質，而且還歪曲了關於社會的變化及其變化形式。

我們知道，無產階級社會學既然是研究關於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它是研究李景漢所提出的“人的聯結”的形式，它不只要研究從一個社會形態向另一個社會形態過渡時的“聯結”，而且也研究同一社會形態的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聯結”，就是說，既要从縱的方面也要从橫的方面來研究社會，這樣就可以把社會的發展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和一個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肯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後者又反過來作用於前者。而在李景漢那裡所談到的“人的聯結”，不過是指的人們主觀的“聯結”，而不是首先指的物質過程的“聯結”，這樣就變成馬赫主義所說的觀念的感覺的“聯結”或系列了，物理的、物質的系列對於觀念的意識的系列的依賴關係。既然李景漢販的是主觀唯心主義，所以他在談歷史過程時，着重點是放在“人類的行為”的動機上，所以我們說他並沒有克服而是加深了歷史唯心主義的基本缺點。他錯誤地把它們這些動機作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決定力量，可見，他所說的：“人類聯結的起源、發達結構和現象”，都是從唯心論的觀點來解釋，從而否認社會發展是決定於社會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它的變化和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既然李景漢十分重視人的主觀的“聯結”，所以他在解放前十分重視研究類如家庭中的婆媳、姑嫂、叔嫂、妯娌……諸如此類的關係，他還美其名為研究家庭的“精神生活”，實際上

他是完全脫離了家庭的物質基礎來談家庭，把家庭歸結為純粹精神的性質，勾心斗角的角力場，沒有一點“人性”，這完全是從剝削階級的精神心理狀態來看一切家庭，沒有看到在勞動人民的家庭中所存在的性愛和溫暖。解放後，李景漢向黨進攻時也如此，他在“關於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和內容”的座談會上就提出了：“社會學所要研究的主要事項是與人之間的互相關系，包括人民內部相互關係間的種種矛盾問題”。他以為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研究”之後，就可以任意加以挑撥、擺布和擴大，甚至可以翻手為雲復手為雨，如他挑撥城鄉、工農、家庭的關係就是這樣。可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有規律變化可循的，在人民政權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掌握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主動地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使得全國人民空前大團結，發揮了高度的勞動積極性。李景漢的挑撥落了空。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平等地占有生產資料，因此人們的團結一致是基本的。儘管由於在生活資料的分配上還有不平等的現象，但是這是在解決了人們基本的生活必需條件的基礎上所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隨着社會和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和將來逐步擴大“按需分配”的因素，並不斷地限制以至消滅資產階級式的權利的殘余，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提高共產主義覺悟和道德品質，人們將會進一步地加強團結。這樣，李景漢企圖在人民內部擴大或挑撥矛盾是不能得逞的。因為這是受我們社會所處的社會經濟條件、政權的性質，以及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所制約的。

歷史唯物主義不只要研究同一個社會各部分間的“聯結”，也研究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過渡的“聯結”，它要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規律，也要研究在階級社會如何通過革命來打破舊的生產關係的政權而為我們生產力開辟發展道路的規律，階級鬥爭的規律。李景漢在口頭上也提出要研究社會的“變化”，這只不過是幌子，在孔德時代就已經把他的社會分為研究靜止狀態中的社會機體的社會靜力學。這是他所說的社會組織部分；以及研究運動狀態中的社會機體的社會動力學，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社會變遷部分。杜威也

是認為社會不可能處在“靜止的”或者是“一成不變”的狀態之中，而應該有所“改進”，不過他所承認的“改進”只是逐漸的只有量變而沒有質變的“生長”。李景漢正是繼承着這樣的觀點，來曲解中國的社會問題。當他談到農村合作的目的時，就認為它是“要掃除農村積弊，改進農村經濟”。為什麼要“改進農村經濟”呢？因為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帝國主義的侵入，要求農村供給原料和作為工業品的市場，而在當時中國農村由於“積弊”的原故，造成“農村經濟比都市經濟尤為落后，因此需要合作社的補救”，否則不能適應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要求；不過他在这里所提出的“改造”是為了“改良”國民黨的社會而不是為了推翻國民黨制度。李景漢說：“合作社不要立刻把現社會制度推翻，不採用暴烈的革命方式，乃是依照現社會原有的經濟組織加以和平的逐漸改造，以實現合作事業的最後目的。”我們認為，只有把改良和革命、把量變和質變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改良才是一個合理的進步的概念。至於李景漢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而提倡“合作事業”，就只能是改良主義。儘管如他所說：發展“合作事業”的最終目的是社會的“根本改造”，在農村為實現“耕者有其田”，在城市為“節制資本”。其實，在自然經濟的條件下，實行“耕者有其田”還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小農有了簡單的生產工具和自己占有土地之後，就可以進行簡單的或者擴大的再生產，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則不同了，一切都商品化了，小農再不能維持自給自足的經濟，而必須為市場生產交換價值，如列寧所說，“農民必須出售生產品，購買工具，購買土地”。因此，產品的購和賣都要受到市場的价值規律、供求規律等等的支配。所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即使有了土地，小農也是免不了要分化的，為了免除分化而組織合作社也是辦不到的。因為在土地私有的條件下，地主、富農和貧雇農如果同在一個合作社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要就是當合作社是維護貧雇農的利益時，地主富農不願加入合作社；要就是如李景漢所說：“農村中之地主豪紳”之所以感覺“參加合作組織為榮”，正是為了利用自己原有的經濟的政治的優勢加入合作社來從中操縱一切，使得合作社向着

有利于他們的斜坡滑下去，而地主、富农可以搖身一变而成为资产階級。而且，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分散的、孤立的合作社，必然要受到城市的資本势力关于金融和生产工具、原料等方面供应的控制，以及銷路方面的壟断，受到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所支配、使得合作社为了竞争胜利，只得采取資本主义的方式經營，雇佣劳动，最終的以賺取利潤，为社員分得更多的“紅利”为目标。这样，合作社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变相的資本主义。而且在資本主义下发展合作社还更有利于資本主义的发展，因为由于信用合作、供銷合作……等等在农村的建立，可以廢除农村以高利貸和其他中間的剝削环节，从而使得城市的資本直接和农村挂起鈎来，开辟自己发展的地盤，帮助資本控制农村的生产原料和市場。因此，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建立合作社，只是对于大生产才有可能，如列宁所說：“协作社沒有削弱而是加强农业中大生产对于小生产的优越性，因为大农户有成立协作社的更大可能性，并且更多地利用这个可能性。”既然在資本主义下发展合作社并不能“根本改造”社会，反而助長資本主义，因此，列宁又說：在資本主义下的“小农户的协作社是經濟进步底一个环节，但是它們所表現的，是向資本主义的推移，而决不是如人們常常所想像和断言的向集体主义的推移。”正因为这样，李景汉徑直主張对于合作事业，要“政府积极提倡”，事实上，在国民党时代，曾經有过一个时期合作事业运动搞得很热，其目的正在于对抗我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同时为了在中国发展資本主义。关于合作社的发展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性質，只有在無产階級政权下才有可能，这一点从苏联和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証实了。因为农民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傾向，但他們却不能自发走向社会主义；而要有無产階級政权，無产階級及其政党的领导和帮助才能变为现实。但是苏联农民之加入集体农庄却是自願的，决不是如李景汉所說的，是由于政府“尽驅”之結果。

从上述我們对于李景汉所提出的通过合作来“改进”社会的理論，不过是反动的改良主义的牌号，也就是他主張的“有秩序的变

化”、“和諧的”变化，他認為革命派所主張的“打倒”是違反“秩序的變化”。李景漢這裡所指的“秩序”不過是剝削階級的“秩序”，早在孔德時代，他就提出了他的社會學是“維持國內的秩序與和平”的“科學”。李景漢還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面孔來“敬告熱心的專家，若真有改造中國社會的決心，先勿立刻施展他那駕飛機的技能，開始慢慢的學趕牛車；根據人民的程度，一步一步的，漸漸實行改良的計劃。如此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學習，腳踏實地的進行，終有達到近於理想社會之一日，這樣大的中國農村社會，想要把它在短時期內有絕大的進步，是不可能的。它的進步須先從牛車漸變為馬車，再由馬車而汽車，而火車，而至於飛艇，等到社會程度有如飛機的時候，專門的學者即可施展他學的本事駕駛飛機罷。總而言之，中國的鄉村社會改進事業，必須按照妥當的步驟，逐漸進行。求速必出毛病”。李景漢這些反動論點說得很清楚，這裡不必多作解釋。但我們要指出：為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列主義所武裝的“熱心的專家”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繫和依靠着群眾的力量，並沒有接受李景漢的“敬告”，竟大刀闊斧地干起“求速”的革命來，不只駕駛着汽車、火車，而且駕駛着飛機、人造衛星，正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下，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步伐，駕駛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文教衛生……等全面躍進的大衛星建設社會主義並為“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創造過渡的各種條件，我們的“求速”並沒有出“毛病”，這條東方的“巨龍”却反而使得帝國主義着了慌。

*

*

*

李景漢和一切資產階級辯護士在進攻馬列主義的時候一樣，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忽視人的作用、壓抑個性的發展。李景漢在向我們的合作事業開火時說：“人們都知道昔日把人當牛馬是不對的，而今日却有時把人當拖拉機用”。這在政治上是挑撥工農關係，挑撥群眾和政府的關係。其實，歷史唯物主義雖然是研究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但是，研究它正是為了使得群眾更好地利用它掌握它來增強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力量，發展人的個性；歷史唯物主義自始認為：社會過

程的負擔者、主体始終是人，馬克思說：“在社會中進行着生產的個人——因而，個人的，為社會所決定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因為社會生產離開了人就不能進行，生產力的主体就是勞動者。”歷史唯物主義正是認為：由於人的勞動創造了世界的一切，人是“寶中之寶”。把人當作生產工具來奴役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階級社會。奴隸社會正是把人當作會說話的工具來看待，而我們則要千方百計地來改進和創造生產工具，使勞動人民從沉重的勞動操作中解放出來。至於李景漢之所以要提出人的作用來，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唯心主義地曲解歷史的過程。例如，他雖口頭上也提到過封建制度的存在，但他卻這樣來說明它的產生過程：在土地本是“公有的”社會之後，“隨着戰爭的頻仍，戰爭中領袖的威權擴大，產生封建領主，遂將土地隸屬在自己手下，而演成土地占有不均”的情況。這就是說，私有制的產生不過是由於“戰爭”，由於“領袖”的英雄人物造成的結果。所以李景漢之所以提出人的作用，並非是勞動人民的作用，而是少數“領袖”人物的作用。其實，私有制的起源，並不是由於“戰爭”、由於“領袖權威擴大”的結果，而是由於原始社會的後期，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擴大，生產物出現了剩餘，交換也發展了，這樣才出現了把別人的勞動及其成果據為己有的私有制和階級的現象。李景漢不只在私有制的起源上用“領袖”的作用來解釋，就是在他們所擬的“平民教育”的“六年計劃大綱”中也就特別強調在“政治方面”要使學生對於“政治領袖”“有明了之認識”，然後“能得政府之具體的合作”。李景漢在到處為國民黨的領袖作用宣傳，還表現在他所寫的“北平郊外之鄉鄰家庭”的調查時，就多次通過調查當地居民的“教育知識”而將中國的軍閥張作霖、袁世凱，段琪瑞、蔣介石……等等作為問答和宣傳的對象，以便貫輸民眾對於軍閥的“信仰”。這和國民黨官方出版的“三民主義半月刊”和“中央周刊”一樣，公開宣傳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希特勒、墨索里尼，推崇蔣介石的“丰功偉績”。另外，他在談到“人物方面的調查時”，強調“要注意有特殊德望（當然是指軍閥豪紳之類）”的人士。他在談到“農村組織不發達的原因”之一時，

認為由于“領袖的缺乏”，所以在他所主張的“鄉村建設”中，提議：要“把鄉鎮中資望較高的人才結合起來”，並加以“訓練及指導”，因為這些領袖“多出自村中占有優越地位的家庭”，這難道不是為了加強他們的法西斯獨裁的統治而去糾集鄉村的惡霸土劣嗎？

晏陽初、李景漢的“平民教育促進會”還處處在向學生們提議要服從“黨國”（指國民黨及其國家）使得在學校時可以領取“平民獎學金”或者“成績優異而有意升學的青年，就設法送他們到正式學校去繼續讀書”甚至可以到外國去“留學”、做官……等等，這樣來拉攏收買學生，鼓勵他們向“青雲之路”上爬、跑。晏陽初在他的“平民教育的真義”一書中認為他們所辦的“平民教育”可以使得一些“平民出身”的人，得到“受最低限度的基本教育的機會”，免致無形中“埋沒多少英雄好漢”。他並列舉了“美國世界聞名的大發明家艾迪生、政治家林肯，實業家福德，高等教育是沒有受過的，大學的門，更沒有踏進一步，然而最低限度的基本教育，却是受過的。他們便憑了這一點基本教育，自己尋出大的發展了。由此看來，倘若我們借（平民教育）來開發世界最大最富的（腦藏），使得我國二百兆失學的男女，都受上基本的教育，使他們天賦的才能有發展的機會”。李景漢在這裡販的是道地的美國的“向上爬”的個人主義教育，美國人對於這種教育是有迷信的，他們迷信着那種教育機會的“改革”，從而也就可能在職業上，經濟上達到“均等”，就有可能成為“世界聞名的”大發明家、政治家、實業家等等，問題是要自己努力“尋出大的發展”來，階級區別是沒有的。李景漢和右派分子費孝通一樣，把階級的區別分成許多收入不同、職業不同的層次，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社會有着資本家和工人根本對立的基本階級，也否認封建社會有着地主和農民根本對立的基本階級。在李景漢看來，“都市里職業之分工可有數百種之多”，農村也有“數十種”，只要各人能努力“向上爬”都可以從一個層次爬上另一個以至最高的“記錄的”層次。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兩個基本階級的對立是很明顯的，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積累和集中規律的作用，必然出現少數像福德這樣的金融寡頭，而這樣的寡頭的數目是會越來

越少，而無产阶级的队伍却会越来越扩大的。可見晏阳初、李景汉、費孝通等所宣傳的“记录的”層次，对無产阶级來說并不是什么爭取的目标，而是进行阶级斗争来加以打倒的对象。至于晏阳初、李景汉所說的：从来“立大功，成大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的，“都是平民出身，并不受什么贵族的压迫而不得发展”的說法，不过是欺騙劳动人民或者是要他們“安份守常”不加抵抗，或者是要他們努力“向上爬”到“记录”的層次，而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如果說你們是爬不到“记录”的層次的話，也只是說明你們的“天賦”不如人而已。晏阳初、李景汉就是这样来否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首先是受到阶级地位、經濟条件所制約的作用，而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觀的、“天賦的”作用，从而达到为剝削制度的罪惡辯护。

李景汉之夸大“英雄”的作用，还表现在他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者所标榜的“好人政治”“好人政府”一样，企圖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反动的改良主义。似乎不必推翻反动政权，而只从社会調查、只从教育入手即可以救中国。这样就必須把国家权力委托給他們一伙从事社会調查、平民教育的專家手上。如他在談到政权的好坏时說：政权是落在“政客的手里”抑落在“社会科学家”即“社会工程师”的手里，这种說法，就是認为社会进步抑落后，是决定于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与社会制度無关。所以李景汉說：旧中国之所以“如此焚乱”，是由于政权沒有落在“社会科学家”手里，是“人类生活如此悲慘的根本由来”。就是說旧中国的貧穷落后是和三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無关的，为了要救中国，只要重視李景汉之流的“社会科学家”及其社会調查就可以达到了，李景汉在这里是以“社会工程师”自居、以社会的“良医”自居的。这种“理論”是道地的历史唯心主义，在实践上是国民党的辯护士。

综上所述，我們从李景汉所暢談的关于社会学、关于社会的各个主要問題中，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新的科学”，而是久已腐爛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公开为国内外反动派效劳的文化买办貨色，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繼承的“遗产”。

批判右派分子李景汉文集

本校内部使用

李景汉
手书
批

PDG

說 明

本書所收集的論文，是我校部分青年教師和學生在去年八、九月間我校科學研究躍進運動中所完成的一部分學術批判作品。這些論文對右派分子李景漢的社會調查及其有關社會調查等問題的謬論，做了比較全面的清算。由於這些作品都是在短期內以突擊的方式寫出的，其中批判不夠深刻乃至欠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批評和指正。

1959年1月